

蒋增福 著

富春
聞見錄

老子光



浙江人民出版社

富春闻见录

蒋增福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目录

序	郁风 1
---	------

鹤山茶话

甲戌春节感怀	3
秋趣	8
老屋	11
江边	14
痛定思痛话长堤	17
苏东坡与富阳	19
寻觅弘一法师的足迹	24
没有跑完的接力赛	
——一九六〇年修撰《富阳县志》琐记	31
劫后余烬补史缺	
——一九六一年修志时一次座谈会记录	38

富春揽胜

历史悠久的富阳	45
富饶美丽的富阳	48
富春渚	52
龙羊二奇泉	54
富阳严子陵钓台	57
龙门山	58
游亭山	61

西岩山寻胜	64
初探叮当洞	68
游灵隐洞	71
“画中游,游中画”	75
鹤山观日出	79
龟川阁小记	83
也说天中山	88
再访白龙寺	91
游大奇山记	95
陪徐迟游富春	98
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也说大源经纬线科学公园	105

乡邑人物

话说春江旧钓徒	115
瞻仰夏灵峰墓散记	122
金壬父先生传略	130
周大易先生传略	135
骆韞韬与他的《回忆实录》	139
敬悼岫云师	144
郁风回乡记	147
赵和松的故事	153
话说《当代老板》	156
老板们的“后台老板”	
——记富阳县工商局局长何侠安	159
我所认识的骆四福	162

方物纪略

富阳土纸	169
富春江鲥鱼	181
富阳桑	183
富阳茶	185
龙羊白果	187
富阳栗子	189
富阳竹笋	191
东坞山豆腐皮	193
亭山白术	196
峡岭湖笔	198
竹制工艺品	200
三山紫竹	202
后记	204

序

富春江边的富阳城，城东有一座树木葱茏的鹤山，山上有我的老家改建的郁华、郁达夫烈士纪念馆和双烈亭，还有在文革中毁去最近又重建的我父亲的血衣冢。当然，还有从古时候就有的严子陵钓台和后来改建的春江第一楼与龟川阁。如今，这鹤山和沿江一带已成为杭州旅游风景区。

数十年来参与所有以上这些设施的建造和宣传的有一位土生土长的富阳人，名叫蒋增福。他曾任富阳广播局、文化局、县志办、县文联等单位的领导，熟悉所有富阳历史沿革和新建设的艰难运造过程。但是，他却自称为“半文盲”和“万金油”干部，就因为他没有读过大学。

就是这个“半文盲”，近十多年来写过不少文章发表在报刊，还出版过一本《富阳游》，颇得好评。现在将他历年来所写有关富春古迹、特产、人物和新貌等数十篇，集成《富春闻见录》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要我为此书写序，虽然是刚从南半球的澳洲飞到北京，许多杂事堆着，也乐于推开一小块空隙，让我的思绪暂时回到富春江边的故乡。

北京旧居存有一本八十年代出版的自己的散文集《我的故乡》，我重读了其中一九五六年写的《我的故乡》，一九六四年写的《还乡杂记》，还有一九七八年写的《画中游》，竟然像读别人的书一样新鲜，又像读陈年旧事一样的如同隔世。这才发

现岁月的飞逝。

美丽的富春江边的富阳，得天独厚的鱼米之乡，两千多年的历史兴衰，加上五十年代改天换地以来的几起几落，小小的富阳也同样刻划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喜怒哀乐。

我永远记得不到十岁时父亲教我念的诗：

富春江之鱼，富春山之茶，
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
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
昊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
鱼何不生别县，茶何不产别都？
富春山，何时摧，富春江，何日枯？
山摧茶亦死，江枯鱼乃无。
呜呼！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

童年时只会背诵，不记得父亲是怎样讲解，当然我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直到后来自己写作时引用，才发现它是多么不平常的一首乐府，用反话表达愤懑，如此沉痛！据查当时明朝传下来的。当时富阳产最好的鱼最好的茶，都是官府征收急送京城的贡品。

我虽不是出生在富阳，童年时却每年都跟父母亲回到富阳祖母和曾祖母身边，也就是父亲三兄弟出生的老家，当时叫满舟弄。门前的小石板路不论晴雨总是湿的泥泞，因为人们都从江边挑水，满满的水桶总要沿路洒水在地上。弄口搭着草棚，像一排凉亭，一根粗毛竹横架在一排粪缸上，被人坐得光滑精亮。

一九五六年我独自第一次作为画家和记者回到富阳，满

怀兴奋地写下所见所闻，欣欣向荣的富阳，逐日寄稿给上海《文汇报》连载。一九六四年我用创作假期回家乡作画：共产风大锅饭和三年灾害的创伤刚刚过去，美丽的江边田野又在欣欣向荣。一九七八年写的《画中游》，是记录和叶浅予为完成他的《富春山居新图》长卷而同游富春江的。那又是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

一九九四年秋我又回到家乡，除了鹤山依旧苍翠，富阳城几乎变得不认识了，改革开放使它迈开了大步。《富春闻见录》会告诉读者这一切详情，包括它的历史、人物、掌故、重要文物。作者蒋增福应该是遍尝过富阳喜怒哀乐的知情人。

这不仅是一本导游书，也是更深层认识富春的知识书，希望它使读者更珍视一切美好事物和建设成就。

郁 风

一九九七年四月三日于北京

鶴山茶話

甲戌春节感怀

一

过春节，比较实际的界别是增岁添寿。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人人均等。

甲戌狗年，是我的本命年。六十花甲子转满一轮，接下去的人生之路，复如儿时学步，将是蹒跚地朝着尽头走，越走越临终点。当然，也可谓之继续前进。前进的脚步声，有可望越来越清晰、铿锵。

不是有“老夫喜作黄昏颂”的欣慰么！

“又长了一岁！”孩子们自然高兴。老人们则在添寿之余，难免发点哀愁。小时候听大人们说：“小时吃苦不算苦，老来吃苦真叫苦。”人一上年纪，器官就一件件地失灵，耳聋眼花，行动不便。最担忧的恐怕莫过于穷。老来尤其穷不起。有的子孙不贤不孝，也许亦与“穷”字有关。过于穷困，子孙亦就孝不起来，老来有积蓄、产业或固定进账，即使子孙不孝顺，也用不着担愁。

二

所言前进的脚步声，前提是社会的前进，经济的发展。这

些年没有战祸，没有大灾，太太平平，人们以安居乐业为幸；建设成就日新月异，经济发展迅猛出奇，尽管会有心理不平衡的郁积，但老百姓普遍得到了实惠。

“老来愁”的阴影似有淡化的趋势。

富阳变化之快，为市民们所惊叹，新鲜事儿更是层出不穷，今年春节就与往年不一样：撤县设市，使古老的富春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开通程控电话，不必与接线员呕气，便能跟远在外地的友人们交流；道贺新年亦毋须出门和登门。尤为欣喜的是，大年夜零点钟声响起，似天地四方同时炸响的爆竹声，以及同时升腾的烟花光彩，明显减少了。

这也是时代的变化和进步。

三

如若选几个家庭稍稍透视一下，即便不乏喜中隐忧者，变化之大则是无疑的。

坦白地讲，平时我也发点哀怨：想当年，五十来元工资，能供养一家老小，如今夫妻俩月收入上千，过日子仍觉不宽裕。无非是说，物价涨得过快，币子贬值。我把自己归入“小员司”的行列，工薪阶层，极少“外快”（有点稿费）；为伍政界，生活属下中水平。要是平心而论，应当“知足常乐”！以过春节为例，物资年比一年丰裕，礼品档次年比一年升高，乃至分压岁钱，十元二十多元已是拿勿出手。作为步入老年，行将退休者，“管一代”的任务也算基本完成——有了丁丁、天天两个小外甥，小儿子也于去年结了婚。自己退了休还有养老金，又有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障，不存在“老来愁”。当然，人在世上总不免时与尴尬为伍，只不过因人而异，内容不同罢了。有道是，每个家庭都

有本难念的经，不可能时时顺心，事事如愿。去年办喜事，今年要购房，就得借债，就得过很长的紧日子。

要“续后”与“置产”么！

许多农民、居民家庭，想必都会有这种情况。只是我对底里知之不多。何况，现今许多家庭收支是不成比例的，明里暗里，混混沌沌。

四

杭州的一位朋友年前来电话说，他有位在上海的朋友想来杭州过年，准备陪他到富阳小住，吃几家轮供饭。还特意言明：务必要去乡下吃一餐正宗的农家饭，即是不务工不经商的地道农家。

城里人么，了解乡下民情，体验乡下生活，恐怕也是一番乐事。

正月初一起，先在我家用餐，一再称道菜肴丰盛，去两个女儿家吃轮供饭，所见旧房装新、新房“堂皇”，说是眼热煞了。兴致一上来，他们有了几分醉意，酒后吐真言：“你们三家都还缺乏代表性！”

“天老是下雨，你们真不走运！”我试探是否不去乡下？

“杭州、上海都是这种天气。”他们不想放弃农家饭。

“也好，烟雨富春江，别有情趣。”我只能这么说。

五

正月初三，冒雨去了富春江南岸我的老家，在从小一起读书、嬉耍、长我一岁的堂叔家用中餐。自己人又顺带拜年，不必

提前预告。只是这天一大早，我叔上山去收夹野猫的弓什了。婶子热情张罗。我一再言明，像对待一般拜年客那样就行，鱼肉鸡鸭可以不上，只需用柴火灶在铁锅煮饭，饭架上蒸两只散蛋，一碗芥干菜就行；又见园内有菊花菜，要她炒上一碗。

我叔过了十一点才回来。他满堆笑容，说今朝你们运气好。随手一倒网兜，三死两活，死而复生的黄鼠狼一溜烟逃上后山，经合力围歼才又抓回。嬉演这个“节目”，阴雨天也凭添几分生机！死兔当即开剥（活的要我带回），现炒。这野兔糟蹋豆麦作物，且美味佳肴，当食不让；黄鼠狼腥臭很少食用，又向以“给鸡拜年”臭名昭著，死有余辜；唯有那只原本活蹦乱跳的小松鼠，如今僵死眼前，有点可怜兮兮。

菜碗摆满一桌，吃得不剩的是我预料中的野兔肉、蒸鸡蛋、菊花菜，再就是芥腌菜炒冬笋和草包鸡。

“这是在富阳吃到最美的一餐。”我相信他们直话直说，说的是真话。因为我也经常在家里如此招待客人，乃至国外和港台友人。特别是在春暖花开季节，用马兰头、狼鸡头、野山笋、炒螺蛳和臭豆腐请吃，也都这般称道。

请饭的学问又增加了新的感受。当然，高级餐馆我也实在招待不起。

六

我叔现在是五口之家。因为两个女儿已经出嫁，大儿子也已成家分居。他家的主业是种好责任田，又在开荒地上多种杂粮、菜蔬，不但“家中有粮心里不慌”，还能常年饲养两头母猪和一些鸡鸭家禽，外加捕野味、鱼虾的些许副业收入。称不上富裕，日子倒也过得踏实。最感困难的是还要培养两个小儿

子，读完高中又得花本钱读高复班。他向我们发感叹：既想让他们跳出“农门”，也真不大负担得起。

这就是一户既不务工也不经商的地道农家的现状。

总之，居民也好，农家也好，都在变化，只是仍经不起“例外”支出，而抗衡天灾人祸的能力，则更加脆弱。

文无定法，相比之下，作家可以作些随心所欲的“探索”，我不知道这两位外地人是如何看待现今城乡变化的？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五日

秋 趣

十月，是秋分满月的季节。是个用比较微妙的方式显示生命奇迹的季节。

尽管金菊达到盛开的巅峰，但整个大地上绿意盎然的盛日逐渐过去，树木开始露出了变化。这时，几乎所有的作物，一年的生长已经大功告成，另一年另一代的生长却已作好准备。

有道是秋收冬藏。果实已结好，稻谷已成熟，植物把它的将来寄希望于种子和根茎；昆虫则把它的明天收藏在卵里和蛹里，生命的冲动即将结束。即使黄昏的蟋蟀奏鸣曲，虽然热烈，也将消逝。这也是鸟类的度假时期，也许它们正在讨论未来的旅行？

可见，生命的奇迹依然存在，神秘的生长与复苏的胚胎已经藏在种子里。

大自然如此，人类活动更加多姿多彩！

这是个罕有的日子。

秋意在一个多雾的黎明悄悄溜来，天空清澈无云，晨曦有些耀眼，暖而不热，凉爽舒适，令人精神振奋。这一天，迎来了富阳历史上绝无前有的一件庆典。独特而别具风采的庆典。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十点十八分，杭州邻县的富春江畔，举行了“杭州富阳国际高尔夫球场破土典礼”。恰好这一天，又适逢党的十四大胜利闭幕。

我应邀参加了这千载难逢的时日。与往常不同的是，散发阵阵香气的请柬上，特别注明：“因考虑到现场停车场地限制，请于当日上午九时正在县府大门口上车进场”。近期，由县及乡（镇），“上挂”（挂牌开张）“下埋”（奠基）活动频频，一天间要赴几处者多的是，然而头头脑脑们弃小车去乘大车者，乃属个别而已。这令我想到，即使不受“场地限制”，此着也是妙棋：节省车油费用，可让众多的小车司机过个难得的礼拜天。这一天又正好是星期日。

请柬上告以“沿途有路标指示”，大车沿富春江下游驶去，在那黄子久作《大岭山图》的大岭山嘴一转弯，奇特的路标不单单令司机耀眼，印有“香港西湖休闲有限公司”和“杭州西湖高尔夫球场”字样的红黄蓝各色彩旗，分别插在新拓宽公路旁和那长满荆棘藤蔓的山边。几十米便有两面，迎风招展；几公里视线所及，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撞击在一起，煞是好看！

看到这些彩旗，联想到目前见诸报端的消息。说的是“休闲”公司建于西湖边的高尔夫球场，开张不久，问津不多。是人们观念跟不上，抑或是消费水平所不及？议论中同行的何君提议，过几天不妨去一道试试，打它几杆，究竟是什么滋味？而我则不敢响应。它那里也许场地过于狭小，只能象征性玩玩，行家过不了“瘾”，只好放弃“雅兴”。难怪这“休闲”公司的老板，要把脑筋动到宽旷的富春江畔来。这又令我想到了郁达夫的一句话：“看了富春江，西湖便不足道，只有瑞士的日内瓦湖差可仿佛。”何况这高尔夫球场建在黄公望画《富春山居图》的地方。

“破土”典礼的会场设在未来的国际高尔夫球场中心。操办者别具匠心，在宽旷的山坡上选一较为平坦地，略加平整——其实已经“破”过土了。面朝江，背青山，中间竖块偌大的

牌子，标以“杭州—富阳，国际高尔夫球场破土典礼”，两侧用十四根插上三角彩旗的绳子拉开，与直立的左为“诚邀五洲四海宾朋”，右为“携手开发建设富春”的对联连接，再各用挂满三角形彩旗的钢丝绳斜拉固定，足显五彩缤纷的气派！外加一批斜背红色绸带的礼仪小姐八字形排开，以及五十人乐队，掩映在这青山绿水间，已是一片红色的海洋！

应邀的宾朋有六百余人，一律戴上刚刚赠送的太阳帽，队伍已相当可观。然而，闻讯而来的周围老百姓竟有好几千。尽管中外宾客以白线标以站立方位，又尽管外围维持秩序的民警甚众，但人流还是不断涌逼进主会场。我惊奇地问一拄杖老者，他姓刘，今年已经八十有三，是从十里路外的横路头村过富春江大桥赶来的。回程路上，听到人群中有人在说：“怎么不见飞机，上当了。”原来，事先在富阳城乡有谣传：今天有直升飞机抛掷手表之类纪念品。也不知道这老者是否为此而来。同行者何、赵、朱君说笑：那些耳聋眼花的老太太，可能来前还担心：手表掷进茶蓬里，勿晓得是否寻得着？

秋意正浓。欢乐的日子，沉甸甸的时刻。

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日

老 屋

我向往往新房子，数十年间也曾几度乔迁新居，可是眼看着许多有着千百年历史的老房子渐渐消失，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

老家有一幢始建于清代末年的老屋，是三正四厢加前厅的台门屋。大门前的大“福”字照墙，又凭添几分气派。这种老式台门屋，家乡的望族大村有五六十幢，且多半一处数幢紧挨，由小组组合连成大群体，似称得上“龙门古镇”第二。村里大弄套小巷，小巷曲曲弯弯，连接着老房子，也连接着斑斑苍苔。在花台弄的一条小巷里，与我家台门屋并列的就有三幢，冬日可相依挡风御寒，夏天如将所有横大门打开，阴凉的弄堂风嗖嗖，为现今豪华大厦的中央空调所不及。

跨进老屋，迎面有屏门遮挡，平日脚都分左右进出，到了传统节日或逢红喜白丧之时，才敞开屏门，让视线透过前厅、天井直至堂前。漫步在老屋里，它们的每一个部分，门楼、花台、屋檐、砧雕……给人以温馨，给人以美感。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么！这里流淌着岁月的沧桑，唱着人们心中的歌。瓦片则是数不清的音符。堂前正中摆八仙桌，左右沿壁排列精制的太师椅和茶几，上首是置放烛台、香炉及供品的狭长木桌（俗称“搁基”），上端钉挂一匾额，曰“耐耕堂”，可见祖上乃躬耕之家。古人多以“耕读”连举，可是这里“读”字

就没有上匾，更不用说“诗礼传家”了。

老屋又如放大了的一件艺术品。柱头“牛腿”雕狮子，每扇屏门雕着花卉或鱼虫鸟兽。少时我最爱看的是骑马扬鞭、舞刀弄枪的戏剧人物和故事。据说太祖父手里的两兄弟，养山种田，开槽植业，称得上殷实人家。不然是盖不起这般台门屋的。“长毛”（太平军）造反时才渐渐破落，到我记事起，挤居在这老屋的已有四代，十多户，四五十口人。我的祖父是五兄弟中的老大，“大得灶”住进了正屋，但最小的五叔公也同分于此；好在父辈仅两兄弟且大伯常年在外，不至于一间正屋有三只灶头。

我在这儿度过童年、少年，老屋里烙下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也许若干年后，我会将它写进《诉说人生梦》的回忆里。

每逢过节或红白喜事，前厅去壁下屏，打扫清洁，大开正门，轮流致祭或大办筵席，或舞龙灯跳竹马，鞭炮声、锣鼓声不绝，真乃热闹非凡。请年菩萨时，谁家供的肉块大，谁家供的祭品多，最为孩子们所关注。大人们则将垂涎欲滴的儿孙们领进自己家里，哄着说：“明年我家也买个猪头供祭！”在那个年代，祭罢能开猪头，让孩子们能吃块腊香味浓浓的猪头肉，实在是岁末之莫大享受了。

雨天，特别是遇上落长雨的日子，一般都不出门干活了。大人们双手叉抱肋窝，站到天井四周的走廊里说三道四，说得最多的，“也许明天会晴了！”主妇们则哀叹：“再落，灶头也发不着了！”不过，那年月一天吃两餐，并非全在烧镬柴接勿上。孩子们自然不可能体谅父母的忧愁，只顾在涨满水的天井里搭桥、打水撒子、撑箸壳船，忘情地嬉笑。

冬日的晚间，多半早早上楼睡觉，也有的凑到某家坐夜，

点燃油松或篾青，有时也点青油灯或煤油灯，谈天说地，讲些老话题。

老屋里的住户间，难免生出些忌妒、倾轧，乃至为掘笋、斫柴过了“界”的事口角、吵架，但平日更多的是互相帮衬。如暴雨来时，即便半夜三更，一声招呼都会去大溪坑里为邻家义务“抢”纸料。

老屋之险遭不测，是在我外出工作数十年之后的“文革”中。出狱后我才知道，那些发了疯的人，要放火烧掉父亲的住宅！为了不让连成一片的乡邻们也遭灾厄，老父亲丧尽了脸面苦苦哀求造反派。然而，我家的屋顶被戳通，房内陈设也被砸毁。

老房子毕竟要消失，为新房子所替代。随着人丁增多，生活好转，老屋里的人家大多另建新房。为了报效老父，我将“平反”补发的工资也去另建一间，虽说单家独户了，可新屋刚建成，老父亲未曾住进就归天了。如今的老屋只住三四户人家，空空荡荡的，没有从前那般热闹了，但那些熟悉的人影，却不可能从我的记忆中消失，包括早已长眠于地下的老辈人，亦包括当年的青壮年男女如今已成耄耋者。

一九九五年一月

江 边

以“江边”为题征文，是副刊走出的一着妙棋，“棋盘”里大有文章可做。尤以富春江作“江边”，内涵更加丰富，因为富春江是条“迷江”，像少女，像碧玉，如白练，又好比一座储量极丰，含有多种成分的大矿藏，真乃取之不尽！她可以让不同阶层的人去感受，去神思，去领悟，去描绘和倾吐。

试想，有多少人到江边淘过米，洗过菜；即便家里有了自来水，仍有多少人要到江边洗涤大件的衣被帐毯。这些虽然是日常生活琐事，但与老百姓休戚相关，江堤被砂船撞坍缺口，老百姓惋惜，发些议论；江边的水被污染了，老百姓自然有怨愤，更盼政府有举措。人们去到江边，又自然要东观西望，说三道四，大到国事天下事，小到家庭悲欢离合，乃至某些“上街头打杀苍蝇，到下街传为打杀一个差人”的事儿，怎会不让去江边的人生出许多感受？

除却这些，我以为最多者，莫过于在江边钓鱼了。故乡先贤郁达夫，东渡日本之后，就刻备一枚书画印章：“我是春江旧钓徒”。

古往今来，富春江边的钓徒，多得不可胜数。其中最著名者，自然要算东汉的严光了。堪称富阳名胜古迹之一的“严子陵垂钓处”，据清光绪县志记载，富阳境内就有三处。一在县西南大桐州，一在县东赤亭山，还有一处在鹤山。老实说，富阳境

内的这几处严陵钓台，要比桐庐的“钓台”更能钓到鱼。“钓誉”者则另当别论。

有人说，严光太清高，违背了“邦有道则仕”的古训，天下太平了，应该出来显一显身手。有人说：古人云，宦海多风波，与其陷进仕途的险恶，还不如挂冠归田呢！严光是真君子……笔者却以为：一个人应对自己有个符合实际的估计，果真是做官的料，做官也不坏；况且汉光武帝是个开明的君主，借此太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做一个听民勤政、朝乾夕惕之士，岂不快哉！怕的是自视甚高又不学无术，凭借皇帝老儿有点“后门关系”而挂一顶“谏议大夫”桂冠或别的什么衔头，领干薪，尚空谈，那就与尸位素餐的官僚绝无二致，这倒还不如做个“春江旧钓徒”的好。

县东赤亭山的一处严陵钓台，因为找不到旧址痕迹，只好沿江而下，到渔里山交界处的八角山江边，找一位“替身”取而代之。

孤悬八角郁葱葱，垂钓春江处士风。

绿水青山长作伴，布衣真可做王公。

这里也曾隐居着一位明朝正统年间的钓徒。姓俞名膺字古章。他才高学广，却也不愿做官。又因酷爱富春山水，便在临江的八角山上结庐读书，又到山下江边躬耕垂钓。据说，英宗皇帝派钦差专程来请俞膺出山做官，俞膺见那个钦差傲慢无礼，妄自尊大，就拒绝接旨，并且写了一首诗辛辣地讽刺了他。诗云：

一出龙宫便作威，无端推起雪山堆。

分明一派寻常水，装出许多声势来。

那个讨厌的钦差，只好灰溜溜地跑了。俞膺的胆识、学问，对庸碌官场不屑一顾的高洁风骨，足令后人敬仰。

时隔多年，如今赤亭山一带，已辟为富春江经济开发区富春湾区块，并被投资者识为风水宝地，春江花园、高尔夫球场……都将在这里兴建。要不了几年，不但此处的严陵钓台更加难觅，就是现剩的许多风貌景点也将面目全非，于是我想到了，要是在这开发区的东大道江边，在建高楼大厦或别墅群的同时，参照县志记载，恢复“严子陵垂钓处”有多好，何况那一带还有《富春山居图》、《大岭山图》的画面，以及黄子久的隐居地和墓葬地！

江边，可以妆扮得更加令人神往。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痛定思痛话长堤

蜿蜒于富春江两岸的防洪长堤，朝朝暮暮，护卫着千万亩良田，护卫着两岸几十万生灵。它以袒露的性格，袒露的臂膊，肩负千钧重任，身系万家忧乐。

谁会想到，一九八九年的夏天，富春江竟像万匹野马，怒吼狂奔，向着防洪长堤乱冲乱撞而来！这情景之可怕，后果之不堪设想，是当地几代人都领教过的，难免心惊胆颤，不寒而栗。眼下，历史又将重演，悲剧即将发生，数以万计的生灵，抽穗灌浆的几万亩早稻，面临被吞噬的危险！此时的防洪长堤，任凭狂涛扑打，傲然而立，何惧洪妖逞凶，硬是挺着，顶着！

富春江沿岸，县区乡干部日以继夜自不必说了，杭州市市长来了，省委书记和副省长也来到了现场。手持锄头铁锹，担着扁担簸箕，扛着沙包石块，也有背着自家门板的乡亲父老蜂拥而至；还有那些坚强的柱石——解放军也漏夜赶到，他们守着，阻着。然洪水仍在不断暴涨！解放军真不愧为钢铁长城，救灾，运物资，跳入江中排险……军民合一谱写了一曲曲凯歌！长堤总算经受住了考验。虽有局部短暂的决口，但所造成的损失不算很大。

只是，堤身伤痕累累，雄风有失，威力已远不如当年了。

痛定思痛。透过长堤坎坷与疮的裂缝，人们在思索。

作为富春人，不会忘记筑起富春江两岸数百里的防洪大

堤的艰难岁月，刚分得土地的沿江百姓，满怀翻身后的喜悦，为着结束“一滴雨一个泡，沙洲阿嫂爬上灶”、“三个太阳田开裂，一场大雨船当桥”的历史，男女老少，挑灯夜战。当时修防洪堤的人们，多半为粮菜垫肚，蓑衣当被，其艰辛程度，令人难以想象。长堤是历史的见证！

前些年老天爷风调雨顺，又因上游建起新安江、富春江电站大坝，洪水似乎不会再发威了。防洪堤多年失修，拖拉机常年猛跑，早已是遍体鳞伤。还有些人提倡“多功能”，开发种植，办厂建房，葬坟置墓，也把脑筋动到了防洪堤上；截江为渔，围垦造田，以坝代渡，兴许得到了短期效益，但留下了无穷的隐患。

大堤的险情并非今年才第一次出现。前些年，各级领导与有关部门，看现场，筹资金，几经谋划想在堤上和江中认真治理一番。但决心下了，不大；措施有了，不实；没有治到要害处，每每投入大批人力、财力、物力，却仍然难保不决口、不毁田、不坍房。今年亦然，来年呢，风雨人世間，何年无风雨？令人欣喜的是，今年洪水过后，补决口，护堤岸，干得主动、起劲，但愿这不仅仅是为了应付当年的第二次洪水。

要想让长堤恢复如初，唯有开刀动手术，切除堤身之“肿瘤”，对富春江中大大小小的“肠梗阻”来一次彻底根治。为子孙后代计，是痛定之后痛下决心的时候了，但愿经过洪水的洗刷，人们心理上的侥幸也会被冲走一些。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苏东坡与富阳

富阳向为杭州属县。它的山山水水与苏东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富春江的历史文化，受到苏东坡高超的文学艺术才能的熏陶和点染。

公元一〇七三年春，苏东坡第一次从杭州出发，骑马沿钱塘江、富春江至富阳、新城，一路上富春绮丽的水光山色，他诗兴勃发：“春山礚礚鸣春开，此间不可无我吟。路长漫漫傍江浦，此间不可无君语……”正是在这情景交融中，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新城道中》：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
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

这是苏东坡在探风水洞胜境来到新城时写就的，既描绘了似画的明媚春光，又生动地表现了时令民俗风情。

苏轼不但能诗善文，而且擅书画，为一代大家。距新登城南一里许，原为新城八景之一“贤明舒啸”的临葛溪的石崖上，凿有斗大“登云”、“钓月”四字，字字遒挺，笔笔苍劲。据清道光《新登县志》记载，此为苏东坡手迹，并依样拓印于《新登县志》

的景点图上。可惜在十年浩劫中，这四个字连同石崖都被炸毁，荡然无存。如今只好依县志上之拓片，刻凿入鹤山矶头的巨石上。新登城西有名为“塔山拥翠”处，亦为新城八景之一。如今这里已建成了塔山烈士公墓和纪念亭。苏东坡和晁端友（时为新登县令）、晁补之父子，曾在此处饮酒赋诗。为景观所吸引，苏东坡在酒兴浓时，即席画下了《塔山对雨图》，晁补之则在其画上题了两首诗。而今，画已不知落到何处，但晁补之的题诗尚存。这件事情，从清《艺苑拾英》记载的“苏轼曾画《塔山对雨图》”一语可以得到印证。

一〇七三年秋天，苏东坡又从陆路南新方向来到新城。晁补之亲自到南新接候，并顺道到当地东安八景之一的“青牛雪霁”一游。苏东坡曾在青牛岭上亲手种植过松树，还在岭巅的小寺多福院里题了诗：“明朝且复城中去，白云却在题诗处。”接着，他们又去今富阳洞桥乡的古宅陈园访古。这陈氏园典出唐末，时为睦州刺史陈晟的故里，俗称马头陈村。现该处基址犹存，广约数十亩，其中有地两亩许，即为当年陈氏园。苏东坡怀古凭吊，感叹世事之变迁，写下了《新城陈氏园次晁补之韵》的诗作：

荒凉废圃秋，寂历幽花晚。
山城已穷僻，况与城相远。
我来亦何事，徒倚望云讌。
不见苦吟人，清樽为谁满。

这一次，诗人可说是尽了高兴。他和晁补之留下了不少唱和的诗篇。

苏东坡虽然位居杭州州官，却对属县乡村农业十分关注。

那年秋天，浙西一带，蝗虫铺天盖地，洒向稻田。苏东坡为追捕飞蝗，竟亲自来到富阳西北边境的今南安乡浮云岭。眼见这铺天盖地的蝗虫，诗人骑在马上大发感叹。此处与临安的于潜交界，山路崎岖，行人病之；他想到行山路的艰疲，而怀念起他的弟弟苏辙，便写下了《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苦有怀子由第二首》。

西来烟嶂塞空虚，洒遍秋田雨不如。
新法清平那有此，老生穷苦自招渠。
无人可诉鸟衔肉，忆弟难凭犬附书。
白笑遇疏皆此类，区区犹欲理蝗余。

霜风渐欲作重阳，熠熠溪边野菊黄。
久废山行疲苴确，常能春碎舞淋浪。
独眠林下梦魂好，回首人间犹患长。
杀马毁车从此逝，子来何处问行藏。

这两首诗，虽也记录了苏东坡自身的政绩，然而，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名官吏，能深入到如此荒僻的乡村去视察灾情，关心人民生活疾苦，因而被长期传为美谈。联想到他在《新城道中》的“细雨足时茶户喜，乱山深处长官清”句，实为赞扬当时新城县政和民淳。

其实，苏东坡在杭州任职期间，多次到过富阳、新登。会老友，访民情的同时，还为当地的兴水利、除灾害作过实地考察与谋划。仅在何遵所著《春渚纪闻》这部书中，就记有他不少有关富阳的史实。宋元祐四年，他以内相出典余杭时，曾有过“自富阳新桥港之小（筱）岭，开凿以通闲林港”的计划。这对研究

宋时富阳的交通状况很有价值。富阳赵振力先生曾撰文写道：“新桥港今犹存。六十年代建大浦闸后，航运功能已失。但在五十年代末期，小船还可直达新桥以上，这是老富阳都知道的，再早一点是什么情况，邑乘不载，史书不传，《春渚纪闻》中的这一条，应该是最早的了。”可惜这件事“因费用不给，则置山不凿，而今往来之舟航运度岭”。

还应当提及的是，苏东坡在富阳的言行与留下的诗作中，由于他的思想上接受佛老影响较深，又由于他一向喜与有学问、有修养的僧道交朋友，所以他在富阳、新城之行中，常到寺院庵堂庙宇去游玩，在当地的普照寺、妙庭观、普明庵、净因院等，都留下他的游迹和诗歌。但在作品中多少留下时代局限和某些消极的因素。例如，他在《普明庵》诗中，有“不如西湖美酒”、“作诗寄谢翠微翁”等句，是借伯夷、叔齐之不食周粟宁愿饿死的典故，既是怀念前朝遗老，也寓避却隐居不满现实之意。无怪他先以“谤讪朝廷”，继以“讥谤朝廷”屡屡遭贬了。又如，同是在这《春渚纪闻》的卷三《雀鳅蛇蟹之异》中，记曰：“富阳春明村赵二，以网捕为业，年五十卧病逾年，艰饿备至，求死者屡矣。一日觉头痒不可堪忍，爬搔之极，至指甲流血，乃取梳子痛扞，终不快意。遂呼其妇挡发摇头，痒似少止，顷之复甚，则以手助力提掇，遂致脑脱落，而脑间雀嘴丛喱，不知其数，邻里环观，助其诵佛忏罪，以觐速死。两日，始遂气绝。”无疑，苏东坡的这位朋友在这里宣传了一种戒杀生的因果报应说，也显然是宣传其佛教观念的应验。但是，作为历史，作为文学，作为一名职位不小的官员，如此深入地考察民情，并将实践（或据传说）所得加以记述或以创作传世，这亦是很难得的。

九百年过去了，诗人当年在富阳留下的诗作，今天读来，仍亲切感人。秀丽的富春山水，曾为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

材，而苏东坡的不朽诗篇，却又替富阳增添了光辉与情趣。富春山水，富阳人民，将永远怀念着他。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寻觅弘一法师的足迹*

一九八八年秋，富阳县政协和县志办先后收到了来自福建泉州大开元寺《弘一大师全集》编委会责任编辑沈继先先生的来函。说他们在编写过程中，发现“弘一法师于一九二〇年曾进驻你县贝山灵济寺”，“特几度发出公函向你处征稿，请提供灵济寺寺史”。来函还说到，“贝山，又名官山，亦名北山，一九二〇年灵济寺主持为弘伞法师（程中和），请据此线索，觅得知情者为我委撰稿，无任感企之至。”这相继来信和几度征稿，因陈词恳切与急迫，我们没有理由拒之不顾。而这任务齐巧落在我们父女头上，因为一个在县政协文史资料委挂职，一个在县志办工作。似称责无旁贷。

但是，来函提供的仅仅是一个尚待证实的线索，且时隔六七十年，就富阳的寺院而言，均已毁于战祸或破于“四旧”活动；就知情者讲，估计大多已长眠于地下，即使是当年已懂事的小伙子，亦已成了耳聋眼花的耄耋老人，就是知其然怕也难说得清了；至于文物遗墨，历经战乱和“文革”，则更难寻觅；而作为主要地方文献资料——《富阳县志》和《新登县志》的最后版本，前为清光绪，后为民国初年，亦不可能有所记载。

难度肯定是大的，但对方的连连来信要求，没有理由不尽

* 本文与蒋虹瑶合作。

可能满足,况且这位弘一法师(即李叔同),乃是一位杰出的佛学大师,又是近代著名文艺先驱之一。他艺事广博,擅长绘画、音乐、书法、诗文,以“才子”闻名于上海界。他曾东渡扶桑,创立过我国第一个话剧组织“青柳剧社”。他培养了近代第一批音乐美术人才,刘质平、丰子恺曾为其高足。他书法精湛,大巧若拙,曾与一代文人夏丏尊、叶圣陶互为师友,也曾与柳亚子、郭沫若等进步人士翰墨往还……然而,先生后年削发为僧,甘受苦行,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近代名人,很容易被引向谜一样的深谷。

还使我们特别注意到的是,我县的先贤郁达夫曾与弘一法师有过非同一般的交往。四十年代法师在厦门鼓浪屿的日光岩下“坐关”时,郁达夫去作过专访,法师赠以《佛法导论》诸书,郁达夫作七律“长句却寄”。他对法师十分尊重,知其正值坐关,在访前得先约人“去予探一探弘一法师的意见”;他对法师的佛学造诣更是非常推崇。一九三九年在《记广洽法师》的散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广洽法师家在泉州,是弘一法师入室的大弟子,现在中国的法师,严守纪律,注意于‘行’,就是注意于‘律’的和尚,从我认识的许多出家人中间算起,总要推弘一法师为第一。”于是,更令我们想到,如果弘一法师确在富阳新登住过,我们的地方志和乡邦文史,亦当有所记述。

正是这双重责任和浓厚兴趣的驱使,我们先是从涉猎法师在浙江的那一段经历。夏丏尊先生曾做过一篇法师出家的文章。

在李叔同三十七岁那年(1916年),见有一本日本杂志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一年之后,李叔同便跑到杭州虎跑寺试验断食去了。此后他常住虎跑寺习静听法。不久,李叔同拜师了悟和尚,取法名演音,号弘一,开始茹素,供佛读

经。一九一八年暑假，先生就到虎跑寺出家，开始了他一袭海青、破钵芒鞋的苦行生涯。难怪如今杭州虎跑寺还有他的纪念馆。这又使我们想到，作为杭州郊县的富阳、新登，当年法师极有可能来。

我们翻阅富阳、新登县志。据清道光年间《新登县志》第三册卷八《坛庙寺观》记载：“灵济寺（即龙王庙）在县东北三十里贝山，为宋咸淳七年县令陈君宝请予朝赐庙额，明嘉靖邑人陈策等重建。”按该志书记载的灵济寺寺址方位，约在现松溪乡官山村一带。我们便向家在官山村的县信访办沃贵良同志打听，证实不但确有此寺，且毁去不久，寺基犹存。沃还谈到，比他年长的当地一位老人更详知寺中情况，该寺有一和尚前几年才去世，他儿子楼阿惠是那位僧人的同龄人，很熟悉。因该寺为“朝赐庙额”，又令我们想到这灵济寺非同一般，弘一法师去住过更有可能，亦增添了我们去实地一访的兴致。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我们在沃贵良同志导向下，由县政协司机小金开车去了松溪乡官山村。

这官山村位于杭新公路北侧五公里，距杭州市区七十余公里。这里三面环山，只在朝东南方向有个口子，一条简易公路连接着杭新公路。整个官山村由楼家、罗家、沃家和竹窠里四个自然村组成，一百二十多户农家依山建房，散居在方圆约一华里的范围内，大多为房前屋后的竹木半掩半现。且四周鸟语花香，一路溪水潺潺。这是那种常被归入“世外桃源”的村庄。

《新登县志》上所载的贝山灵济寺，还得从官山村再深进二三华里，加上车道不通，我们便在村中歇脚，走访当地知情老人。因为老沃熟门熟路，我们很快找到了六十一岁的楼阿惠。楼的父亲楼云升，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一直是灵济寺

的管寺僧人。楼阿惠告诉我们说：“你们早几年来就好了，我父亲刚过世不久，他对寺里情况一清二楚，又不像我没文化。他曾从寺里带回好些书籍、字画，有人来看过，还有一本专门记录寺里情况的‘寺志’，灵济寺的情况那上面记得明明白白，可惜在‘土改’和‘文革’中被烧掉了。”楼阿惠难以提供有关弘一法师的更多蛛丝马迹，但他对灵济寺的原貌倒说得很清楚，他告诉我们，寺在官山半山腰，山顶还有龙王庙。灵济寺为三开间两进砖木结构建筑，门前挂“灵济寺”三字匾额，但小款他说不上。进门一尊弥勒佛像。背靠弥勒朝里塑的是韦陀菩萨；过天井上台阶为观音娘娘，左侧塑华陀先师像，问卜求签，香火很旺；右边是住房和厨房。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才全部损毁和拆除。楼阿惠还讲到，听他父亲讲，原来这灵济寺寺基面积还要大，香火最旺时曾有五六十名僧人。我们随他到新寺基和老寺基察看，痕迹都还在，只是部分柴草长满，部分已被开垦种上了茶叶。

我们走访的第二位老人是八十高龄的楼华生，他耳聪目明，记忆清晰。祖父是清朝贡生，父亲楼雪梅是晚清秀才，楼华生可谓书香后裔，从小就在灵济寺进出。知道的事自然就更多一些。他绘声绘色地讲了其父参与该寺捉拿“王道士”的事情。王道士是反清政府的武艺高超的秘密组织头头。原先我们想从中听到点什么，但后来听清楚此事发生早于法师的年代，我们只得有意识地转变导向。他说：“在我十多岁的时候，灵济寺的主持僧叫弘伞法师，可没听说过有叫弘一法师的；寺下面的山脚边，曾盖有一间茅草屋，当时空着，有时住着一位杭州来的教书先生，年纪不大，四十左右，说到这里来避暑、写书的，不久因为山上‘出蛟’（山洪暴发）草屋被冲毁，这教书先生也不知去向了，后来听我父亲说，这人非同寻常，常去灵济寺与

弘伞法师为伍。”

楼华生所讲的“教书先生”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关注，而当时灵济寺的主持僧弘伞法师，又令我们想到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时是拜了悟和尚为师，为其取佛门号弘一。这“弘”或许是佛门的一个辈份，这弘伞法师是否同是了悟和尚的弟子？到灵济寺是否为探访师兄弟？经过一番追根究底挖线索，到距官山村五华里的松溪桥头，我们找到了一位叫孙卓人的老人。他比楼华生大四岁，是年八十有四，解放前在新登县政府任要职，又知书达理，熟谙历史，我们就向他直接打听弘一法师。他认为弘一法师确实到过新登，而且提供了比较可靠的史料。他说：“早年我跟官山村的楼秋宾共过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当年他在浙江师范学校就读，正逢李叔同先生执教于该校，师生情笃；先生得悉这位新登籍学生家住杭州郊县乡村，要他在老家选一依山傍水的僻静处盖一简易茅屋，到时可到那里去小住；秋宾应允，茅屋置就，李先生即去居住过；后因山洪暴发冲走，秋宾几度相邀上他家住，然先生执意不允，则转到灵济寺去住了。”孙老先生还告诉我们，这一带留有不少弘一法师的遗文墨宝。在距灵济寺不足五公里的松溪乡袁家村，有位叫袁吉仁的乡绅家里，他亲眼见到过李叔同的书法手迹，只是字句已记不清了。他深有感叹地说：“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洗劫，估计这些文墨已不复存在。”

因为是顺道，我们追踪去了松溪甘坞袁家，不出孙老所料，扑了个空。

至此，我们寻觅弘一法师足迹的任务，只好暂时告就、交差。然而，这番寻觅印象，不易从脑海里抹去。官山、茅屋、灵济寺，还有那些老人们的叙述，令我们依稀见到了一个堪称伟大的灵魂。

一九八九年二月

[补记]

《寻觅弘一法师》一文在《富阳志坛》第二期刊出后,笔者曾收到一位知情老同志徐炳华来信,既是对本文的佐证,又是对拙作的补充。且还提供了进一步寻觅弘一法师足迹及遗物的线索。在本文重印之际,除表示谢意外,特将来信节录,并盼有更多的知情者提供有关于此的史实。

一九九二年十月

徐炳华同志来信节录

蒋增福同志:你好!

我在《富阳志坛》上,看到了你写的弘一法师足迹一文,引起了我的联想,此事我曾关心过……灵济寺(观音殿)解放前有一佛节,阴历六月十九,附近乡里村民连夜上山烧香,年年如此。官山顶有两个庙,上山到顶的路中原建有一个亭子,称憩脚亭,法师住过的茅屋实际上在此亭的附近,四十年代楼秋宾曾打算在该茅屋基地建造一座屋纪念法师,虽破土动工,后未建成。

我从小多次上山斫柴,折笋,山上情况熟悉……关于弘一法师到官山顶,据我所知,完全是楼秋宾的关系。楼秋宾时在浙江一师读书,与法师是师生之交,感情笃实,故在秋宾的引带下到了官山。这事是在四六年秋宾曾对我说过。秋宾小儿子

楼镇奋(叫小毛,已亡)是我同学,我常常去他家……秋宾住在楼屋左边一间,正屋楼不住人,放着四五大箱的书、画和大小不同的许多图章,其中有的是弘一法师的物品,我亲眼见到法师的书画(署名)……四九年我游击队去过官山楼家,秋宾家的实物还在。解放后土地改革,据说这些箱子、书画、印章,都被文盲们毁了、散了。事隔四十年,这些实物是否全部毁灭了呢?是否可能还找到一点呢?我想尽量设法一下……秋宾家官山已无人,其侄子官贤如在的话,可能比楼华生知道的多。

另外,提二条线索:

1、秋宾四十年代有个小老婆(名字已忘)可设法找一下,如活着的话,能知道书画内容,她有文化的。

2、秋宾还有个儿子(大毛),书名可问楼官贤,我已忘,他解放初随我党西南工作团下到四川,现在四川大学哲学系,据说前些年曾回到官山楼家看过……

此致

近祺

徐炳华 十月十四日

没有跑完的接力赛

——一九六〇年修撰《富阳县志》琐忆

县志办的同志约我在《富阳志坛》创刊号上写点东西，回忆讲讲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编写富阳县志的情况。我自当应允。只是当时中断修志后我个人所保存的一些资料，包括工作笔记，写就后已经打印和不曾打印的稿本、参考用书，以及五十年代我在里山“灵峰精舍”所得的一套清光绪《富阳县志》，均因遭“文革”的洗劫而荡然无存，实在感到难以落笔。幸好县档案馆仍保存着那时的资料可供查阅；又幸好当时参与修志的十几位同志中，除周学成同志作古外其他均还健在，他们不但可另外撰文，还可帮我修订这篇小文中的错误或不足。

—

我把修志之大业喻作世世代代要延续下去的一场接力赛跑。而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那次修志是“一棒没有跑完的接力赛”。

“盛世修志”，是我国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优良传统。而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那次修志，恰恰是在我国解放后经历了“升平盛世”后遇上了暂时困难时期。在这种情况下着手修志，特别显得难能可贵。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十几名修志人

员，挤在老档案馆楼下一间大办公室里，有办公桌的不足一半，另一半同志则围坐在两张长长的会议桌上办公。从一九六〇年四五月开始至一九六一年年底止，历时一年有半。虽然是在非常困难的背景下着手进行的解放后富阳第一次修志，但当时富阳县的党政领导都是非常重视和认真对待的。

其一，组成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县委专门下过文件，成立并公布了富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由当时主管党务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县委书记王铿和宣传部长李作运挂帅，一些综合部门的负责同志均入了编委行列。

其二，抽调组织了可称之为年富力强的工作班子。十几名修志人员都是些二十几岁、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是四十出头的。那时服从调配的组织观念比较强，一经决定，部门不会推三阻四，个人不会讨价还价。记得当时我正在桐庐峨山乡一个畲族聚居的村子里，搞所谓改造落后队，接到通知不出三天就到县志办报到了，其他同志大多则在我之前就已开始工作。县志办主任李维正曾是《富阳报》主编；同事中的华文烈、陆左华是机关上过得硬的笔杆子；还有一些综合部门的业务骨干，县计委的包雪屏专管统计数据的复核和提供；商业局的周观详，文教界的周学成，有专业知识又对富阳的地理民情比较熟悉，且颇具采访活力。

其三，主管的领导人比较懂行、开明和支持。这不仅表现在亲自组织班子，亲自听汇报，与我们共同商量解决问题，还表现在当我们工作上发生困难或受到非议的情况下能给予理解和支持。有一件事，至今我仍影响很深：有些同志对修志工作不够理解，说我们太快活，上下班不准时。王铿同志知道后不但批评了这些妄加议论的同志，还特地来到县志办对我们说：“不要去管这些议论，不要影响工作情绪，你们的工作就是

不能搞坐班制，搞文字工作尤其是史料工作是很艰苦的，顺手了多写些，写不出可以自由到各处走走，几天写不出一页稿子也是很正常的。”我们听了很高兴。

其四，当时县档案馆的邵一秋、周祖富、陈银娟三位同志配合是比较好的。他们可称得上是编外的县志纂修人员。在整个编写过程中，他们与县志办的同志融为一体，配合默契，馆内资料随用随调，有些常用的案卷长期放在我们办公室，我们需要且馆内没有的，他们也能帮助去采访收集。给我们工作以较多方便。

二

县档案馆现在保存的，用元书纸打印出的《区域志》、《农业志》、《水利志》，印发日期为“一九六一年十月”。一般说，它表明了那次修志的中止日期（也叫告一段落）。当时部分同志回了原单位，还有部分同志则由县委统一抽调去搞典型材料，为的是让当时的县委第一书记王顺泉、县长孟锡五带去北京参加七千人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批典型材料有：全县性一份多年工作经验总结（主要是讲农业耕作制度改变）；富阳县自力更生办电；常绿乡的“深山坞里亩产千斤粮”等。写就这批典型材料，当时自然是县里第一号大事。加之，此时正当中央发出号召，要全党上下集中精力度过“困难时期”。这些，便是中止编写富阳县志的主要原因。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编就且已打印出的有三卷，即前面讲到的卷一《区域志》、卷二《农业志》、卷三《水利志》。基本收集材料并写就部分稿子的归有六个卷宗，为卷四《史事记要》、卷五《人民公社》、卷六《工农志》、卷七《财贸志》、卷八《政法志》，

卷十《大事记》。已定计划未着手的只有卷九《文教志》。这些卷目的确定自然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痕迹。但至今我仍感到这些材料是有参考价值的,遗憾的是,最近我去档案馆看这些材料时,发现它仍被束之高阁。

这里,我感到有必要讲一下当时制订的“编写富阳县志大纲说明”(以下简称大纲)中的几个问题。

第一,“大纲”一开头说,“富阳县志是桐庐县志的组成部分,是原富阳县的重要历史文献。”这是因为一九六〇年九月富阳县并入桐庐县(一年后又分县),我县着手编写县志不久(不到半年)就并县,编写还没中止又分县。故“大纲”不得不说是“桐庐县志的组成部分”,而实际上却是独立进行的。我们自始至终不曾去翻阅过《桐庐县志》,仅调阅过新登旧志。乃是根据“大纲”所说“是富阳县的重要历史文献”这一点修志的。

第二,“大纲”说:“它要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和记述解放前富阳的历史变革,解放后十几年来富阳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各项工作中取得的丰功伟绩和宝贵经验”;“同时还将记载富阳地区的地理环境、名胜古迹、革命遗迹等概况,作为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参考资料和留给后代的历史考证。”可见,当时就记载的内容讲体现“厚今薄古”是对头的,但又是很不全面的,而且就解放后只讲“丰功伟绩和宝贵经验”也难免影响准确反映史实;就解放前讲,除“名胜古迹和革命遗迹”外,权以“地理环境”概言之,也难以全面反映我县资源和生态等。至于“富阳地区”一说,则是当时并县的痕迹。

第三,“大纲”说,“计划把全套县志分成十三卷”,并详列了卷目,即:卷一《概况》、卷二《疆域和机构沿革》、卷三《中共富阳县地下党史》、卷四《解放后主要政治运动》、卷五《互助合作和人民公社》、卷六《农业史》、卷七《工交史》、卷八《财贸

史》、卷九《文卫史》、卷十《政治史》、卷十一《人民武装史》、卷十二《人物志》、卷十三《大事记要》。其实从实践过程中看并没有按照这份开头拟订的编写大纲行事。它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认识的深化和进步,但仍留下了局限性和不科学性。例如到后期曾将原编写十三卷的计划改为十卷,撤并了卷一到卷四以及卷十一和卷十二;又如,撤并后变成十个卷的项目,不全面不科学仍是显而易见的。再如,已写就的(包括打印出的或未打印的已就稿)各卷章节的划分,也是不全面不科学的,像《政法志》之六章,分别为贯彻婚姻法、兵役制、民政工作、选举制度、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这种单独列卷为政法志值得商榷,归入的内容又显然是不全面的。所有这些,我以为一是与当时“左”的指导思想有关,二是当时确因缺乏编写新县志的经验。

三

回顾参与那段时间的修志工作,我以为有经验也有教训,有可取的更有不足的;就个人而言,倒是有不少得益的。这里仅说几点感受较深的。

第一点,挖掘和抢救史料的工作做得比较认真、扎实。从清光绪三位知县的任期才完成最后一部《富阳县志》到六十年代我们着手修志,相隔时间实在太长,期间又有两方面的特殊性:一是清朝末年到民国至解放前,中间战乱特别频繁,又加政治制度腐败,本来不健全的档案资料因历经战祸,几乎散失殆尽。二是清光绪《富阳县志》编就后,本县灵桥一位有识之士叫朱邦彦的,曾写过一本《富阳县志洗》,提出了许多质疑和批评意见。为了要对旧志进行甄别,为了填补历史上大事空白,

周学成同志曾三上宁波天一阁，想方设法从这国家级的文保单位借出有关富阳的历史档案，聘用当地一位社会赋闲文人负责手抄。我也曾去过浙江档案馆、图书馆和杭大图书馆等地，以及到富阳城乡访老求贤，获得过不少资料。但遗憾的是，那本《富阳县志洗》始终没有找到。我们还在富阳镇上召集过两次老一辈知名人士座谈会，郁养吾、洪仰山医师等，就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三亲”史料。如北伐军到富阳的详细材料，五四运动时富阳演文明戏的材料，以及提倡国货抵制洋货、运动场上烧毁日货的场景材料。辛亥革命时富阳知县逃跑，由左堂代理知事，这位代理知事的长辫子，就是被当时在杭州陆军小学读书的郁养吾等一批学生闹革命到富阳剪掉的。自此，全县掀起了剪辫子运动。对此，华文烈和我都有详细记录，可惜未经完全整理，连笔记本也被文革中的造反派抄查去了。时过境迁，如今再要想得到这些史料已不可能。

第二点，有计划却没落到实处，专业修志与发动部门、群众修志没有结合进行，这是一个很大的不足。当时拟定的编写大纲说：“计划把全套县志修成十三卷，其中卷四起至卷十一，可分割出来单独成史，并由各有关部门自己负责编写或抽调人员编写。”这里所讲的“卷四起至卷十一是指部门志，当由各有关部门自己负责编写”，作为县志办主要承担的只是综合志和对各部门志的最后修订和审定。然而，实际却没有这样做。我们县志办在编写实践中也自己否定了自己，如《区域志》外我们还编就了《农业志》和《水利志》，至于“由各部门自己负责编写”的工作则没有做。当然，就当时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例如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又如并县分县，机构、人员变动较大，部门无力也无心思去做。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能坚持来个全面发动，要求各部门动起手来编写部门志，即便中断，也会获得

大批资料——其中不乏当时可得如今不可能得的史料，对现今写部门志和总纂《富阳县志》都会非常有益。

最后，讲点我个人的得益，我在参与一年半的编写富阳县志工作后，感到比较大的收获是，了解了不少富阳县的乡邦文史。这在我后来到县广播局任职时，能以举办“富阳风貌”节目且又自己参与采访、撰文，直到最后编印出版三集《富阳风貌》小册子，与那段工作经历培养的兴趣和积累了些资料很有关系。这几年，在对外开放接待中，在应邀到县委党校去讲讲富阳乡邦文史时得以应付过去，也是那时打下了一些基础。最近我在编写《富阳游》小册子，手头或回忆里有些资料积累，就感到比较地顺手。

爱祖国要爱故乡，爱故乡要了解故乡的过去和现在，这该是比较普通的道理。为此，我不但殷切地期望这次纂修的富阳新县志能早日问世，而且今后要有常设人员，每年搞个年鉴或大事记之类的资料，让这接力赛一棒棒传下去。

一九八九年一月

劫后余烬补史缺

——一九六一年修志时一次座谈会记录

这里所讲的“劫”，是指许多文化遗产被“史无前例”的毁于一旦。未免于三年牢狱之灾的我，斗室中那些算不上弥足珍贵的文品，自然也被抄洗得荡然无存。而一次偶然的机，最近竟让我觅回了些许“余烬”。谓之“史”，乃乡邦文史也。

富阳政协已跨入第三届，文史资料也出过三集。我虽已退出政协，却仍被聘“缠”着不能脱身。第四集选编什么？同仁们商量再三，但却总感到，自辛亥革命发生、“五四”前后这段时间里，富阳境内所发生的重大事件、风云人物，记载实在太少。追溯到六十年代初修《富阳县志》时，我们也曾有过同感。历史悠久、文化之邦的富阳县，对清代以前的乡邦文史，记载相当详尽；然而，一旦涉及辛亥革命前后这段史料，常常笼而统之地以“解放前”略略带过作罢。最近跟县志办的一些同志说及，也觉得辛亥革命以后至民国初年这段史料比较匮乏。一九八九年县志办编的《富阳志坛》创刊号上，我以《一棒没有跑完的接力赛》为题，写过一篇一九六〇年编纂富阳县志琐忆。其中有这样一段：

……清光绪《富阳县志》编就后，本县灵桥一位有识之士叫朱邦彦的，曾写过一本《富阳县志洗》，提出了许多

质疑和批评意见。为了要对旧志进行甄别，为了填补历史上大事空白，周学成同志曾三上宁波天一阁，想方设法从这国家级的文保单位借出有关富阳的历史档案，聘用当地一位社会赋闲文人负责手抄。我也曾去过浙江档案馆、图书馆和杭大图书馆等地，以及到富阳城乡访老求贤，获得过不少资料。但遗憾的是，那本《富阳县志》始终没有找到。我们还在富阳镇上召集过两次老一辈知名人士座谈会，郁养吾、洪仰山医师等，就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三亲”史料。如北伐军到富阳的详细材料，五四运动时富阳演文明戏的材料，以及提倡国货抵制洋货、运动场上烧毁日货的场景材料。辛亥革命时富阳知县逃跑，由左堂代理知事，这位代理知事的长辫子，就是被当时在杭州陆军小学读书的郁养吾等一批学生闹革命到富阳剪掉的。自此，全县掀起了剪辫子运动。对此，华文烈和我都有详细记录，可惜未经完全整理，连笔记本也被文革中的造反派抄查去了。时过境迁，如今再要想得到这些史料已不可能。

不久前，我竟失而复得——一本封面印有“奖”字、下端为天安门图案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编写富阳县志札记”，落款时间是“六一年五月十五日”；然而破残不堪，缺页甚多，故我把它叫做劫后余烬中之余烬。从其残存页码中，见到记有此史实的部分内容。现公布出来，也许可作些拾遗补缺。

一九六一年九月六日城关老人座谈会

出席者：

郁养吾(医师)

洪仰山(医师)

何绍奎(城东街老农——补注)

郁：太平天国的军队在富阳，前后住了三年，中沙是买卖街，作为主要贸易集市；富阳街上以设“天牢”为主。现在馆驿里(富中门口)，有个在船上打篷的柳和尚，据说是湘军的子孙，可访之。

新义的千家村，据说原来有千户烟灶，太平军时被烧光杀光。但是在我看来，对太平军的评价上，民间往往受正统影响，老百姓中好几代传下来，都把他们说成“长毛”，而且把“长毛”作为杀人放火的代名词。这与受清朝统治者的舆论诽谤有关。我以为太平军确曾在富阳杀过人放过火，但也与富阳地方武装民团抵制所为分不开。而且也有清兵打扮成太平军杀人放火的。所以，在编写新县志时，对清光绪县志上此类记载要鉴别。

湖源下南坞的费家，也是太平军时从南京逃来的。

洪：太平军里有一个头目住在中沙，富阳街上一位姓俞的人(可能是俞巧林的父亲)，在这个头目下做事，那头目曾托他做一双鞋子。鞋子做好过江拿到中沙去，不当心一只掉进富春江里。姓俞的急得很，怕杀头。后得知这个头目喜欢吃鱼，就拿了根钓鱼杆到鹤山矶头去钓鱼，据说那时富春江里的鱼木佬佬多，他钓到了一条三斤二两重的鳊鱼。他便拿了这条鱼又过

江去对头目说：“知道你很喜欢吃鱼，我去钓了条富春江里最好吃的上等鱼献给你（富春江鱼的鳊、白、鲈、鲫、鳊座次排列也许自此始）。不过，我钓鱼时不当心，把送给你的鞋子中的一只掉到江里去了，过些天再给你重做。头目大喜，免其刑罚。从那时起，富阳街上这俞姓人家一直不吃鳊鱼。

何：鸦片战争前，富阳人民向以勤、俭、朴三字著称，由于湘军带入鸦片，当时沿江各店号都开乌烟盘，店号统为“清水洋烟”，也有叫“花烟盘”的。

郁：辛亥革命发生后，清政府在各地的政权机构，先后纷纷瘫痪和倒台。富阳知事见状先行逃走，由左堂代理。杭州开始剪辫子后，我们陆军小学的富阳籍学生，也有一些远在外地不便回乡的，我就策动他们到富阳闹革命。一到富阳，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就冲进了县堂衙门。由我把代理知事左堂的辫子剪了下来。接着，我们拿着辫子，一齐拥出县衙。

“这是刚从县官头上剪下来的辫子！”

我们在街上扬着辫子大叫。

然后，由我们这些杭州陆军学校的学生，配合街上比较激进的一些青年，手提剪刀，剪了好多城里人的辫子。第二天，见街上的人，特别店号老板，大多已被剪了。未被剪的也躲了起来。我们便商量在东门渡、恩波桥和从猴岭子进城的小北门，设卡站岗，见人就剪辫子，一连闹了三四天，见进城的人少了，又回到了杭州。

洪：当时我分在东门头，见有的人被剪了辫子后，竟捧着头哭了起来，说难看死了，回去俚个弄？也有的到街上买了帽子，买了笠帽戴着才回去的。

何：运动场上烧洋货也是很热闹的，一些商店老板……
（缺页）

笔记本上所记录且能见到的便是这些了。如今这三位老者早已作古，再要想得到自然是不可能的了。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富春揽胜

历史悠久的富阳

富阳县从建治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秦时称富春，到东晋才改为富阳，且经多次易名。县境范围在各个历史时期迭有变化。

古分天下为九州，富阳在扬州地域。春秋时，为越国所属。战国时，楚威王大败越国，夺取浙江以西土地，乃归属楚国。公元前二二二年，秦始皇使大将王翦平定江南，后又统一中国，结束了封建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郡县制，始在富阳设县治，称富春县，归属会稽郡。当时县境范围很大，现在的桐庐、建德、淳安，以及原来的分水、寿昌等县，都属富春县。

西汉沿秦旧制不变。直至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富春县改置侯国，由朝廷直接管辖。其后王莽篡位，富阳曾称诛岁县，仍属会稽郡。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复称富春县，改属吴郡。县境范围大致与秦时相同。

三国时，富春县始属东安郡，后改属吴郡，但县境范围大为缩小，如现今的新登区当时也单独设置为新城县了。

东晋太元十九年（公元394年），富春县改称富阳县。这次改县名的原因，是为了避晋武帝妻、母的名讳。因为晋武帝之母文宣太后小名阿春，其妻宣穆后小名春华，都有一个“春”字。这就是富阳县名的由来，到现在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了。

南北朝梁太清六年（公元552年），叛将侯景作乱，侯景部

将刘神茂占据了富阳，改富阳县为富春郡。后来侯景被剿灭，废富春郡为县，仍称富阳县。南北朝陈时，富阳县曾一度归属钱塘郡。

隋朝开皇九年，废钱塘郡，置杭州，富阳属杭州；大业三年，改杭州为余杭郡，富阳属余杭郡。大业十一年，农民起义首领东海豪帅李之通，率数万人马，渡淮河下江都，自称楚王。富阳一度在他占领的地区之内。李之通自立为王后，即改变其占领区内的地方建制与名称，富阳县被改为桐州，仍属杭州。唐朝武德四年，又恢复富阳县，先后归属于杭州郡、浙江郡、余杭郡。在此期间，新城县曾一度并入富阳县。

五代十国的吴越王钱镠与吴王杨行密交恶。因杨行密的姓与富阳的“阳”字同音，钱嫌恶，于吴越建国二年再将富阳县改为富春县。宋朝太平兴国二年，吴越国降宋，富春县仍改为富阳县，始属杭州府，后属临安府。到元朝至正十五年，富阳县改为杭州路总管府所属。明、清两朝富阳县都属杭州府。

民国初期，富阳县属钱塘道，不久道制被废，直属于省。后省以下建立专区，富阳县先后属一区、三区、九区管辖。

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富阳解放。初期，富阳县归属临安专区。一九五二年临安专区撤销，富阳改为省直辖县。一九五五年改属建德专区。一九五八年底建德专区撤销，富阳县归属于杭州市。一九六〇年九月富阳县并入桐庐县；一九六一年底，桐庐、富阳分县。直至今日，富阳县仍归属杭州市。

上述历史沿革说明，富阳是一个具有古老历史的县份。富阳人民祖祖辈辈在这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劳动创造，为我们伟大祖国的悠久文化谱写下璀璨的篇章。然而，两千多年来，随着朝代的更迭，富阳建制变化频繁，这也反映了富阳人民的祖辈常常生活于政治动乱、甚至战祸之中，以致富阳不

富，人民见不到阳光。解放后，富阳人民翻身作主人，改天换地展新貌。在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声中，富阳一定会更加富裕兴旺起来。

一九八〇年一月

富饶美丽的富阳

富阳县是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县份，也是个有山有水有平原的好地方。境内山川秀丽，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尤其是水光山色，吸引了古今许多名士为之讴歌。南北朝的谢灵运，唐朝的李白、白居易，北宋的苏东坡等，都曾留下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古人虽然有些过誉，不过，要是能饱览一下富阳大自然的绮丽景色，确是美的享受。

富阳地理位置在北纬三十度，东经一百二十度，处于浙江西北部，为全省腹地。它的北面连接杭州、余杭，西面紧靠桐庐，东与萧山接壤，西北与临安相接，南与诸暨、浦江毗邻。县内山峦起伏，地势自西南向东偏北倾斜；富春江自西向东横贯，将全县分为南北两部。江北的皇天畈地区为全县最大的平原。境内最高点为龙门山杏梅尖，海拔一千一百零五米。最低处是皇天畈，海拔只有六米。全县东西长约七十公里，南北宽约五十公里，总面积为一千七百四十五平方公里。其中山区占百分之三十五点五，半山区占百分之四十九点二，沙洲和畈区占百分之十一点二，江面占百分之四点一。所以，通常称为“八山半水分半田”。全县现有人口五十二万七千多，平均每平方公里为三百零九人，是全省人口密度较大的县份之一。境内居住着汉、畲、苗、回、满、壮、彝等兄弟民族，其中大部分为汉族，

其次是畚族。全县有自然村二千三百九十一一个，划分为五个区，两个镇，四十个公社。

富阳境内的山脉分南北两系。南系为连接福建、江西、浙江三省的仙霞岭余脉。其中一脉由萧山入境，起自向铁岭，向北则形成渔里山区，主峰有安顶山、灵峰山、石牛山等；向西则形成大小源山区，主峰有白洋坪。一脉由诸暨、浦江入境，起自天堂岗，向北偏西延伸，形成整个南部山区。主峰有大岭山、白洋尖、石岩山、龙门山杏梅尖。这条山脉的一支，由天堂岗靠浦江边境向西伸向桐庐县内，另一支向北偏西而走，为湖源山区，主峰有大挂坪、景山。北系以天目山为鼻祖，其中一脉由临安入境，起自仙洞山，向南偏西伸展到新登，南西沿江直上，组成西部山区，主峰有屏风山、官山、大顶山。一脉由余杭入境，起自筱岭，向东偏南伸展，组成北部山区，主峰有东坞山、大黄岭、如意尖等。

富阳多名山洞壑。县城中的鹳山，为全县一大胜景，闻名省内外。与城隔江对峙的亭山，雄伟壮观，风光宜人，山上留有数处胜迹，“亭山积雪”曾一度被列为“春江八景”之一。此外，像樟岩山、白龙山、西岩山、洞山、胡鼻山、赤松山、天钟山、龙门山等，自古远近闻名。最近，在三山、新桐、新联、新义、三溪、贤德、南安等地，发现了许多奇异的山洞。其中西岩山的迎曦洞、盘龙天洞；杜山顶的仙人洞、葛堡洞；新义境内的洞山洞；南安公社的灵隐洞等，尤为引人入胜。洞内，有的石笋石柱林立，宛如冰凌；有的钟乳垂滴，形同玲珑珍珠；有的削石为像，状如十八罗汉，飞禽走兽、卧龙伏虎，鬼斧神工，千姿万态。

富阳的水以富春江为干线，其他水流都汇入江中。富春江上连新安江、衢江和金华江，经桐庐合分水江；出富阳东下会浦阳江，行经旧钱塘、萧山两县之间，始称钱塘江。富春江在富

阳境内江面有七万二千亩，长四十二公里。自古以来，富春江的江水涨落多变，江心积沙成洲。自上而下，比较大的沙洲有大桐洲、王洲、中沙、新沙、东洲、铜盘沙、大小沙等。据清朝《富阳县志》记载，大桐洲世传为严子陵垂钓处；王洲旧名孙洲，也叫洋涨沙，相传后汉时孙权的祖父孙钟在此种过西瓜；现属东洲公社的新沙和渔山公社的大小沙，在清朝道光前无人居住。这些沙洲，四面临江，遍栽桑、柏、樟、柳，每当仲春，绿影婆娑，远看犹如块块翡翠，镶嵌在“玉带”之上。然而，这一带沙洲，历代多水涝，常沦为“鱼鳖之地”。解放后筑堤防洪，机电灌溉，加上上游建成了新安江、富春江发电站，水位稳定，旱不怕，涝不愁，平展展的沙洲，都成了“鱼米之乡”。除富春江干线外，还有数十条南北支流：北有新桥港、青云浦、上里山溪、六诸港等；南有湖源溪、剡浦、大源溪、小源溪、渔溪等。解放后，富阳人民治山治水，变过去的水害为水利，这些支流面貌大变。

富阳地处亚热带中部，气候温暖湿润。常年平均温度在十六度左右，最高温度在四十度略高一点，最低温度曾到过零下十四度。一般五、六两月多雨，七、八两月常旱。全年无霜期二百二十天到二百四十天左右。这样的气候条件，对发展农业生产极为有利。富阳县一向以生产粮食为主，土特产和其他多种经营的品种也很多。据县志记载：“富春烟、富春纸、富春白术、富春冬笋，皆名驰京省。”烟原产东梓、图山一带，自抗日战争后产量递减。土纸生产已有一千九百多年历史，大源稠溪的元书、大青宵井的坑边在全国享有盛名。原产亭山的天然白术，药效卓著。富阳多竹林，嫩竹为造纸主要原料，老竹能制作各种竹制品；现在山区多竹的社队，普遍兴办了竹制品加工厂。民间擅长竹制工艺。富阳工艺美术品厂生产的新品“竹贴屏风”，被誉为“艺苑新蕾”，行销国内外。富阳的蚕茧，在清光绪

年间，曾“上驾嘉湖”。茶叶生产历史悠久，素以优质闻名，特别是里山的安顶云雾茶，是古代的贡品，解放以后被列为全省名茶之一。“十里红柏”，不但使富春江秋景添色，也为国家提供了轻工业原料。三山板栗远销国内外，誉为佳果。

富阳地下矿藏丰富，水陆交通便利。与浙江省会杭州，相距仅四十公里，横贯全境的杭淳公路和富春江均可直达。县内各公社都通了汽车。富春江江面广阔，水流平稳，水上货运和客运，上通桐庐、建德、兰溪，下达萧山、杭州，县境内有十三个公社通航。为发展农业生产，活跃城乡市场，开发旅游事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可是，如此富饶美丽的富阳，在旧社会却充满着血和泪。从明朝韩邦奇的一首歌谣中，可见一斑。

富春江之鱼，富春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
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昊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
鱼何不生别县，茶何不产别都？富春山，何日摧，富春江，何日枯？
山摧茶亦死，江枯鱼乃无。呜呼！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

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十多年来，富阳人民取得的成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但是，要完成未竟的事业更伟大、更艰巨。我们深信，有共产党的领导，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富阳人民定能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把家乡建设得更加富饶、美丽。

一九八〇年二月

富春渚

在洁白如练的富春江上，错落有致地点缀着十多个大小不等的沙洲。这些沙洲四面围波，晨披纱雾，晚挂落霞，春花铺锦，秋林染丹。洲上，河渠交错，村落棋布，竹树成荫，田园似画。每当夕阳西下，从江滨放牧而归的牛羊成群，云雀撒下的银铃声与牧歌相应和，悦耳清心。我国山水诗鼻祖、南朝诗人谢灵运把这些沙洲称为“富春渚”，并刻意写下“溯流触惊急，临圻阻参错”的诗句，赞美富春江特有景色。

诸沙洲各有千秋。最古老的是富阳城上游五十里的桐洲。《钱令旧志》记载：洲上“有石濑，世传为子陵垂钓处”。《唐地理志》云：洲上“有桔以供贡”，品质为“江东之最”。桐洲现分大桐洲、小桐洲，属富阳县新桐公社。

最年轻的要算鹿山对面的鹿洲。二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碧波，如今却已绿影婆娑，突出江心。最近，富阳旅游规划办公室拟将它辟为江心公园（注：后又观其形取名为月亮岛），放养观赏动物。因四面临水，无需篱栅，或竹筏荡悠，或驾艇飞驰，旅游者可任意追逐取乐。如再引水建池，饲养鱼虾，开设“富春江鱼味馆”，可让外来游客随时尝到富春江鲜味。

最为文人称颂的是中沙。中沙与县城仅一江之隔，从东门过渡即至。沙上春多桃花，秋多红柏，景色优美。清人邵士庄《中沙桃花赋引》说：“富春诸沙，抱江为堦，村落依然，鸡犬桑

麻，别有天地。中沙更多种桃树，每岁仲春，花放不异武陵。”春江八景中“中沙落雁”一景，亦颇引人入胜。

面积最大的要算“江流绵渺曲围沙，村落纷纷聚水涯”的东洲。它长三十里，阔十里，位于县城之东而得名。元末开始住人，现已发展到二万八千人口。东洲是富阳著名的粮仓，蚕茧产量占全县四分之一。

名气最大的是出过皇帝的王洲。“双橹摇江迭鼓催，伯符故国喜重来。”陆放翁的诗句，使人自然地想起汉末创立江东霸业的英雄孙坚和孙策、孙权父子。孙权的祖父孙钟曾在洲上种瓜为生，这块地如今还叫雄瓜地。孙权的后代，还保留着孙权的图像和宗谱。

富春渚早年多洪灾，一遇大水，就只见树梢不见洲，不知吞噬了多少生命财产。解放后，上游建了新安江、富春江水电站，洲上筑起防洪堤、排灌站，不怕旱，不愁涝，五业兴旺，成为富阳县最富庶的地方。

一九八一年三月

龙羊二奇泉

富阳龙羊山区，古木森森，千峰竞秀，万泉争流。苏东坡曾被这迷人的景色吸引，吟道：“二曲林泉胜，三川气象侔。近山麸麦早，临水竹篁修。”这首短诗，突出个“水”字，写出了龙羊风景的特色。龙羊山林间的泉水，不但清冽甘美，且饶有奇趣。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洞顶泉和咽泉。

洞顶泉在贤德乡巨龙村。顺着水声潺潺的巨龙溪走十来里路，左边山腰蓦然出现块庙宇般的大岩石。巨石下端，一股泉水像束散乱的丝线，悬挂在百米陡坡上，落进“两丝潭”。这潭很深，据说要用一两丝线才能放到底。

从“两丝潭”到洞顶泉源头的这段山路，险峻陡峭，有时不得不手脚并用。一登上洞顶，顿感心旷神怡，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派奇异的景色：几十丈高的悬岩下部，有个五六丈高，一二丈宽，三四丈深的石洞，底面全是宜做盆景的假山石，高低曲折，错落有致。上面，芳草茂密，杂以白花点点。洞口，三五株古树，在山风中向游人点头致意。洞中的石缝里、蜂窝状小洞里，数不清的泉眼，喷涌着洁白如银的泉水，冲破绿草的封锁，岩石的阻挡，时分时合，急匆匆奔下山去。洞外晴空万里，红日高照，而洞内寒气袭人，雨丝飘飘。原来，洞顶悬挂着不少钟乳石，有的像观音手，有的像倒垂的莲花，还有的像芭蕉叶子，从岩壁渗出的泉水，顺着钟乳石滴答往下掉。晶莹的泉水——大

自然的能工巧匠，造就了这些光怪陆离的工艺品。

听一听洞顶泉的泉声，是另一种美的享受。从小洞喷出的泉水发出低沉的“扑、扑”声，从石缝涌出的泉水发出甜脆的“淙淙”声，加上沙沙风声和百鸟啾啾，伴以洞顶有节奏的滴水声，谱成优美动听的自然大合唱，令人遐想，令人陶醉。

洞顶泉最奇特处是天越旱，泉水越大，真不知水从何处来。传说洞顶泉生在龙脉上。有龙就有水，所以永不涸竭。也有人说，洞顶泉通徽江。一个徽州人从徽江撒下荇糠，过了七天七夜，从洞顶泉漂流出来；旱天，徽州人堵江蓄水，水位增高，这里泉水就越大。最近，当地人设想在这里建座小水电站，一年四季都能发电，似乎从此就不会有枯水期了。

咽泉位于三溪乡的枫林坞，泉水从一块桌面大的石灰岩下涌出，口头有个三尺多长，一尺多宽，七八寸深的水潭。如果你注视潭面水位，就会惊叹不已。刚才还是水流哗哗的泉水，突然小下去，浅下去，最后枯竭，石池内也浅下去几公分。过十来分钟，水不知从何处而来，渐渐满起来。再过二分钟，水从潭里溢出来，可流三分钟，而且水流越来越大。最大时，泻作一尺多宽，二尺多高的小瀑布。旋而又浅下去，十五分钟一周期，浅而复溢，循环无穷。

这口泉早已被人注目，作为旧新登县的八景之一，称为“枫林咽水”，载入县志，并绘有图景。为什么叫咽泉？县志说，泉水来时时止，像人喝水，喝一口停一下；水来时，石下“咕咕”作响，如水下咽喉一样，于是便称咽泉。当地人以为这口泉是圣泉，称为“噎水灵官”。相传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三溪，见枫林坞内古枫参天，环境清幽，乐而忘返，不觉喉干舌燥。走到泉边，狂饮一阵，水呛入气管，差点噎死。乾隆皇帝感叹地说：“泉水虽好，嫌来得太快，口渴者容易丧命！”皇帝金口，从

此泉水“遵旨”，不再连续不断地涌出来了。解放前，泉边常有人焚香点烛，顶礼膜拜。至今，泉边石头上还残存清朝乾隆年间的石刻。有人上山观看咽泉，下来时，当地人总要问：“你去的时候，泉水满起来还是浅下去？”如果回答是满起来，那就赞扬你会走红运；反之，当然就是倒运的兆头了。在他们的心目中，咽泉是灵官，能知过去和未来。

人们对咽泉的迷信，是因为不能理解它的成因。其实，要讲清道理也不难。这种泉学名叫“虹吸泉”。虹吸是物理中的一种现象。把一条胶皮管子的一头放在水盆里，另一头垂挂在盆外比水面低的地方，用嘴吸去管内空气，盆里的水就通过管子汩汩流出，这就是大气压力造成的虹吸现象。奇异的虹吸泉正是这样的道理。这种泉多数出在石灰岩地层。石灰岩受地下水溶蚀，在内部形成了一些沟和洞。当它们凑巧连在一起时，洞就像前面说的水盆，沟就好比胶皮管。地下水汇集到洞里，到了一定高度，挤走了沟中的空气，泉水就奔流而出，直到流完。这时，泉水就止了。等溶洞再积满水时，泉水又来了。虽然虹吸泉的道理很简单，但石灰岩中的溶洞和沟巧妙地搭配在一起，自然界极为罕见。因此，咽泉是十分难得的奇景。

一九八〇年夏

富阳严子陵钓台

多少年来，人们把桐庐七里泷峡谷当作严光唯一的隐居地，而不知富阳县境内还有严先生的三个垂钓处。

据《钱令旧志》记载，严子陵垂钓处一在县西南桐洲，一在县东赤亭山，还有一处在鹤山。

桐洲是富春江上一沙洲，四面临水，景色绮丽，现属新桐乡。赤亭山现称鸡笼山，属东洲乡，严子陵垂钓处的江段，已被围建成有二千四百亩面积的大鱼塘。宋朝淳熙年间，县令李迪更在鹤山修严子陵祠，内立石碑，上刻“钓台真迹”四个字。鹤山的西南面，石矶深入江心，江水在此回旋成潭，鱼虾聚集，是垂钓的理想场所。矶头，古人立有石碑，高约四尺半，宽近二尺，上刻“严子陵先生垂钓处”字样。

富阳的三处严子陵钓台风景秀丽，和七里泷钓台相比较，别有风味。明代的徐文长游鹤山时，在子陵祠题了一首诗：“碧水映何深，高踪那可寻。不知天子贵，自是古人心。”张以宁在描述《赤亭山钓台》的诗中说：“故人已乘赤龙去，君独羊裘钓明月。”钱宰的《桐洲诗》：“溅溅桐江漱，白石灿如语；上有子陵台，下瞰富春渚。”这些题咏，为富阳的钓台古迹增添了不少光彩和情趣。

一九八〇年九月

龙门山

龙门山是仙霞岭余脉，坐落在县城南面四十华里的龙门古镇。

龙门山山势雄伟，怪石峥嵘，幽谷飞瀑。古往今来，吸引了不少游客，并为它留下了许多赞美诗词。在当地和周围的群众中，还流传着有趣的民间故事。

山上有上、中、下三个水潭，传说潭里有蛟龙，人们称为龙潭。上龙潭又叫“钵盂潭”，旧社会时，每逢旱年，人们成群结队到这里“迎龙祈雨”。潭旁，石壁峭立，足有百余米高。一股清泉形成瀑布从岩顶呼啸而下，注入龙潭，激起千万颗珍珠，上下翻滚。遥看瀑布，像是白练悬挂在天际，大有“银河从天落”之感。古人描写这里的景色是：“云过疑崖动，溪鸣似雨来。”“双崖摩日色，万壑隐雷声。”下龙潭水浅，潭畔有块巨大的石头，形成十多平方米的平台，可摆桌子和祭品，叫做祭台石，从前是祈雨接龙举行仪式的地方。中龙潭水深，传说可通东海龙宫。三个龙潭逐级而下，流水出谷口而成为碧清的龙门溪。最近，龙门山林场和山下的龙门公社联合勘察，动工修建六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一千多千瓦。说是为此山镶嵌上夜明珠，可增加新的色彩。

龙门山有许多形状奇特的岩石。下龙潭两旁的山腰里，铜鼓石和金钟石左右对峙；南麓的龙头石同老鹰山顶的老鹰石

隔山相望。传说这些石头，原来一到午时三刻，都能发出声音，后来被一位法师点破，才由“活”变成了“死”的。此外，还有鼻头石、板壁石、谷仓石、轿子石、和尚背娘子石等。都生得惟妙惟肖，悦人心目。

山上的杏梅坞和山脚的桃子坞古时各有寺院。下面的一座叫龙门寺，建于晋代，最多时住过一千多个和尚。现在还有部分殿阁残垣保留下来，但没有佛像，成了龙门林场的场部。山上那座寺院，唐朝年间香火很盛，现在只存下残迹了。寺院的屋基上新建造了一批房子，有几十个林场职工住在这里植树造林和管理林木。自一九五八年国营龙门林场建立以来，造林一万二千多亩，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五，木材储量超过二万立方米。林场工人身居深山，以场为家。

龙门山的主峰杏梅尖，海拔一千一百多米，是全县的最高峰。山顶风特别大，入冬最先下雪，开春最迟化冻。从山下看杏梅尖，常见白絮似的云朵缭绕山腰，巨大的山峰，只露出馒头似的山尖。登上杏梅尖，可以看到富阳全貌，要是万里晴空，还能看到杭州的钱江大桥。四下望去，富春江像白色带子，城镇乡村星罗棋布，远近的层层山岭，俯伏在脚下，有的像猛虎雄踞，有的像蛟龙游动，千姿百态，令人心旷神怡。西边，有一条和杏梅尖相连的山梁，据说，它有幸会见过明朝皇帝朱元璋，故名“会皇梁”。元朝末年，朱元璋初次发动农民起义失利，曾单身逃经此地，饿了，采摘山里果充饥。从那时起，“会皇梁”的山里果生得又红又甜，个儿特别大，鲜美可口。

龙门山的土壤，乌黑油亮，非常肥沃。龙潭边的檫树林，是全省生长得最好的，山腰的杉木林，茂密得透不过阳光。杏梅尖本来只生长杂草和矮箭竹，近年来，林场工人在这里试种树苗成功，使十多种树在这里长得郁郁葱葱。龙门山下的西北面

有一百多亩枇杷林。这里出产的白沙枇杷，具有皮薄、核小、肉嫩、味美等特点，远近闻名。

游龙门山回来，再来读一读明朝周思备的游龙门山诗，更感到描写逼真，意境深远。诗云：

为爱深山好息机，重攀绝壁鸟声微。
双岩秀出红霞断，一水虚悬白练飞。
谷静溪声晴作雨，春明竹色晚含晖。
高眠幽石松花积，拂落余香满地归。

一九八〇年五月

游亭山

一到鹤山脚下的东门渡，就清晰地看到江南巍然耸立的亭山。山岗上飞扬的朝霞，给它插上了彩色缤纷的翅膀，好像随时都要冲天飞去；团团棉花似的白云，纺织成帽子，戴在它头上。小时候就听老人说：“亭山戴帽，落雨甬问灶！”这是氤氲水气汇集成的亭山特有晴雨表。今天去游山，看来要淋雨。

亭山是富春名山之一，得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晋代名士孙文度，曾在山上建过亭子。孙文度乃是汉伏波将军孙秀的曾孙，他孝敬父母，挚爱兄弟，周济穷人，不为利禄所羁，终生闭门不仕。死后，人们纪念他，将此山取名亭山。这座山突出众山之上，远远望去，山顶的轮廓活像画出的亭子，故又有人说是因形得名。亭山出产天然白术，药效显著，闻名中外；“亭山积雪”，意境清远，富有诗情画意；那山北端的“辕门挂剑”飞瀑，更令人神往。

在充耳的松涛声里，我们绕过碧波盈盈的亭山水库，来到大源林场的亭峰林区。林场负责人老朱自告奋勇，陪我们去欣赏“辕门挂剑”。瀑布离林区约摸两里，三面石壁，小潭深幽莫测。遥看瀑布，像白光四射的宝剑，悬挂壁上。攀缘箭竹，来到五十多公尺高的悬崖之下，仰望瀑布，犹如银河从天而落。要是雨季，定能听到惊心动魄的涛声。如今是炎夏，水势不旺，但那飞流喷溅的水珠，稠密密、凉爽爽地侵入肌肤，沁人心脾，使

人暑气全消。潺潺水声与林间百鸟啾啾相应和，仿佛仙子在拨动着悦耳的瑶琴，令人如痴如醉，遐思联翩。我们不禁哼起了县志记载的紫衣仙女的《亭山白泉歌》：

风清清，云溶溶。

水潺潺兮不息，山苍苍兮不穷。

老朱流露自矜的神色告诉我们：亭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富阳、杭州的游人，连上海、宁波等地的游客也慕名纷至沓来。他们带着干粮，径自寻到瀑布底下，有的一坐就大半天。有的带着画板或照相机，捕捉一个个难忘的镜头。前年的一个傍晚，一批上海游客游得兴起，攀登瀑布的石壁，好容易来到半腰，上不去，又下不来，幸亏林场工人闻讯送来长梯、麻绳，才使他们得出险境。

午后，山峡中风起云涌，暴风雨骤然来临。我们只得改变登临七百二十二米高的顶峰的计划，退回林区招待所，邀集一些老工人座谈亭山民间传说。

他们七嘴八舌地谈得挺起劲，说林区招待所的小地名叫做龙头颈，因为有支山脉从顶峰蜿蜒而下，像条蛟龙，直奔富春江。相传这是条白龙，当年在亭山为害，后被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发现。刘伯温命令军士在龙头颈开挖深沟，切断孽龙的咽喉，就一命呜呼了。这条沟如今还在林区宿舍屋前。沟中有个五尺见方的小池，水色微露暗红，任凭山水冲刷，经久不变，长年不枯。据说这就是龙血。小池上方，有个笠帽大的横洞，冬天呼呼地向外直冒热气，形成的白雾有时竟能升到二三丈高。据说这是白龙被割断的气管。在白龙山脉西边，还有条平行的山脉，那是白龙的妻子青龙。她见丈夫被杀，大哭不止，泪流不

停。从招待所窗子望去，能清楚地看到青龙头上突起两块圆形岩石，像一对龙眼，终年湿淋淋的，大旱也不干。

场员们遥指亭山坡的大岩石说，那叫老鹰石。古时候，江对岸陆家村的鸡常常失踪，有位细心的妇女，在自己家的公鸡脚爪上吊了一根又细又长的红丝线，不久这只鸡不见了。那妇女顺着红线走呀走呀，一直追踪到亭山老鹰岩下，见丝线一直伸进老鹰石的嘴里，嘴边还沾着鸡毛。陆家村有位石匠自告奋勇，把老鹰石的下嘴巴凿掉了。从此，这只石老鹰再也不会拖鸡了。

据我们所知，亭山的民间传说早在南北朝时的梁代就有文字记载。当时有个皇帝名叫萧绎，到过富春，登过亭山，他的文集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宋人有个叫江岩的，到亭山采药，在“辕门挂剑”那道瀑布下，遇见一位非常美丽的姑娘，她身穿紫色罗裙，站在石上唱歌，歌声连云裂石，优美非凡。等江岩走近，姑娘突然消失。江岩破开姑娘所站的石头，得到一块一尺见方的紫色玉石。后人称这位姑娘为“紫衣仙女”。

千百年来，亭山树木茂密，四季葱郁；可是一九五八年那段时间，滥加砍伐，山林破坏殆尽。林场场长蒋梅根说，到一九五九年下半年，省林科所在亭山办试验林场时，不要说找不到一根可搭窝棚的小木料，就是连烧饭的柴草都要到山下去买。以后办起了大源林场，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几经风雨，亭山七千多亩荒山，百分之七十披上绿装，木材储量已达一万立方米。林场工人欣喜地告诉我们，如今的亭山山绿树密，泉多鸟众，多年不见的大野猪也到这里安家了。

一九八三年夏

西岩山寻胜

梅雨季节，天灰蒙蒙的。我们从富阳镇出发，乘车北行三十里，去探访那座早在唐宋年间就扬名四海的西岩山。

西岩山位于坑西公社。此山并不高，与一脉相连的天目山比，矮了一大截。

在向导指点下，我们很快找到了西岩山的标志——一块活像和尚帽的大岩石。它位于通往老余杭的筱岭大路以西，西岩山也由此得名。

只需十来分钟，我们便攀登上山半腰那块被尊称为“毗卢岩”的巨石下。这巨石横卧二十多米，高十多米，下部向里凹进，像间巨大的开口屋。“毗卢”在佛门词汇里，是一种和尚帽。但如今人们不叫它的雅号，而称它“猪婆石”，因为它更像一头躺倒的母猪。细心察看，岩壁上还能发现一排酷似猪奶头的钟乳石。比起“毗卢”来，“猪婆”更富有人间生活的新意，大概在乡下人心目中猪婆也比和尚帽实惠一些吧。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传说这块古怪的巨石，被一千七百多年前的葛仙翁看中，成了他修仙炼丹的处所。从此这座小山走了运，变得身价百倍了。据《富阳县志》记载，葛仙翁名叫葛玄，江苏句容人，他的师傅是《三国演义》描写过的道士左慈。葛玄神通广大，一度跟随吴王孙权。一天，他们分乘几条船到江苏溧洲，遇到大风，葛玄的船沉没了。孙权很懊丧，派人到水

边祭奠，却忽然发现葛玄从水里走出来，衣服一点都没有湿。他告诉孙权，他在水中遇到伍子胥，定要邀他喝酒。孙权听了，对葛玄更加敬仰备至。后来，葛玄来到富春西岩山炼成仙丹，白日升天。西岩山脚那个白升村的村名就是这样得来的。葛玄之后，他的侄孙子——大名鼎鼎的晋代大化学家葛洪，也多次来过西岩山，向葛玄的徒弟郑隐学炼丹，这更使西岩的盛名锦上添花。直到解放前夕，还常见外地的葛姓子孙背着宗谱，前来朝拜他们祖先得道升天的圣地。

传说中的葛仙翁，是位助人为乐的道士。一年秋天，西岩山下家家抢收黄稻，一时叫不到短工。有人想起了山上修行的道士，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到毗卢岩下相请。那道士爽快地答应了。接着又有好几家同时去请，他都一一答应了。人们纳闷，一个人怎能同时干好几家的活呢？然而，家家都请到了道士，而且活干得十分卖力。直到夜晚，人们才发现，这些道士都是稻草人。大家惊骇之余，又从心底里感激这位好心的道士，尊称他为葛仙翁。

天幕越垂越低，一阵凉风，梅雨淅沥。透过乳白的雨帘，山色变得空蒙奇幻，为仙境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为了避雨，我们躲进毗卢岩下一个大洞里。此洞名叫“迎曦洞”，宽敞而深邃，可容纳几百人。洞口面朝东，每当晴日，朝霞升腾，旭日初照，岩洞便迎来灿烂的晨曦。大概洞名由此而来，可惜我们这天没法领略这壮丽的景色。

迎曦洞正中，有块大石，平如手掌，这就是仙床石。那上面有靠背、石枕，人们可以任意靠、卧。床下的神仙座，比石床低一级，跌坐舒适。葛仙翁能找到这样的地方修炼，真算是造物主帮忙了。

神仙座左边不远处，便是葛仙翁的炼丹灶。灶高及腰，上

有一只直径一尺多的天然石锅。其实这是一座石笋。炼仙丹是方士或道士的所谓法术，用大火烧炼拌有朱砂的药石，炼成的丹是含有水银的毒物。葛玄的所谓“升天”，抑或是死于水银中毒的动听点的说法吧。

再向左，是西岩山独特的一景：缀萝壁。一种像葡萄那样的藤萝，从十多公尺高的石壁上倒挂下来，竞相缠绕，巧妙编织，犹如高雅的萧山花边。在春天里，这种藤开出白花，铁灰的石壁，衬映出疏密有致的绿叶白花，宛似一幅美丽的彩绸。

缀萝壁下是应潮池。据《临安志》记载，西岩山“岩有洞，洞口有池，早晚与潮应。”说这个池的水和富春江潮水相应相和，早晨和傍晚富春江涨潮，这里的池水也跟着满起来。《钱令旧志》也有相同的记载。想必池水应潮起落的这个奇怪现象确实存在。眼前的应潮池四壁坍塌，仅存一泓清泉。它如今是否应潮，我们来去匆匆，无法验证。

置身洞天福地，眼观斑斓古迹，自然叫人想起历代诗人留下的游山诗。其中最著名的要算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七律：

千古仙居物象饶，道成丹熟昼升霄。
岩前宝磬传松韵，洞口灵池应海潮。
崖折百花迟日晚，鹤归清夜唳声遥。
登临渐到希夷境，手拂行云渡石桥。

据记载，白居易做杭州刺史时，常游西岩山，把这里称为洞天福地。在这首诗中，他用通俗的语言，把西岩山描绘得仙气十足。同时，也将自己游山的清逸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唐末，迎曦洞中建起别具一格的西岩寺。因为寺上有巨石掩覆，显得冬暖夏凉。里面供着十八罗汉和葛仙翁，佛、道同

堂，和平共处。这在别的寺院，是极罕见的。还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的文学家杨维桢曾在寺中躲避过战乱。“海内甲兵民厌久，山中车马客来稀。”他在西岩寺一诗中，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人民渴望统一安定的愿望。

我们遐想之时，一个腰系钩刀，脚穿草鞋的老人来到面前。原来他是山林管理员，家住白升村，姓胡。明白了我们的来意后，热情地指着洞中的残墙断垣给我们讲述解放前西岩寺的盛况。据他说，每年百花仙子的生日，这里举行盛大庙会，远近的龙灯竹马，纷纷赶来朝圣。本地的农民祈求五谷丰登；余杭一带的蚕农祈求养蚕顺利；缺儿少女的妇女来到百子堂，从一百个栩栩如生的小儿塑像中，挑选一个合意的，在手臂上系上一根稻草，盼望生个如此模样的白白胖胖的儿子……解放后，人民破除迷信，西岩山路上，长满了青草，很少有人来了。人们努力发展生产，讲究文明，生儿育女也无需求神明保佑了。这是时代的进步。

一九九三年秋

初探叮当洞

四月二十二日，天气晴朗，我们随着县委书记张书声、县长洪德森等十余人，初探淶渚乡的叮当洞。

在四面环山，山花缤纷的阆苑坞，有众多的石灰岩溶洞。其中，“峭壁顿开一洞天”的叮当洞，最有魅力。

由叮当洞垂直而下深约四十八米，有十六层楼房那么高。我们分批坐上当地人特制的“土电梯”，六个彪形大汉摇动着钢索盘车，木笼颤悠悠地降落，耳边风声呼呼，钢索轧轧，煞像腾云驾雾。不一会，到达黑漆似的洞底。我们扭亮矿灯，前方是仍向下倾斜的石坡，到处是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石头。向导告诉我们，这些石头都是游人从洞口丢下来的。说来有趣，一块石头下来，总是顺着一个方向，二次撞在石壁上，然后落在水中，发出“叮——当——洞”的声响。洞名就这样产生了。

洞里“嘀嗒、嘀嗒”的水声，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左边。没走几步，二十公尺高的巨大石笋挡住去路。石笋活像蹲着的雄狮，从头顶到颈部披着茸茸的长毛，咧开嘴巴，露出牙齿，眈眈地注视着颌下水珠，不断给狮子淋浴，狮子浑身洁白、晶莹，犹如雪塑玉雕。我们绕过石笋，狮子忽地变成盘坐莲台的如来大佛。张书声同志风趣地说：“这如来佛大概是杭州灵隐寺来的吧！”引起大家哈哈大笑。

向前，一泓池水似镜，明净见底，旁边兀立一座玲珑宝塔，

人们管叫它“太液池”。左侧下方，有石缝可容人侧身而入。我们十余人，顺序而进，后者的头、肩常常会碰撞着前者的脚，或坐地或俯身爬着贴地朝前。过了几十公尺，洞变高变宽，能伸直腰行走，不过仍要当心洞顶倒悬的钟乳石会碰着你的头。这些乳石与瑶琳洞、灵栖洞不同，酷像一个个巨大的猪肺、猪肝，我们仿佛走进了一家屠宰场。

“看，小白龙！”有人手指岩壁一条蜿蜒的水积石惊叫起来。煞是像盘曲的龙身，细密的龙鳞，张牙舞爪，栩栩如生。张书声同志兴致又来了，打趣说：“这是驮着唐僧西天取经的那条小白龙嘛！它取经回来，累了，就到这里休息了。”和小白龙相媲美的，是对面洞壁斜坡上一组八仙的群像。看样子，八仙准备起身渡海，各显神通，那个骄傲的吕洞宾似乎迫不及待了，扬起右手跟另外几个神仙打招呼。再往里走，左右前后上下，套来套去都是小洞，真像座迷宫。我们只得顺原路折回到“太液池”畔。

绕过“太液池”，走不了多少路，又发现一个水池。顶上石瀑布飞挂而下，掩盖了前景的面目。原来，这里是个“水帘洞”，小心地从石瀑缝隙中钻进去，盘来盘去又是走不到头的洞。“水帘洞”的近旁，是向下的斜坡，黑洞洞的岩石下，有两个合抱的雪白大石柱，格外醒目。

叮当洞的总体布局有点像北京人民大会堂：中间是数千平方米的高大雄伟的主厅，四周小洞又像是浙江厅、福建厅、台湾厅……因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跑遍全洞，肯定还有更加奇妙的洞景，有待人们去发现。

我们坐“土电梯”离开“洞天福地”，回到阳光和煦的人间。稍歇片刻，乘兴分两路再探附近饶有奇趣的大洞和吞牛洞。

游完三洞，太阳已偏西。归途中，我们兴致勃勃地议论今

天的探幽访奇的收获，异口同声地称赞叮当洞是我县少有的胜景。

一九八一年春

游灵隐洞

大家知道杭州有个灵隐寺，却很少有人晓得富阳有个灵隐洞。它就在唐代著名文学家罗隐的故乡——南安公社洞山大队，旁边还有座小小的飞来峰。

灵隐洞又名洞山洞，古时候很有名气。《新登县志》上记载的新登八景之一——仙洞鸣泉，就是指它。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曾在洞中留下足迹，并写有游记。当时，洞口建有“灵隐禅院”，供着白鹤仙师。从前，临安、分水、桐庐等地的香客慕名而来，焚香点烛，求子祈福；然后由和尚点着火把引路，游玩洞景。一年四季，络绎不绝。如今，寺院早已坍塌，仅存下残迹；但雄伟优美的洞景，仍然放射异彩，引人入胜。

灵隐洞踞伏在石灰岩断壁下端，五六里外就能看到高大的洞口。一股清泉从中流出，欢唱着漫下坡谷。洞前古柳成行，青绿欲滴。穿过柳林，拾级而上，石壁上“灵隐洞”三字赫然映入眼帘。从落款中我们知道这是清朝道光三年，新登知县吴塘和富阳进士吴炳等人游洞以后刻凿的。清秀的字迹，经过了一百五十多年的风吹日晒，依旧清晰如旧。

我们一跨进洞，像突然进入了黑夜，简直无法辨别洞壁的颜色。三节电池的新电筒，也失去本来的光辉，昏暗得像萤火。朝里看，黑洞洞的不知有多少深远。阵阵凉风，扑面而来，浑身汗水马上干了。耳畔水声不绝，如奏仙乐，使人飘飘然如入仙

境。有经验的向导，给我们带来一大捆葵花秆点燃起来。这种火把比电筒强得多了，我们眼前出现了二三十公尺高、十多公尺宽的山洞轮廓。洞的底面，一半流着清澈的溪水，一半则是平坦的沙石地。我们高擎火把，摸索着前行了五六十公尺，被一座屏风似的石壁挡住去路，一左一右出现两个山洞。向导说：“右边叫旱洞，左边叫水洞。”我们淌过清泉先游旱洞。

旱洞无水，深约一百米左右，步步向上，如登殿阁。路很难走，有时，还得全身俯伏在陡峭的岩壁上攀爬。一个伙伴脚下踏着一摊粘稠的东西，向下一滑，滚了两三丈路，幸好没有摔伤。我们举火一看，地上满是黑乎乎的蝙蝠粪。它是一种优质的肥料，又是中药材，名叫“夜明沙”，能治眼病，洞山附近的人们常来扫取。我们用火把、电筒一齐照向洞顶。呵呵！真不得了！成千上万的蝙蝠重重叠叠地倒攀在岩石上，像个粘满了芝麻的大烧饼。光亮和人声扰乱了这个蝙蝠王国，成千成万的大小蝙蝠“吱吱”地惊叫着，惶恐地朝外飞窜，卷起一阵阵令人毛发悚然的怪风。怪不得到过这里的古人写下“蝙蝠大于轮，划然天地惊”的诗句。旱洞的尽头，有少量的钟乳石。有的像钢刀，有的像宝剑，有的又像铁锤……虽然比不上瑶琳洞那样多姿多态，但也别有情趣。

游完旱洞，我们从原路出来，折向左，再游水洞。真是名符其实，遍地泉水如注，哗哗之声充塞耳鼓。两旁黑乎乎的石壁，刀砍斧削似地挟持着蜿蜒的溪流。古人有一首诗，描绘这里的景象：“剑门试一窥，万丈压靦面。线溜钟鼓鸣，微嗽雷霆战。”意思是说，这里多么像四川北部险峻的剑门啊！试看，两旁万丈石壁夹得很紧很紧，差不多面撞面了。这里的回声是很大的，哪怕是只有一线水在流，发出的声音就像是钟鼓齐鸣；轻轻地呛一声，就像震地的雷声。这里比作长江三峡更恰当。看，

两山夹峙，一水中流，头顶不时掠过一群群蝙蝠。多像生活在长江上的鸬鹚。

我们一边欣赏洞内的奇景，一边小心翼翼地挨着石壁前进。这儿水不深，很清，水中的小虾历历在目。走了百十步，溪床起了变化，水中横躺着不少弯曲的石埂，像龙飞凤舞，又像错节盘曲的老树根。徐霞客曾把这情景写成是：“山田成畦，塍界分明，水满其中，初无涸溢。”倒是非常贴切。从“塍”上曲折而入，溪变小了，洞顶越压越低，最后成了笠帽大的一个小洞，看来是山穷水尽了。大家跟着向导卷起了裤脚，躬着身子，下水钻过洞去，举火一照，像置身于一个巨大的酒坛中，真是别有洞天呢！跟大洞一样，四面石壁，处处溪流，上端有几个小小的旱洞，还有一块巨大的钟乳石。听说，当地几位教师今年夏天在这个地方拣到三块动物的化石，其中一块是个铜钱大的乌龟，连小小的脚爪都十分清晰；另两块是古代象牙的化石，现保存在浙江博物馆。

涉水再走百来公尺，洞窄不能移步，溪流隐没在一条石缝中。这条溪有多长？洞有多深？谁也说不清。据向导说，洞山顶上还有个向天洞和这里相通，一股来自鳌山的泉水注入洞中。当地人曾将一只狗和一只猫抛入洞里。七天后，狗猫都活着从灵隐洞口出来了。狗饿了七天瘦得皮包骨，猫却肥胖了不少。原来，洞内有的是猫的食物——蝙蝠呵！

灵隐洞还有个奇怪的现象值得一提。据当地老人说，大旱年，泉水将枯竭时，突然洞中山泉澎湃。滔滔浑水像钱江潮一样，涌出洞口，一下子能灌溉千百亩田。这水带有腥气，很肥。人们说，洞里的神仙因为要迎接客人，正在洗洞。也有人说，仙人施水救旱了。到底什么道理，我们也搞不清，就让地质学家来回答这个难题吧。

从灵隐洞出来，沿山崖走一百步，还能看到一个洞，叫作白鹤洞，洞阔而不深，可容纳百来人。前面有石柱、石笋，洞里有个石刻的菩萨，人称小飞来峰。别致的是这个菩萨的肚子上凿有洞。从前来求子的妇女，都要站在离菩萨几步远的地方，对准这个小洞丢铜钱。说丢进了，就能怀孕。这个菩萨不知为和尚赚了多少钱。

一九八〇年春

“画中游，游中画”

著名画家郁风眷恋故乡的山山水水。特别是山重水复的湖源山区，更使她梦萦魂牵。

四月初，春意正浓，鸟语花香，长期在京的郁风来到了故乡。尽管时间是那样局促，她还是希望到湖源走走，看看清朝尚书、画家董邦达教过书的地方。四月十日，富阳县委特地为她备了一辆小车，使她得偿夙愿。

湖源溪是富春江一大支流，那个“湖”字原来是酒壶的“壶”字，因溪流形状像把酒壶而得名。它的狭窄的部分长四十华里，弯曲的清流，穿行于锦峰绣岭的湖源山区中。奇峰、怪石、苍松、山花、飞瀑、深潭、险滩，组成一幅幅或雄伟挺秀或雅洁清新的画面，步移景换。翻着雪白浪花的溪水上，偶尔出现一两张竹筏，顺流似箭，掠过眼前，富有诗意。

汽车在莽麦岭豁口停下来。只见一座危石累累、树木森森的小山横截清溪。溪水被迫转个大弯，在山嘴边冲积成一片沙原，活像横躺在溪上的一张竹筏。沙原上那个新房密集的村庄由此得名横槎。隔溪，叠叠黛山像张开的翠屏，晨雾缭绕其间，隐现着半锥，仿佛海上仙山。山上有两洞，大的约五米见方，叫花洞。传说，唐末义军首领黄巢兄妹在此兵败被围，黄巢急中生智，将宝剑插入山顶石壁，改扮樵夫，侥幸脱身。他的妹妹百花公主，隐匿在万绿丛中的石洞内，也免遭杀戮，后人就称这

个洞为花洞。不远处还有一洞，只能容纳三五人。奇怪的是洞底有许多大小不等的隙缝，寒冬喷发着热气，能蒸热砍柴人的冷饭包；炎夏则不停地吹出冷风，能使红烧肉冻结。附近还有一泓清泉，大热天喝上一口，凉彻肺腑，当地人称它为“冷泉”。难怪解放前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常到这里消夏，还打算建座避暑别墅呢。

眼前的景物和动人的传说，引起了老画家的兴趣，连忙席地而坐，打开画板，凝神速写了几个画面。

离横槎，往里行五里许，便是“撞子岭”。危岩峭壁，一落几十丈，有羊肠小道穿行其间，山路陡峻，步履艰难。相传古时有位孕妇爬登此岭，每攀登一步，膝盖与腹部相撞一次，岭由此得名。岭东端有几棵虬枝盘曲的劲松，张开长臂，伸向大路。春风吹拂，树枝摆动，像是向进山客人招手相迎。

“太像黄山迎客松，美极啦！”老画家不由得发出赞叹，并以画家特有的审美角度，用画笔写下这迷人的景象。

向西行一二里，公路左边闪现出一个名叫寺口的小村，原有座万春寺。东面群山古时称栖鹤山。县志记载，山中有仙人洞，南北朝时，北魏安南大将军李重耳在陇西抵挡不住北凉的攻势，父亲被杀，只身逃到富春，隐居此洞。洞前常有仙鹤栖息，人们称它“栖鹤山”。李重耳死后，葬在钟塔山。后来，他的后代李渊开创强盛的唐朝，于武德三年，敕造重耳墓，改栖鹤山为万春山，并建万春寺以供香火。五代十国时，南唐后主李煜，亡国后封吴王。死后，子孙将他归葬于先祖李重耳的墓北。李煜这个末代皇帝，终日沉湎酒色，政治上是十足的糊涂虫，但他的诗词造诣极高，大家熟知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便是他的名句。吴越王钱镠之孙钱俶曾为他写过墓志铭。六十五岁的郁风同志怀着极大的兴趣，精神矍铄

地踏看了万春寺的寺基。今天能见到的，仅一截古老的断壁残垣。昔日雄伟壮丽的殿宇，以及寺前数人合抱的大樟、古柏和修篁，已为新建的住房和块块山田所替代。当地社员告知，寺后的团团山，原有座非常精致的墓，四周围以石栏杆，墓前排列着石将军、石马。据我们推测，这可能是李后主的墓。可惜，经过“大跃进”和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古迹荡然无存。墓地开荒种树，面目全非，只有一块残存的三尺长、二尺宽、尺半高的青石墓碑底座，无声无息地躺在万春寺的废墟上。

万春寺不远处，是高田勘。数十间楼房，依着山势建筑，层层叠叠，就像西藏的布达拉宫式似的。无数绿树和烂漫的山花点缀其间，诗意盎然，具有山区村景的特色。郁风称赞这里的风光在江南是罕见的。

汽车穿过双坝大桥，石马岭的奇特景象扑入眼帘。画家急忙吩咐停车观赏。石马岭煞像一匹伫立的骏马。不久前，民工们将“马背”削低八公尺，硬是开出一条两旁尽是坚石的公路来。那“马头”直伸入湖源溪，仿佛在俯首饮水。整座石马岭拔水百仞，气势雄伟，几乎全是嶙峋怪石褶叠而成。有的像石笋，凌空兀立；有的像猛兽踞伏。南峰有两棵青松，携手交臂，好比骏马的一双竖耳。远看石马岭，布局有致，点缀自然，古朴雄健，宛如一座巧夺天工的山石盆景。岭下清溪汇成一个大水潭，深数丈，平铺一碧，倒映花木岩石，清晰可数。潭中特产一种鱼，形状像青鱼，但鳞片洁白如银，大的可达十来斤。这种鱼宜蒸食，肉嫩味鲜，可与富春江鲥鱼媲美。

因路狭山险，郁风只得在车座上打开画板，边注视、边运笔，片刻功夫，粗线条的石马岭便在逶迤远山的衬映下，再现在画纸上了。

湖源山美水美人更美。抗战时期，湖源人民哺育了金萧支

队。他们宁愿自己挨饿，把仅有的粮食送给坚持斗争的子弟兵；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们把亲人送上前线。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湖源人民意气风发，战天斗地，劈山填壑，陆续建成公路五十里，筑起湖源大桥和双坝大桥，把羊肠鸟道变成康庄大路，汽车开到家门口。“湖源十八渡，渡渡要脱裤，一渡勿脱裤，裤裆磨豆腐”的苦难情景，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了。党的三中全会点燃了湖源人民心中的明灯，他们再也不干毁林种粮那类蠢事了，而是从实际出发，“以林为主，林粮结合”，发展生产。两年来，绿化造林一万多亩。县里光去年就发给林业补助粮三十五万斤。有了林木，就有粮、有钱，心中不慌，万事兴旺。不久前，他们在李家大队修筑了二千二百多米长的盘山渠道，建了一座小水电站，给山区增添光明。“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更为畜牧业生产插上翅膀。

对故乡的点滴进步，老画家郁风打心底高兴。她深情地向干部、社员问这问那，常常笑得合不拢嘴。她对家在湖源的场口区委副书记何国林同志说：“我有要事，明天得回北京。下次一定再来，呆上一个月，就住在你家，尽情地享受一番山区自然美和社员心灵美，搞点创作。”

当山村暮霭初临，炊烟四起的时候，老画家告别湖源山区，结束了一天的游程。归途中，她不止一次地说：我今天是在“画中游，游中画！”

一九八一年春

鹤山观日出

“鹤山观日出的良辰美景，不该为古人和今人忽视。”

“黄山观日出，泰山观日出，哪有鹤山观日出方便，省力。”

早晨上鹤山的人都这么说。

说的倒也是。富春江畔的富阳“春江八景”中，在鹤山周围的就有“龟川秋月”、“中沙落雁”、“花坞夕阳”、“恩波夜雨”、“苕浦归帆”，唯独没有“鹤山观日”。且秋月、落雁、夕阳、夜雨都只能在夜间或傍晚才能“欣逢”，而鹤山观日出则在早晨。

无论怎么说，早晨应胜过黄昏。

人，贵在有点激情。在一些早晨上鹤山锻炼伙伴的“怂恿”下，我不免有点动心！

对古人自不必苛求。而今人也长此观而不问，赏而不鉴，有点不大说得过去。让它留给后人来赞美来记载来评说，我们这些今人已是为伍于“古人”之例，难免要被斥之“无见地”、“太遗憾”了！其实，后人谓之今日之“古人”以“愚昧”的事多的是。何必去顾及？然而，不是入“空门”者，长期身临其境总不至于对周围的一切置若罔闻。何况，在早晨上鹤山的人流中，我也是坚持十数年者之一。更何况早晨在鹤山，令我最感适意的，莫过于缕缕晨曦从树枝缝中照到身上，于是伸开双臂，做几下深呼吸。“吐故纳新”对我这“老烟枪”气管炎患者，实在是太重要了。下山时，我每每要驻足看看挂在江上的红日。

我又注意起他人——

顾不得刮风下雨，何所惧酷暑严寒，年年月月日日，每天清晨，从富阳镇的四面八方，三三两两地来到鹤山，做着各种柔身动作，亦有舞剑弄棍的，擦掌“对打”的；而当太阳冉冉升起，人们几乎从不同角度，向着同一方位，要聚精会神地看上它几眼。

外来者亦然。一些在富阳过夜，操上海、苏州口音的游客，清晨登鹤山，嘴里不时发出“好白相来”，“斜气好看”之类的赞语。初见者为之惊叹，老游客则以先睹过为荣，以向伙伴们引见“欣逢”为快。一些持照相机、摄影机者，天蒙蒙亮就选好位置，候景、抢景、拍景。只是报刊、电视台发表的并不多见。也许只是自娱自乐，抑或拍摄功夫未到家；也许是“鹤山观日出”的名气不及泰山、黄山大。

不过，方便、省力和好看之说，确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是从亲身经历者口里发出的。

鹤山观日出，富阳城里人自然容易得很。只要是晴天又不睡懒觉。

外来者又何尝不是如此。

由杭州而来，不足一小时车程的富阳鹤山，乃是国家级黄金旅游线——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和西湖、千岛湖谓之“三江两湖”的第二站，登鹤山本是旅游者不甘放弃的景点；鹤山在城之东侧，且有多处高中档宾馆饭店在鹤山之北，出门可及，登临之方便，与登泰山、黄山去观日出相比，何其省力；又因鹤山横截大江，“鹤鸟”之首伸入江心，且三面临水，浩浩碧波，映托日出，更为黄山、泰山所不及！鹤山还以江边小径、江旁古道、山腰横路，盘绕于顶端之坪，处处可以观之。

登鹤山，何止可观日出？

富阳的“春江八景”，多半散落在鹤山周围；山上之名胜古迹，也能为旅游者所吸引。鹤山古称石头山，因三国孙权后裔在山建道观而称“观山”，又因它形如鹤鸟在江中“长饮”，为文人墨客冠以今日之雅称。仅以这山名之更迭，也足令你迷恋和考察一番。至于山上之郁达夫兄弟事迹陈列室、双烈亭、松筠别墅和龟川阁等，留有当代许多文化名人之墨宝。外来客观罢日出再游鹤山，满载而归自不必说了，即便老天不帮忙，也不枉白跑一趟。

鹤山观日出，实为大自然施于人的大美的享受。

晴日，鹤山观日出的最佳位置，当推古樟覆盖的平台上侧，可依栏从眼下的江上往东望去，碧波尽头，山峰背后，天是桔红色——一说橙色，一说淡黄色，最好由画家调色，这色块慢慢增大增浓再化淡……这并非“天开眼”！

再盯视，一条弧形的光环，闪着七彩的光芒，由一点一线到渐渐地变圆，终于一轮圆盘似的红日喷薄而出。

啊，这是燃烧着的一团烈火，一团生命的烈火！它令碧波耀眼，令万物生辉！倒映江中，所见是一根又长又粗的“殿柱”，随着你的身影移动，犹如东海龙宫向你展现了一角！它又像一个刚刚坠世的婴孩，还粘着母体的斑斑血迹，披着缥缈的轻纱……

有时江上则是团团浓雾，像乳之色，像棉絮，缓缓地轻轻地飘飞；而红日则急急地又似酣睡初醒，在广阔的江面上尽兴地跳跃、翻滚、飘洒在一簇簇一串串蓝蓝的碧波之上，迟迟不愿离去。此时此景，你不必埋怨老天今日不帮忙，相反，倒是给你遇上了难得的时日，即便你见不到从山顶喷薄而出的美景，而它已升到了相当高度，灰蒙蒙，江天一色，这乳白色的一轮

圆日，倒像是晚上常见的月亮。渐渐地，光越来越亮，照得雾也越来越红，宛如融化了的铁水；少顷，雾越来越薄，越来越淡，丝丝缕缕地升腾，直到化为乌有。它给一切色彩都添上一幅光晕，把广阔天地染成勃勃生机。

与时令节气有关，有可能你见到的又是另一种良景美色，远处尖尖的山峰，正吃力地顶着一轮刚刚喷薄的红日，就像海狮从雾海中悄悄地探出头，顶着一只灿灿的彩球在飘游……

如此，你会同样感到：

美也，醉也。

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龟川阁小记

月夜，在龟川阁眺望江景，每每令我想到古诗里“溪上月楼楼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宫”这等描写，确是太美，太令人神往了！龟川阁这座“水晶宫”虽不在溪上，但她更为诱人。

龟川阁位于富阳城鹤山东麓的富春江畔，依山临水，飞檐翘角，古朴幽雅。阁分上中下三层，为避涨水，底层未作使用。中上两层阁柱楹联，由邑人撰句，当代中国文化名人李一氓、黄苗子、叶浅予、吴祖光、唐云等题写。“龟川阁”三字匾额，出自全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手笔。堪称集当今国内文化名人之墨迹于一阁。其文化艺术品位之高，为目下杭州地区诸多风景点中所罕见。

征集墨宝的工作自然是颇费心计的。为“请邑人撰句”，县城建旅游局和县文联就作过多次商量，景观简介和征稿启事的宣传，就连续数天开动了全县近十万只有线广播喇叭。还对熟谙富阳乡邦文史的，不论县内或在外地乡友，一一排出名单，致专函索求。从大量来稿中选定也不轻松。先是集印分送征询，继于一九八五年冬天，特邀张堃、朱岫云、蒋祖勋和夏家鼎等四位老先生逐件斟酌，反复推敲选定。

请名人题写楹联和匾额更非易事，且颇多趣闻。李一氓同志写就后忘了署名，郁风说不好意思再去请李老重补，我们不得不从他为“双烈亭”题写的手迹中“移花接木”。请启功同志

题写匾额的经过更有意思。兹录一九八七年一月郁风给我的信，以飨读者。

年前我写了信寄了照片给启老，他患中耳炎在家养病，电话也不听。果然昨天收到他的回信（三尺多长幅，还有打油诗一首）。不敢怠慢，赶快寄上龟川阁题字。来贴中有一段说：“今幸叨庇复元，又值新年雪滑，龟缩斗室中，大写龟川阁三字，自念龟而不川。为之快快”云，请勿忘我答应他的火腿两支……

这“火腿两支”，乃一九八六年十一月郁风给我的信中提及的。信中问到龟川阁工程的进展，直言平台太窄是大缺点，“如果匾额挂在外面，退不开就看不见，只有坐在船里才看得见。”她要我请人从江里正面及岸上看侧面拍几张黑白照片寄去，好让启老知道龟川阁是怎样一座建筑。信中还讲到，好像平白无故叫人写字也不好意思，“请想想看有什么富阳特产的礼物，上好的毛笔？不过苗子说启功多的是笔，还不如送两支火腿。”我亦觉得不能请人白写，而苗子这位富阳人女婿很喜欢吃富阳火腿，这“一箭双雕”的主意实在妙极！意见转告旅游局，他们即派盛亦荣同志跷着脚冒严寒专程送至北京。

龟川阁旁竖有富阳县人民政府立的“龟川秋月碑记”，是硬笔书法颇有名气的“半个富阳人”王介南先生篆额并钢笔书。碑文则由德高望重的张堃老先生撰写。

……江流至此回旋成潭，每逢秋月皎洁，水波不兴，尝有大鼋浮拨水面唼月；又谓孙吴时，永康樵人得大龟将献之吴王，夜泊舟于江边桑下，闻木呼曰：“元绪，奚事乃

尔？”龟曰：“游不及时，见系于人，行将就烹。虽尽南山之木不能烂我。”木曰：“诸葛元逊博物士也，彼至，祸必及我。”吴王得龟，果烹之莫能烂。元逊曰：“宜用老桑煮之。”樵人因言桑下所闻语。王伐桑煮龟，立烂。此龟川秋月一名所由来。

此处赏月爽人，而这杂取古小说家志怪者之言，为此景点增添浪漫主义色彩，更为诱人！

龟川阁的建成，使秀气十足的鹤山添了新的景观，又补了鹤山之“缺”，楼、台、亭、阁齐全了。春江第一楼，多气派！澄江亭、揽胜亭、郁氏昆仲“双烈亭”，多风光！今还添了富有诗意的龟川阁。唯有这“台”难免有人生疑。笔者之见，矶头严子陵垂钓处，与桐庐七里泷山上的东、西钓台相比，更具钓味。还有古樟覆盖的临江平台，以及可鸟瞰富阳全城的山顶“半悬台”，只是未“正名”而已。

我因职业所系，近年来经常陪同外地文化人浏览“龟川阁”。在此小坐品茶观江景，有的竟然“赖”着不肯离去！去年冬天我们陪同无锡市、县同行至此，在三楼的临江阳台上，支起小圆桌，坐在齐腰的围栏里，挡风向阳，是冬犹春，喝茶观景，适意得很。因阁浮水面，又似在画舫中荡漾，悠哉，悠哉！近看阁下春江水，碧蓝碧蓝；远视蹦跳着的江水，灿烂的阳光将它们摔成无数碎细耀眼的残片，然后悠然东去。谁不热爱自己的家乡，然而面对此情此景，她们不得不赞叹说：“太湖美，富春江更美！”茶水一次次添加，楹联看了再看，从不同角度照片拍了又拍；我们数度催走，生怕误了预约的中餐时间。

此地扼山川之胜，朝岚夕霞，沉壁跃金，风雨晦明，气

象万千。今岁承省、市政府资助，营建龟川阁于此，供人民登眺，领略富春山水之胜概云。

碑文如是说：兴建龟川阁之举，实是今人为今人乃至为后人，做了一件大好事。

一九九〇年二月

〔附〕龟川阁楹联

匾额：龟川阁（启功书）

楹联：

大化有秋，共此明月；

小康在迹，何与神龟。

（蒋祖怡撰 黄苗子书）

朝岚列岫黛浓淡，夜月星河影动摇。

（张堃撰 叶浅予书）

渔火平沙远，晴光黛色新。

（蒋增福撰 吴祖光书）

龟游水面波光碎，月映江心壁影双。

（夏家鼐撰 李一氓书）

何事离人肠欲断，江林景色画难如。

（于听集郁达夫句 黄笃维书）

揽山川胜概，沐日月辉光。

（朱岫云撰 唐云书）

也说天中山

有关天中山的文字记载，至少可以追溯到清代中叶；近年来的“依样”和“翻新”，又为世人所关注。沉睡已久的天中山，将再度热闹起来。

天中山，一名天钟山，在富春江南岸的太平小坞里。如今为富阳镇属地，位于春江管理区的南峰村。

对天中山的名声，我早有所闻。孩提时，我们家乡——富春江以南一带农村，较之江北，正月里更时兴舞龙灯，总要到天中山的“东台”或“西台”去拜谒，祈求一村一方一年一度的丰收和平安。逢上大旱，也有去那里的“龙潭”迎“龙”求雨的，可见，人们心目中把它当作一块“圣地”或“净土”，我六七岁的时候，曾随舞龙灯的“大部队”去过一次，只不过登山之路是骑着父亲的头颈而上的，记忆自然已相当模糊。

六十年代初，我在编写《富阳县志》时，看到了旧志对天中山的详细记载，尤其是那篇《天钟山游记》，记得作者也是姓蒋的，我读得格外仔细，诱发过去实地一看的念头，然因遇上“困难时期”，修志中断，也就失去了上天中山的“雅兴”。在县广播局供职时，给我冠有好几个“业余委员”衔头，诸如城建、旅游和地方党史征集等，于是，便萌发了要举办《富阳风貌》节目。为了实地采访，不光是对富阳县城的过去及鹳山，几乎全县的名山顶峰、溶洞底部都爬到了，许多名胜古迹也留有我的脚

印，唯独没有去过天中山。因为有位作者先于我们寄来了《天中山记游》的稿子。

前年，唐永祥、王运祥两君合作——前者在太平小坞工作过，后者乃天中山“邻居”，在当地的中学里当过教师。他们在登天中山后也写了篇游记，把那里的自然风光、胜迹遗址、掌故传说都说到了。由于我对天中山的一往情深，便让《富春江》照发了；以后在《富阳报》上刊出，虽然大同小异，我还是重读一遍。又后来，见到政协联谊会去考察后写出一份“建议书”，则将天中山延伸，说它山脚下背山临江的丘陵地，是创建“东吴三国城”的理想地方。这，又吊起我去天中山的胃口。更何况，那里有我的农民朋友的几度相邀。

上个月的最末一天（星期日），便随统战部是老葛和彭女士，践约了多年来的夙愿。

富春江第一大桥的建成，由富阳镇去天中山方便极了。车行半小时，进山到“东台”也不过半小时光景。青山叠翠，奇石镶嵌；小溪弯弯，山泉叮咚；古人谓之“一座青山一条屏，一弯溪泉一把琴”的富春山水美景，一路上让你饱尝个够。何止是古人，我以为今人也该进一进这种“小桥流水”的意境，来点淡泊明志。这里进山路上的小桥竟有十多座之多，青石条铺的，鹅卵石拱的，木头架的，用毛竹垫泥草而成的，还有那用大石块贴水而置供跨越而过的“搭水桥”。如今“开发”它，只要不用水泥捣浇，就不会大煞风景。山路比较平坦，本来就不觉吃力，沿途向导叙述朱元璋到此的传说，以及观音菩萨从中“点化”的故事，会令你走得更松翻。

天中山，山美水甜景多，空气也特别新鲜。富阳镇政府在此定点投入——无非是修桥铺路造凉亭，作些修补和装点，好让久住城镇的人们，节假日能到此享受一下返归自然的乐趣。

这是无可非议的，也算是一种“善举”。如今，大到一座城市，小到一个集镇，越来越成为一块硕大的水泥地坪了呵！能到明净如洗的大自然中去走走，我相信是会产生心灵共鸣的，也许能把真实的痛苦、烦恼，忘记得干干净净。据说路旁在造的一些亭子，是镇里让一些办得好的企业去建的，这也是好主意。只要不把那里的自然景观糟蹋掉就好。当然，如果旅游部门主动参与按“规划”而行，就最好不过了。

到了“东台”，所见是另一番景象，附近村里的一些信徒们，靠“义助”与“奉献”，把据说是朱元璋敕封“护国永寿”的一块匾额，也高挂到了重新建成的寺院上。虽说不及旧址的四分之一建筑，但也具有相当规模，且还塑了三尊观音。只是那尚在动土木的“抱屋”，因齐着寺院墙基而建，有点“喧宾夺主”的感觉，看起来很不协调。主管宗教的老葛，就与当地的村干部和一些热心的信徒们座谈调查开了。我听听，更觉这里的旅游资源相当丰富，很有开发价值；至于当地的积极性，也许靠当政者是很难“运动”到如此地步的。只要好好引导就是。老葛见到黄幔上书有“与人为善”四个字，说它并非宗教语言，有点不伦不类。说的在理，但于我所见，较之时下不少的人“见钱眼开”、“见利忘义”总要好得多。何况这是信徒们的“信条”。

有人谈到，一九三四年郁达夫曾陪同日本友人——文学士远藤隆吉到此游过，我颇新鲜，因为我查检过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郁达夫日记，没有发现记载，也不曾见到过有关天中山的诗作与游记。下山后，我在太平祠堂里，倒是真的见到了远藤隆吉的破旧题匾，始信其言不谬。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再访白龙寺

我去白龙寺不是第一次了。只不过前几次去，它仅仅作为村名而已。这再一次去，才见到了真正的“寺”，更觉白龙寺不可不到。而且，不单单是指虔诚的佛教徒和男女香客。去过白龙寺，会让你享受到“不虚此行”的乐道！

第一次我去白龙寺是在五年以前，为撰写《一百个富阳人》采访陆玉农。因为他所在的小山村和尚庄，原来是白龙寺里和尚种植庄园的地方。

和尚庄就在白龙寺村的村口，两个小山村紧紧相连。我曾为那里的优美自然环境所吸引：

秋阳下，和尚庄美得就像一幅诗的图画。此刻，在狮子山上俯瞰，谁都感到大自然的美酒是如此浓烈。这里三面环山，果树丛丛，林木参天，修篁茂密，泉水潺潺，含苞的芙蓉，装修着弯弯的村道……

为了获得某些背景材料作铺垫，我对和尚庄和白龙寺的过去和现状，也曾作过些许描写：

这个宋乾德二年（公元 964 年）清泰禅师建成的白龙寺及和尚种植的庄园，本来贫瘠得出奇，山是岩块堆的，

土是卵石掺的；一日大雨，山溪狂湍，三个太阳，滴水断流，村民们刨刨挖挖，种点红薯充饥。住的是破破烂烂的茅舍，风雨飘摇……因为穷，小伙子只好当光棍了，谁家有姑娘肯上这上无片瓦、下无良田，一出门黄泥粘脱鞋的穷山窝呵。

这是诉说过去。然而，新中国诞生后的数十年间，也是这般光景。

其实，五年前这一带便变得很诱人，去过者都觉眼熟。而我，当时就把它称作现代“桃花源”。

……它让内外宾朋傻了眼！这里家家楼台亭榭，幢幢居室豪华，装饰典雅别致，宛如宾馆、别墅，彩电、吊灯、电扇、浴缸、抽水马桶等一应俱全。入夜，小山村弦音不绝，舞姿翩翩，热闹非凡……

又因为它以江南“农家乐”旅游点而闻名，来过许多蓝眼睛、黄头发，着各式服装的外国人，包括各国驻华使馆的儿童们，把这里当作中国理想的“绿色课堂”。

这些年，我又多次去过和尚庄和白龙寺，且多半是陪着一些国内外很有身份的贵宾们去的，还在那里接待过新加坡和蒙古的作家代表团。

去者无不流连忘返。

这次再去是今年六一儿童节的第二天。同行者十余人，却全是富阳教育界、文坛上颇有声望的老者，多半年逾古稀，最高寿的朱岫云老先生，时年八十又八。凑数已过花甲的我，只能算是小弟弟。

如今的白龙寺，已于前年十一月被杭州市政府批准为富阳首家佛教开放点。这是富阳佛教界的大喜事，连国内外的佛教领袖、高僧们也给予了很大关注。所以，“几经兴废”，只剩一方寺基的千年古刹，很快便能复现为“清净庄严、具足三宝”的胜地。富阳佛协的主持者言，它还能“为我市的改革开放，振兴经济带来吉祥”。

真乃“顺应民心百事兴”，白龙寺的复建是有点“深圳式”的。去年秋天动工的首期工程——高高大大的“圆通宝殿”已经结顶，即将竣工。赵朴初先生题写的“白龙禅寺”匾额已付制作，市委书记写的“弘扬佛教文化”碑文也已刻成。于是，市委统战部门和富阳佛协的主持者们，颇具超前意识也似称得上独具慧眼，专门邀请一批邑人中的有识之士，亲往参观，为的是征集“圆通宝殿”的大柱楹联。

在寺旁的一所民居内，白龙寺村的陶村长，高桥镇的汤镇长等，已经候接在那里，让人感动又有点费解的是，为中餐素斋买菜做饭的，全是富阳街上闻讯自动赶去的佛教信徒们，既有在职干部也有退了休的，其中两位过了花甲的，一位是我的老乡亲刘嫂，另一位竟是我五十年代就同事过的谢大姐。

复建中的白龙寺是相当宏伟的，有一千四百多平方米的大雄宝殿、天王殿、三圣殿；有相应配套的先德堂、斋堂、僧房、客厅等，面积多达二千五百平方米。据说全部落成，下雨天僧人们去任何一处佛堂都不用湿脚。而且，连车路、步行小道、停车场和放生池（利用寺前一水库）也都有了雏型。看着眼前即将竣工的“圆通宝殿”，我们都笃信蓝图很快会变成现实。

在听介绍和参观中，最吸引我们的是，正在天台国清寺塑制的、即将迎入白龙寺“圆通宝殿”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此像塑有三层十一个头面，一千只眼睛，这一千只手中，计有大

手四十有八，小手九百五十二。吾等争着观看照片，这九百五十二只小手全都围绕金身排列有序，形成一个大大的光环！

去白龙寺，可以探访佛教释源，怡心志于“我佛理想的安身之地”；可以观光这一带城里人难得见到的风光秀色；而这片沉睡的土地在“松绑”后突变为现代“桃花源”，更能让你惊叹不已。一句话，白龙寺值得去，何况它距富阳城仅十五公里，又处在三二〇国道的杭富路边上，来去非常方便。

一九九四年六月

游大奇山记

由兰溪的诸葛村返回，顺道登了建德大慈岩。这处建于高峰下、崖岩中、又名“悬空寺”的“圣地”，尽管铺有石阶，凿有栈道，攀援又有铁索，但上山竟花去一个多小时。虽然都说吃力煞了，却也游出兴致。到达寺中，喝茶也是好滋味。

正因为游出了兴致，所以当从桐庐返回途中，在别人的怂恿下又去游了大奇山。

大奇山在桐庐，由镇西端过大桥南去约七公里。车子一到，我们为之一惊：上午九时稍过，停车广场几乎挤满了，看车牌多半是上海来的大型旅游客车，又见人流涌动，一歇不歇地上上下下，进进出出，连茶座也极少空位。

从瑶琳仙境始，桐庐人开发旅游不断走出妙棋，早为条件优于他们的富阳人望尘莫及。

大奇山之奇，奇在它原本是个普普通通的林场。由于他们善预测多谋划，又敢于投入，硬是把一处既缺文化内涵（不见名胜古迹）又少茂密森林、奇岩怪石的所在，推出了“大奇山森林公园”而广招游客。

大奇山于上海人、于许多长住城市的人而言，当然称得上奇：空气新鲜，清香润鼻；鸟鸣啾啾，泉水叮咚；野果子任采任尝，即便那些青里泛红的草莓丛有点遭殃，但它仍会在来年重现生机，再度奉献。特别是进出路上所架的各式过溪小桥，走

一走是极富情趣的。更有似昔之过大渡河的铁索桥，摇摇晃晃，丁丁当当！他们又硬是围流成瀑，截挖成湖，或蓝如碧或白如银，怎会不让城里人感到新奇！对于“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富阳来说，这就算不上稀奇。在富阳，这般景点多的是。

然而，我们仍称道桐庐人的开发旅游有方，招引游客有术。仅以开出砌成由山脚至山顶的沿溪石子路，工程就非同寻常；还要造桥、造亭子。

回程车上，我跟两位龙门老孙一路聊天，如能在龙门老家，营造一个造福子孙的“龙门山公园”，该有多好，这吴大帝后裔聚居地，有这么多这么好的古建筑群，已够吸引人了；有成片茂密的松树林、杉树林，以及全省罕见的赤树林的“龙门林场”，可谓现成；上、中、下三个龙潭及其传说故事，神不神？进山路上的钟鼓石、老鹰石、和尚背娘子石，怪不怪？郁达夫等名人留下的诗篇，“天外银河一道斜，四山飞瀑尽鸣蛙”，“云过疑岩动，溪鸣似雨来”，绝不绝？要是开片以“龙门面筋”作系列的菜馆，也定会高朋满座。因为我陪徐迟、苗子、郁风等去品尝过，都称道不已。还因我三度登龙门山，讲得符合实际，两位龙门老孙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好点子。

由大奇山说到龙门山，再想到富阳可开发多处胜过大奇山的景点：天中山，庙山坞，唐代著名诗人罗隐读书地，江北白龙寺的添景，以及前些年花大力寻探过的许多神奇溶洞——大到一个厅能容数千人聚会，小到只能容一人侧身进去探奇，至于琳琅满目、惟妙惟肖的钟乳石群，难说不能与瑶琳、灵山媲美！

当然，即便我们想到了，动作了，以后兴旺了，仍要拜桐庐人为师，因为他们率先走出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而这般多点开发，于富阳于桐庐都有好处：同一条旅游线上

的！何况双休日的推行，不愁没有客源。

我是不大赞成“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古训的，尤其是后半句。由大奇山想开去，说开去，这些年富阳旅游业到底应作何评估，我们无必要说出定语。不过作为富阳百姓的一分子，说三道四却也未尝不可。

本文的结束语是：

时间是严肃的批评者，成果是确实的见证人。

一九九五年六月

陪徐迟游富春

“有幸家在富春江，令我羨煞您也！”

这是徐迟同志为我在一把折纸小团扇上的题词。

小扇本是郁风的，是她去萧山郁家山寻访郁达夫祖籍、看郁氏宗谱时，当地族亲送她的纪念品。只剩两把。徐迟同志在富阳小住十天，我一直陪同，当他要离开的前一日，郁风想自己已为故乡友人留下不少画作，而徐迟同志难得来，该让他也给我留下点什么，便拿出一把小扇当着他的面给了我，并说：“画我已给了，我再把这扇子送给老蒋，你就在这上面给他题几个字吧。”“行行”，徐迟同志边说边摸出钢笔，略加思索，当即就写。扇面不足十公分长，褶页更小，徐老是摸平两格写一行，仔仔细细写就的。郁风看看位置构图，亦在扇面左下角题字：“郁风赠扇并设计。”还加盖了齐白石生前给她篆刻的印章。此事为年轻的副县长沈建国得知，当即称羨不已，说：“你是有幸得珍品。”

“我跟徐老相处这么多天，更是有幸。”我说，可这位年轻的“县太爷”另生心计，自备的扇子更大，求徐老题的字也比我的多得多。

时间已跨了一个年度，当时的情景却仍在眼前。

那是迟桂花开的日子里。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日，郁风趁北京两个会议的间隙，又

“潜”回到富阳故乡。在十一日富阳县委为她洗尘时透露，徐迟最近回到他的故乡南浔，很想游一游富春江，我趁便邀请了他，如果他能来就会先打电报来。

“是否《哥德巴赫猜想》的作家？”我们都问。郁风回答就是他。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何止震惊科技界，我们都说早就慕名，非常欢迎他来。

郁风是老脾气，每次回家乡，日程都排得紧紧满满，而且都得沉到乡下去转转。第二天她乘游艇溯富春江而上去了新桐乡。

十三日我一上班，就接到发自武汉的电报：十三日航班飞杭（十五点四十分），徐迟。”我估计下午四点半左右即可到达杭州，富阳得在两点钟前发车去接。郁风肯定赶不回来了。而我又从未见到过徐迟同志。没办法，只得带着写有“接徐迟”的牌子。匆匆去了笕桥机场。

我擎着牌子站到机场出口处的长凳上。谁知一下子在接客群中引起了轰响。有好几个人拥过来问我：“是不是《哥德巴赫猜想》的作者？”当我作答后，他们都露出了敬仰的目光。有的还伸出大拇指。

徐迟同志是最后一个出机场口的。距我三十米开外，就笑着抬手跟我打招呼。我作了自我介绍并告以郁风不能前来，我只能擎着牌子“亮相”时，他风趣地说：“行行，你我都挂牌示众！”

上车时，他硬要拉我跟他坐在一起，说“要跟你聊天”。一路上，说是跟我聊天，实为他一人“承包”——除了提问需我作答。

他先讲乘飞机：“如今改革、开放、搞活，乘飞机的人特别多，我差点来不了。但跟郁风约好总不能失信。不得已去找武

汉民航开后门，才将空中小姐的保留位置让给我一席。”继而又讲了空中小姐如何照顾老人有方，要扶着他让他最后一个出机舱。“所以我成了‘落伍者’！”他说着大笑。

接着他给我讲跟郁风的友谊：“我们是老同事老交情了。三十年代最后一天——年三十夜，我和郁风、浅予，三个同在香港浅水湾，同看太阳慢慢落山。我当时说，今天是三十年代最后一天了，今天的太阳一落山，明天升起的太阳就是四十年代了，不知道四十年代会怎样。”

稍停。我估摸他把记忆拉回到了过去……

“四十年代更辉煌。”他见我洗耳恭听，就又讲开了：“太平洋战争结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新中国诞生，不都是四十年代么？”似乎需要我作出反应。我讲叶老（浅予）已回桐庐，过了八十寿诞，他老人家还要向家乡捐赠一批珍贵文物书画。正好十月二十日要在桐庐举行捐赠仪式，如果你也能去，便是你们三老重逢了。“是吗？我当然要去桐庐，这是我跟郁风、浅予事先商量好的。”看他神情，一副快活的样子。

车沿西湖行进。他转了话题：“电视上见到杭州遭台风，把好多风景树刮断了，真可惜！如今看看，并不如想象那么严重。”我告诉他，当日我正在杭州，台风过后，确是不像样子。后经园林工人、市民们，还有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日夜奋战，连根拔起的大树才大部分得救。他高兴地说：“这好，美丽的杭州西湖，如果没葱茂的树木，不堪设想！”

“好香，我们的家乡真是好地方！”车至虎跑路，夜幕开始降临，当他拉开车窗外望时，一股桂花香气扑鼻而来。他说：“这定是迟桂花，郁达夫有篇小说就叫《迟桂花》，迟桂花特别香。”接着告诉我，他是湖州南浔人，解放后住北京，五十年代周总理亲自决策，计划在长江三峡截江造大型发电站，才为此

去了武汉，一住三十多个春秋。他说，他对科学、对电特别感兴趣，现正在写这方面的文章。不久，我便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了他写华北大电网的报告文学。

当我说了句“我们还是大同乡”时，他又滔滔不绝的讲开了。

“‘文革’中打成牛鬼蛇神。后从五七干校‘解放’出来，我执意回老家湖州，可费了很多周折，直到谭启龙批示，允我在湖州落户，却不料就在同时，接到湖北省委通知，要我去武汉报到分配工作，我只好老居客乡了。”

他真健谈，我一直听谈到车至富阳。

当天晚餐，是在郁达夫故居天民嫂家吃的。我在车上就跟他打招呼，怕是迟了。宾馆已过用餐时间，晚餐我们跟郁风一道去吃。我还告诉他，郁风每次回来，大多是这家那家吃“轮供饭”。他笑笑说：“郁风好福气，吃家乡的家常饭香甜，这回我得跟着她，千万别吃宴请。”好客的天民夫人摆满了一桌子家乡小菜，还有红葡萄酒和白酒。问他爱吃什么，他直言：回家乡最好吃家乡老酒，主人改用绍兴“加饭”，他吃了一小口就喜形于色：“家乡酒既醇又香，在武汉很难买到。”

在以后的十天里，他除了去了一次桐庐会浅予，和郁风郁飞去了趟萧山“寻根”，我几乎天天陪他在富阳各地转，富春江南北两岸都留下了他的足印，他的音容笑貌。

在龙门古镇，他对这明、清古建筑群极感兴趣，看得仔细，问得详尽。连地下水系渠道如何沟通也研究一番。还要我提供古镇布局图，以及宗族谱系的演变资料。

去元代大画家黄公望晚年隐居地和坟墓地庙山坞。他称赞那里的环境实在太美了，说：“难怪黄子久能画出《富春山居图》那样的警世之作！”

在富春江心的新沙“农家乐”旅游点，参观农家民俗项目，乘坐仿古牛车，亲身体验手工造纸，龙骨水车和古农家具，欣赏了斗山羊等即兴表演，他非常兴奋，当即兴致勃勃地题词：

“多么可喜的一首中世纪似的田园式的幽静闲裕的阿卡廷牧歌。”

写就后觉得很得意，又催郁风接着写。郁风的题词则是：

“即使到了电子时代，人们也渴望有这样一片绿色的、有白墙黑瓦的幽静田园。”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他玩得舒畅，吃得满意。除早餐外，中、晚餐都在农民家里用餐，或同郁风在镇上的亲朋友里吃“轮供饭”。回味席间所谈，很有意思。

一次，在上官竹乡一位农民家里用餐，因为是临时“突然袭击”，面条一碗，他也吃得满意。可他又直说：“身在竹乡，可惜没有吃到毛竹鞭笋，以后还得重来补上。”

又一次，在一位农民企业家家里，现代化的别墅式洋楼，现代化的家用电器，令他惊奇！但他却又说：“屋里什么都有了，可惜缺少了书籍。”他到每个房间都去转过，看在眼里，想到深处：“父亲太忙或者少文化，不买书，少读书，情有可原；而他高中毕业的儿女房间里没有书籍，这不好。”

在一位退休的盛老师家里吃野味专宴，野兔肉、山鹿肉。炒的炖的，他吃得特别开胃。说这是到富阳后的最高享受，还从食野味谈到了山林绿化，谈保护生态平衡之重要，说是此事不做好，对不起子孙后代。

令我特别不能忘怀的是，一次在镇上一位书画收藏者家里用餐，席间谈到了当今不正之风，腐败现象。他十分愤慨！而当我说了句“过头话”时，他却当即纠正说：“不能这样讲，你是酒后失言吧。”

徐迟同志在富阳期间，包括郁风在内，我们称得上是配合默契，因为互相都有承诺，且各自恪守承诺。

先是我请他为富阳文艺工作者举行一次讲座，郁风便从旁帮腔：“我们家乡的这位文联主席对你真客气，求你，跟你商量，可对我就不一样了，八六年我出访回来返故里，人没到富阳，他便将印有郁风主讲的文艺讲座票发出了，那是真正的搞‘突然袭击’！”徐迟同志笑笑应允了，但又提出两个交换条件：一是规模要小，对话式；二是不能将此来的行踪向杭州扩散。他说：“只在富阳小住，把富春山水看个够，不能让杭州的老朋友知道来看我，我也不去拜访他们了。知而不为，是失礼的。见到外人介绍，你们只说是《长江文艺》编辑老徐。”

十月二十一日，对话式的讲座如期举行，他从“猜想”说起，谈过去谈现在谈未来，从中国讲到世界，更多的则是讲做学问必先做人的道理。最后他说：“我那《哥德巴赫猜想》已成历史，但‘猜想’的命题是永恒的，人一定要富于‘猜想’。”当有人向他提问：“如今搞纯文学的人少了，连许多有成就的作家也去写通俗文学，这是不是逼良为娼，对纯文学稿酬太低、通俗文学畅销而赚钱的一种报复？”他断然回答：“不能这么说，第一，把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作为文艺层次的概念去划分，这不确切；第二，有志于文学上出好作品的作家多的是；第三，当今有些通俗文学，简直是庸俗文学，前几天我在《人民日报》上写的那篇短文，就是对此而发，如长此下去对我中华民族的损害是极大的。”

我有意“将欲取之必先予之”，送他一本《富阳游》小册子，并说，那上面有历代名人对富春江写下的诗词，唯独缺少称得上惊世之作的富春江游记。第二天他告诉我，这小册子编写得不错，本子虽小，容量且大，是我见到的“旅游指南”中最好的

一本。我当然心中有数——因为那小册子是我为主撰写的。对我鼓励而已。但我仍不放过机会：这次你老该给我们小小的《富春江》刊物也写一篇。郁风又帮打边鼓：小册子他昨晚就看了，还称赞编写得好哩！文章他自然会写，我写了，适夷八年来富阳也给写了。他也只好应允。到了接近离富去京的日子，我又将此事重提，他不但承诺，还说：“富春江值得写，定能写好，我要跟历代名家比比；要为你们刊物写，还得向《人民日报》海外版发稿，争取连载我的《富春江游记》。让更多的国外友人来富阳。”去年年底，他的来信中讲到，已经写就了几篇，但还要搁一搁，再看看，再改改，直到改好才发表。还说这是他的习惯。

临行前的一天晚上，富阳县府为他和郁风饯行，当县里的领导们邀请他再来时，他反问：“你们现在全县的工农业总产值是多少？”告以接近十五个亿。他说：“你们达到五十个亿，就写信给我，我老徐一定再来。”主人对五十个亿有点“讨价还价”，他一点不肯让步，他说：“少了不行，‘弄虚作假’更不行。”接着他说：“五年前你们的基础很低，这五年跃到十五个亿，发展有多快！五十个亿不能少，我估计，我再来时不会出五年。”十天，仅仅逗留了短暂的十天，他对富阳的情况已很知底里。

他真是一位直率坦诚、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可尊敬的老人。富春山山水水，富阳人民，将一定欢迎他再来，他也必会再来。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也说大源经纬线科学公园

值得纪念的日子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这个日子，在富阳的历史上，也许后人还会大书特书的。

就在这一天，《富阳报》在头版刊登一条出人意外的消息，文题曰：《富阳旅游的大手笔》，副题是“介绍建设中的大源经纬线科学公园”。

就在这一天，在大源镇东升村举行了与这个村的村名有着密切联系的纪念活动：“东经 120° 北纬 30° 交汇点”奠基典礼。

作为大源的乡人，我一上班便欣喜地且是非常细心地看完了这天《富阳报》的这条消息；我十分有幸地且是非常难得地接受了大源镇政府的邀请，得以亲赴现场参加这一庆典。

在大源镇前任领导董继林的陪引下，去到了小地名叫琵琶弦的地方。在现场最先令我注意到的是，浙江省测绘局埋下的铜制（也许是生铁浇铸）交叉点定位准星，便去用手摸一摸。这倒并非为了避邪，求运，或摄取感应得以延年益寿，而是为了留下一份永久的纪念。好奇之余我想到了，这小不点儿的份

量有多重——在它“身”上，集中了多少专家、学者的心血呵！也因此，硬是要带去相机的李章夫为我们拍下一张照片。

当庆典进入高潮，方永建副市长一招呼，我似是求之不得地为这奠基铲了几把土。尽管前些年上挂(牌)下埋(奠基)的活动频频，我人微言轻轮勿着，说实话我也不想去为之剪彩、铲土，可这一次，我不推不让；我以为，这是很有意义的。

这一天，确乃千载难逢。

神秘的北纬 30°线

把地理学上的北回归线，从抽象的线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物体，并使它从教科书上、从地图上搬到了地面上，搬到大自然和社会上去，何止是一处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何止是教育学上的一次革命，而是使天文和地理科普工作大大地往前推进了一步。

先看地图。当上面有几条纵横交错的线跃入眼中时，我们只知道它们被叫做经纬线，是指示方向和确定位置用的。除此之外，一般人，例如我，就知之不多了。这一回，在大源的当政者，乃至当地的普通百姓，也能说出个 ABC 了。

再说听气象、听报北京标准时间。尤其是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台风消息，它的形成，它的进程处在何种位置上，东经几度，北纬几度？随着大源科学公园的建成，相信以后听起来就不会那么吃力了。就说从收音机中传来：“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十二点整”的声音时，指的是东经 120°线达到了太阳中天，也即居住在东经 120°线上的人们能看到这时太阳的影子最短，是真正的十二点。然而，北京市还只有十一时四十四分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答案已在大源初露端倪。

有鉴于此，古今的科学家作过许多努力，力图揭穿谜底。

虽然弄明白了北纬 30° 是低纬度与中纬度的分界线，然而，为什么北纬 30° 附近会有五个“魔鬼三角区”，异常到进入该区域的飞机船舶屡屡失踪？为什么北纬 30° 附近有着世界上最高的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有着世界上陆地最低及含盐度最高的死海；有着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有着世界上著名的杭州湾钱塘潮？而且，在北纬 30° 附近，还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起源地？

此外，在这一纬度地带，还有许多不解之谜：四川自贡的恐龙遗迹，埃及神秘的金字塔及那里的考古发现……

北纬 30° 附近，集中了世界上如此众多的自然景观和地域事件，难怪该线早有“神秘的北纬 30° 线”之称。

标准线的交点在哪里

上面提到的这许许多多的不解之谜，科学家们尚在不断探索之中。作为经纬度的标准线的交点，或者说它们的交叉准星点，自然是中外专家、学者们所特别感兴趣探索的。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通过我国境内的经纬线有许许多多条，不过，整数倍相交的线只有六纵四横，再加上北回归线总共只有十一条。其中最重要天文意义的却只有三条。而它的标准线的交点处，据说有八处是在沙漠或原始森林里，有两处则位在广东、海南的大海中。除此之外，处在我国大陆的、交通最便捷的这一处，就在我们浙江富阳，就在富阳的大源东升村。

可见，在这里建设“经纬线科学公园”意义之重大了。当然，在此以前，也早有人捷足先登了。

在我国，最早设立北回归线标准塔是在一九〇九年，位于台湾省嘉义县西南约四公里许的之水上乡；塔的四面各书“北回归线标准”六个镏金大字，颇为壮观也非常耀眼。目前那里已辟为开放式公园，每当夏至前后，游客云集，领略温热分界之风情，并脚踏温热两带以摄影留念。

从一九八四年至八六年的两年间，在广东省，又分别于封开县的江口、广州从化的太平场、汕头的鸡笼山，先后建起了三座北回归线标塔。这是现今我国科学工作者引以为荣的贡献。

然而，一纵两横三条具有特殊天文意义和地理意义的经纬线中，有两条通过同一省（区）已实属罕见；若论两线之交点，全国范围内却只有富阳一条。

那么，更确切些说，令世人瞩目的这个交叉点又在何方？经过核查，经过无数科学工作者的仔细测定，它就在富阳大源镇西南约四百米的岩山脚下，也即今东升村、小地名叫琵琶弦的地方。

好一方风水宝地

我当声明，出这个小标题作文，并不是我唯心论作祟，而是我可以很自信地表白，唯物论的问题我早就解决，且坚信不疑。我对前些年的凡举事择“8”，车牌号码夺“8”，出远门问卜是很不以为然的。

然而，我要说，大源东升村的这个经纬线的交叉准点位置，确是块风水宝地。著名作家徐迟曾送给我一则题词：“有幸家在富春江，令我羨煞您也。”可他怎能知道，我的老家就在大源，那里是生我养育我的地方；我的高小毕业就在东升村的学

校，少时，那里是我生活过的地方，新中国建立不久，那里是我工作过的地方，乃至我家的祖坟也归葬在那里。

从前小地点名叫庙山岭，如今集镇规模扩大，这里称作阳平路。此乃阳平山的移名。阳平山者，孙权祖上坟墓之地也。这在富阳县志上是明明白白记载了的。当然，“常见紫气缭绕”的话是不可信的。但是，这确是一块绝好的地方。就说与之紧紧相连的经纬度的交叉准点的位置，这琵琶弦的名字有多雅呵！前人为何取这名字，是值得今人考究一番的。也许当年取名者是不会想到的，却如今这“弦音”倒真的回音四方了。以“弦音”比“磁场”有何不可！

坐西南朝东北，左是岩山，右为稻蓬山。高于稻蓬山的岩山暂且不去说它，于抗日时、国统期在稻蓬山上建炮台这件事说明，看富阳城的建筑，观大江东去的春江，真乃一览无余！稻蓬山，于农民来说，则是很实际的称谓也。

我不想再细作介绍了。不信者，可去实地瞧瞧。我相信今后去那里涉足的人会从四面八方来，从天涯海角来。乃至黄头发、蓝眼睛的异域人，也不会放过去一游一观的机会的。

乡情乎，民意乎

“天下文章一大抄”。半文盲底子、纯属科盲的我，本文许多内容是抄来的，只是为了叙述、行文的需要，我不采取直接引用的手法而已。尤其是文中有关介绍天文、地理知识的那些部分。而且，我觉得在这里仅仅一笔带过略作说明还不够。即还得再说。

引文多半出自《富阳市大源镇经纬度整数调查资料》，里面的文章标题为《神秘的北纬 30°线与北京时间标准线的交点

在哪里》。该文作者王金昌，一九六一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地理系，一贯从事中学教育，现为中学高级教师，中国地理学会会员。王先生是地道的大源镇王家门村人。笔者见其文章在后，也即这一次去大源向俞召泉镇长处要得的。但见其致大源镇的亲笔书信却在此以前好多年。惜乎，至今我还不曾与王先生晤过面。

这件事的缘起是在三年以前，一次，时任大源镇人大主任的董继林找到我说，有位在外地工作的大源老乡给镇里寄来一封信，要是正像信上所说，我们倒是很可以做些文章的。过后不久，我正巧参加了在杭州召开的“江南与日本”国际学术研讨会，欣逢国家级著名学者、杭大地理系教授陈桥驿老师。向他打听并证实确有其事。他还答应愿意帮忙，例如查资料，搞论证等。我们不但在房间一起留影，他还相赠名片，以利联络。我把这欣喜告诉了老董。当富阳十一届三次人代会召开之际，大源镇里的当政者们很起劲地要写提案，我不但协助起草过文字，而且代他们起草了给王先生的复信，除却表示感谢的意思，以求获得更具体的资料与支持。记得当时王先生的住址是在贵州某地。果然，人大采纳了，人大管提案的老喻也很热心。这以后，大源镇和市里有关部门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工作我就不大清楚了。

这回去现场，我惊奇，我更欣喜，因为这件事已经有了初步的结局了。据大源镇的镇委书记张文法告知，经纬线科学公园内的首期工程标志塔，可望在年内（也许是七八月份）就可建成。又据方副市长说，所在地东升村也非常积极主动，沿山开了道，逢溪架了桥，征地、移房、迁坟都不像有些地方那样，是漫天要价的！所以市政府已拨款五十万作为该工程的启动资金。

近日，市里正在召开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和政协四届五次会议，我又亲耳听到朱市长所作“政府报告”中有这样的话：“积极发展旅游业……抓住 97 中国旅游年和香港回归的潜力，优化充实景点内涵……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我市观光旅游。动建大源经纬度整点交点标志塔……”

朱市长的这些话，是在政府报告中的另一处指出我市“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业发展严重滞后”的情况下相呼应作出的。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这件关系到赤子乡情夙愿，关系到当地民意及子孙后代，关系到富阳旅游前景的大好事，是会办成功的。

一九九七年三月四日

乡 邑 人 物

话说春江旧钓徒

富春江，如少女，似碧玉，像白练……今古美誉，不一而足。作家李杭育，以富春江为源，首创“葛川江文化”。另一位女作家王旭峰又把它称作“迷江”。难怪它为国内外游客所向往；难怪郁达夫东渡日本后便刻备一枚书画图章，曰：“我是春江旧钓徒”。

古往今来，富春江上的钓徒不可胜数。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东汉严光了。据《富阳县志》所记，仅富阳境内“严子陵垂钓处”就有三处。一在县西南桐洲，一在县东侧赤亭山，还有一处在鹤山。作为老富阳，鹤山一处我是熟知者。而其他两处，一则离富阳城僻远，二来由于沧海桑田，遗迹难觅，我就不敢妄言了。

幸好，今年盛夏参加了县文联组织的散文作者沿富春江采风活动，总算作了一番较为详尽的实地考察。一路行来，谈古人遗篇，谒先贤墓地，每每勾起许多联想。

从富阳镇发车沿富春江西行，经明大将徐达出兵鹿山的古战场，过十里长山到收纤山矶头，程坟村便尽收眼底了。这里是半月形地势，整个村落沿江布局，粉墙青瓦半掩半映在绿柳丛中，要是江边有条石砌江堤，我们将误以为又回到了富阳镇。

传说程坟因三国时东吴大将程普墓地得名。因为江对岸

就是孙权故里瓜桥埠，君臣二人要生死相依。但郁达夫在《钓台的春昼》中讲：“……经过一支山岭，便是富阳境界，大约去程明道的墓地程坟总也不过一二十里地间隔。”这里的程坟又指的是宋代程明道的坟墓了。可见，传说终归是传说，即便上了书的，也不见得都是对的。

穿过程坟村，在蛇浦、包家洪分别停留，谒董诰坟，凭吊重修董邦达墓，欣赏残存的但极精湛的石雕艺术，细辨御制碑石，思古之情油然而生。这清朝董氏父子，为官清廉，又都是书画大家，百年后归葬故里，且皆选择于此，大概是富春山水之故，生不能于富春江滨做一个悠闲的钓徒，死后亦求补享罢。

在小桐洲吃过中饭，我们继续沿江西行，去大桐洲寻觅“严子陵垂钓处”。

大桐洲四面临江，是富春江富阳江段四十二公里的入界处，又是南北朝诗人谢灵运称之为富春江上特有的“富春渚”的第一个江心沙洲。上游就是桐江和分水江的汇合处，再往上则是谢皋羽西台痛哭的钓台了。洲上有四个村落，两千多人口。村人说，这沙洲是活动的，像一艘臃肿的开艚船，一直在向上航行，因为它靠的是扬帆拉纤，所以航行速度就十分缓慢了。当我们穿过足足一华里长的绿柳枸杞树的密林，来到上游的洲的尽头时，竟相信了洲上人这一有趣的比喻。吃够了洪水为患苦头的洲上人，在洲头植树护岸，迫使被冲击下来的沙石在此停留，沙洲确在往上涨，往桐庐方向延伸。

烈日当头。我们已是汗流浹背，幸亏向导熟门熟路，领我们沿水渠，跨河沟，穿林荫，一路所见，三开间两层新楼比比皆是。那些阳台，嵌有各色玻璃石子或马赛克，三层洋房也一幢幢平地拔起，好几户农家的老人们正在电视机旁看“午间新闻”。农村富裕了，现代文明已大摇大摆、迅猛异常地来到了这

个江心岛上。

我们走进了一间晚清末年建成的台门屋。它有点像北京的四合院，只是更高、更大。跨入大台门，三正四厢加天井，聚居着三五户人家；但因为空间大，通风好，从烈日下进去的人，像是进到了空调房，感到特别凉爽。在一位老村干部家里，主人捧出几个西瓜给我们消暑解渴。嗨，好大一只西瓜哟，我们惊呆了：十几个人敞开肚皮吃竟没有吃光。向导指着主人说，他是这洲上有名的“瓜王”。“我们洲上还有‘船王’呢。”主人却接嘴说。过去，这里是一场大雨船当桥，男女老少爬上灶，最穷的人家也有一条一人背得动的小舢板船，靠它捕捞、运输，也靠它救命。如今江里柯鱼、挖砂、运输，大多数用上了轮机船。洲上有个跛脚的党员，独自置办一条能装三十吨的大铁船，成了万元户，大家都称他是“船王”。

小憩片刻，我们便去寻觅“严子陵垂钓处”的旧址。它在孙家村边的石佛寺，寺的主殿已毁，抱屋完好。我们进去，女主人——当年小和尚杨福兴的妻子——一位七十六岁的老太太正席地睡午觉。看见我们进来，开始有点惶然惊疑，但很快恢复常态。让坐、递扇、泡茶。从言谈中，我们发现她耳聪目明。“老头子值田去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好了。”她很自信能满足我们的采访要求。她讲话直率，说比她男人大十多岁，在解放后和尚还俗时才跟福兴结婚的，而且是带着前夫所生的儿子转嫁到此地……她侃侃的谈着。“老的老，小的还小，你们这所房子盖起来不容易啊！”我指着紧靠着寺院抱屋新砌的楼房又问她。“自力更生吆！”她很顺畅地回答。好一个“自力更生！”它竟出自这小岛上的古稀老太太之口，惹得我们这些人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女主人还告诉我们，石佛寺又称吉祥寺，听老一辈人说，原先是建在江边的，寺后有像鹳山矾头那样大的大

石塔，石塔边有棵大樟树，树底下有个“仙人”钓过鱼，早时寺边还有石碑，那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我们知道，她所说的“仙人”便是严光。她的话足以使你想象到，一位飘逸潇洒的老者，在霏微的富春江上徘徊，寻找着理想的垂钓之处，如是，于石佛寺素斋，踏着方步，观赏富春江景色；又常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手持钓竿，腰系鱼篓，或在大树下，或在石塔上，怡然自得地垂钓起来……

年轻人思维活跃，且好争论，有时会逼得你也去穷思苦想。“严光太清高，违背了‘邦有道则仕’的古训，天下太平了，应该出来显一显身手”；“严光不买同窗好友皇帝的面子，不肯出山，不接受提拔，太不够朋友了”；“大概他为了避攀附之嫌啊”；“我看未必。古人云，宦海风波。与其陷进仕途的险恶，还不如挂冠归田呢。严光是真君子……”争论渐渐激烈起来。我听着，想着。褒也好，贬也好，都不可苛求。事实上，一个人应对自己有个符合实际的估计，果真是做官的料，做官也不坏。汉光武帝也算是个开明君主，借此，大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做一个听民勤政、朝乾夕惕之士，岂不快哉。当然，怕的是自视甚高又不学无术，凭借与皇帝老儿有点“后门关系”而挂一顶“谏议大夫”或别的什么头衔，领干薪，那就与尸位素餐的官僚绝无二致。这倒还不如做一个“春江旧钓徒”的好！

夜宿东梓关。第二天步行去王洲寻觅孙权故地；看孙权后代建造的孙氏庙宇；找孙权祖父孙钟种过瓜的十亩“雄瓜地”；辨认模糊不清的记述孙氏生平的石刻碑文。与严隐士相比，孙权可谓强者。他跟父兄一起，驰骋疆场，像接力赛一样连续奋斗，终于创下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霸业。我们中有人说，时势造英雄。时运所至之时，要么做隐士，要么像模像样地干一番业绩。

第三天，我们改乘游艇往下游驶去。经东洲，过灵桥，沿十里汤山到里山，眨眼功夫来到了八角山跟前。

这里也曾隐居着一位明朝正统年间的钓徒。姓俞名膺字古章。他才高学广，但不愿为官。又因酷爱富春山水，便在这八角山上结庐读书，到山下躬耕垂钓。后人钦佩其风骨，颂诗一首：“孤悬八角郁葱葱，垂钓春江处士风。绿水青山长作伴，布衣真可傲王公。”

据说，英宗皇帝派钦差专程来请俞膺出山做官。俞膺见那个钦差傲慢无礼，妄自尊大，就拒不接旨，并且写了一首诗辛辣地讽刺了他。诗云：

一出龙宫便作威，
无端推起雪山堆。
分明一派寻常水，
装出许多声势来。

那个讨厌的钦差只好灰溜溜的跑了。俞膺的胆识、学问、对庸碌官场不屑一顾的高洁风骨，足令后人敬仰。

渔山到了。于是舍舟登陆，步行三华里许，到了叫做平安顶的山坡上去考察夏震武的墓地。墓完好无损，墓碑上“夏灵峰先生之墓”几个篆字，漆黑油亮，映衬在青灰色的大理石上，烈日下显得特别醒目，估计是不久前才加工修葺过的。对这个人物，我们在返回途中展开了许多争论。他以亡清遗老自命，一直束发古装，反对共和，又反对“五四”，直至后来出任两级师范学校监督时，跟鲁迅、许寿裳等的反封建罢教、罢课公然唱对台戏，给后人留下了污点。但在军阀横行之时浙江都督和北洋政府几次聘他出山做官，都被他拒绝，从这一点上讲，

他又可算一位寻找桃源乐土的钓徒了。故而，郁达夫给予他一个中肯的评价：“夏灵峰先生虽然只知崇古不善处今，但是五十年来，像他那样顽固自尊的亡清遗老，也的确是没有第二个人。比较起那些官迷财迷的南满尚书和东洋宦婢来，他的经术言行，姑且不必去论它，就是以骨头来称称，我想也要比什么罗三郎、郑太郎辈，重到好几百倍。”

船继续下行，在富春江段的尽头大小沙，也就是最后一个“富春渚”宿了一夜，又溯江而上到了新沙。我们仿照外宾到这江南特有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农村来旅游的方法，江边野餐、观景。以后过渡乘车去了庙山坞，作为采风的最后一站。

庙山坞美极了。坞口，大岭山旧貌虽改，雄姿犹在；鸡笼山名不虚传；白鹤村半掩半现；抬头望天空，赤松子驾着祥云，依稀可见。入坞，车在林荫道上缓缓行驶，路两旁芳香扑鼻，梨儿、栗子缀满了枝头。轻柔的云雾缭绕着各呈风韵的古樟苍松。白墙青瓦的村屋，散落在山坡上、土丘间。东面的横山，西面的大岭，屏风似的遮掩了两边风口，把这里围成了三面环山、一面临江，恬静逸秀的独特处所。啊，我们来到了当年大画家黄公望结庐安身、尽瘁终老的小天地间。再往里去，便置身于竹林的海洋了。

沿着潺潺溪水，踏着林间小径，我们开始四处寻觅画家的踪迹。可是六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使画家的茅庐、坟墓荡然无存。幸亏我们中有位县文联美术书法协会会长曾到过这里，能告诉我们县志上记载这位大画家在笕箕泉结庐的大概所在。在一片竹林的间隔处，我们顺着他的手指望去，东面岗上只见一片雪白的浮云，像是从山岚的盘地里倾泻出来的笕箕泉水漫向山坡，铺向平川，掺和着画家的心血和墨彩，永无休止地奔入富春江。

此时的富春江，似乎只是一碧无底，没有尽头。江对岸的近峦远峰，层层迭迭，活脱脱一幅新《富春江山居图》便呈现在眼前了。

据老一辈人讲，这里曾是被称作“斗米湾”的富春江宽阔江段，上游江水和海洋里的潮水在此相撞，回旋成潭，一旦船只进到这里，要吃光了一斗米才能摇出来。当年浪迹于富春山水之间的黄子久有否在这里垂过钓？这里何时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不得而知，却又不能不遐想。富春江果真是条迷人的江。她有生命，有灵性，更有无法言传的魅力。她叫人倾倒，令人眷恋，使人愿与她朝夕厮守日夜为伴……啊，我似乎领悟了古人甘做“春江旧钓徒”的一片孤诣苦心了。是啊是啊，不要说严光、俞膺、黄子久等视利禄为粪土，就是一代名贤郑板桥不依旧“扯碎状元袍，脱去乌纱帽”，仍做了“二十年前旧板桥”吗？怕是官场倾轧又不愿为奴所使然吧。退隐山野，实为上策，这个钓徒，当得何其好啊。他们不攀龙附凤，自食其力，而且还能为社会创造点财富。尽管微乎其微，但总算是一个正数而不是负数……

可能有人会责备我说太美化古人了。那些“春江旧钓徒”是否因为安排不当而闹情绪、攥纱帽呢？也未可知。但古人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正气傲骨冲击着我去“反思”。于是我终于敞开了心扉。当然，时代进步到了今天，不想对社会作什么贡献而只顾一味寻找自己的“桃源乐土”、独善其身是不应该、也是不足取的。当然，也未必见得绝迹。

一九八六年夏

瞻仰夏灵峰墓散记

—

今年重阳节前五天，已逾古稀的朱新观先生专程来县城，相约富阳镇上的一些老友好，于重阳节去瞻仰爱国名士、理学大师夏灵峰先生之墓。不料现在的重阳节已改为老人节，要开会搞活动，不能如愿。乃改期在节后的第三天，我兴致勃勃地为伍其中，却已经是第三次去瞻仰夏老先生的墓了。

偏偏今年夏秋之交，台风数度侵扰富阳。乡间涨水，公路被毁；而我们要去的渔里山，骤降暴雨成灾，泥石流冲击更甚，连公路桥也毁于一旦。改乘轮船本是很现成的交通工具，又偏偏这几天大雾弥漫轮船脱班，不得已过轮渡到中沙，搭上在那里争相兜生意的“农村小面包”——小三卡颠颠撞撞，直奔里山。只是“文革”赐予我的腰椎病确实有些受不了。同行中八十有三高龄的朱岫云先生，以及心脏不太好的县政协周女士，更是难以支撑。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既是一次难得的欢聚，我们也就自我安慰，自找乐趣：三卡透风，形同凉棚，灰尘吃饱，在所难免。但比比沿途在汤山所见，那些轧石厂做工的泥人儿，我们倒是“蛮惬意”的幸运者了。从里山叶家片去渔山村，车已超载，另加了小凳子，可途中仍有人硬拦搭车。司机掉头示意车厢，一

位白发老翁还是抢爬到只能容司机一人的驾驶室，一脚跨进车门里，一手紧紧抓牢车檐篷，整个身子都倾斜在车外。车子还是照开。

“比铁道游击队还惊险！”我们惊叹。

它终究让我们以车代步到了渔山平安岭脚。虽然几度提心吊胆，但是正规洋面包是绝对到不了此地的。

二

发起者朱新观先生令我们十分感动和震惊。午餐之丰盛自不必说了，连渔、里山两乡的父母官——蒋乡长和占乡长也被他搬来了。更出于我们意外的是，且他的家也未免洪水之患，塌屋尚在修复中，但预先的布置和陈列却已使我们大开眼界：灵峰先生的遗像、墨宝，以及与朝鲜、越南、日本等外籍学生的照片和文史资料；还有夏灵峰的得意门生朱天存先生（新观之父）的遗著《朱天存诗选二百首》、《小林草堂日记》等，挂了满满的一墙，摊了满满一桌，连桌子上的玻璃板下，也陈列些弥足珍贵的上品。

这些劫后余烬中的余烬，得来多不容易！

映入眼帘的还有抗日期间，朱天存先生在福建供职时的日记，内中提到与郁达夫的交往，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的。

于是，大家顾不上旅途劳累先饱眼福。其中最吸引我的是两则文字。

一九三八年，朱天存的日记载：“十八日，……下午至世界书局闻清代七百名人传，我邑凡三人董文恪、文恭父子及先师夏灵峰先生是也。”“二十三日与贞立至平安岭谒师墓，得诗一首，云：不见吾师已八年，重来墓上草芊芊。当时期许多深意，

此日行藏愧昔贤。道貌难瞻今邹孟，伤心最是旧渊骞。感恩知己胸常热，愿将遗书到处宣。”

于是，我悟到了，新观先生长期热心宣扬夏先生的道德文章而不疲，原来已是早有渊源——继承父亲遗训和遗愿。

三

洗耳恭听，我对夏灵峰先生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由于清皇室排斥汉人（西太后弄权更甚），加上朝廷内互相倾轧，敢于直谏，一再上书谴责卖国投降派的夏灵峰，难免失宠下野。他回到富阳老家山，在大盘山建起灵峰精舍，尊孔读经，开科讲学，膝下弟子数百。日本的、朝鲜的、越南的都有。名符其实来自五湖四海。在众多的国内外学生中，朱天存是佼佼者，又因同乡邻里，更为灵峰先生所得意赏识。

朱天存报师恩之诚，可称楷模。抗战期间，出任福建省参议等要职时，师生情、故乡情、爱国心，其日记中处处可见。他对灵峰先生何止是“愿将遗书到处宣”。据朱新观言，夏灵峰谢世后，他的儿子到山上守墓三年，以尽孝道，这在当时不足为奇。然而作为学子也去守孝三年，可想见其师生情笃了。

席间，我有意问及主人，你新观先生已属晚辈了，为何也对灵峰先生如此至诚？

“我除了继承先父之愿，亦十分钦佩灵峰先生的骨气。”

人言铮铮，令人默然。席间，肚子里装满学问、熟谙乡邦文史的朱岫云先生，趁机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夏灵峰先生上京考进士的文章中，有两句话特别为考试官赏识。即是：“同盟吴越孤臣恨，并帝周秦义士惊。”先是房考见到，专将此文抽出推荐给主考官说，此人将来不得了。主考

宝廷，是清廷宗室文学水平最上乘者，见到如此佳句，连连赞曰：嗟呼，伯定（指夏灵峰，又名夏震武），一身都是骨，昆仑压顶强不折；一身都是血，洒遍四海水皆热。

四

记得，我第一次去瞻仰夏灵峰墓是在五十年代初，当时我曾被派往里山乡工作，常听赵锡全、朱绪荣等乡干部谈及灵峰先生，说他在灵峰精舍办学时，连外国人也来读书；又说他学问如何如何高深，行为又怎样与众不同。他用八字步走路，突逢阵头雨倾盆，仍然步伐不快不乱；即使眼看踏着牛粪堆，脚步仍然徐徐有致。还讲他从前在朝里做大官，连皇亲国戚也不买账。赵乡长曾陪我去过一趟灵峰精舍，在空荡荡房子里的残什物中，我得到过一套清光绪年间的《富阳县志》，夏灵峰先生著的《仁道大义录》，还有一张古装束发与学生合影的照片。可惜在那特殊年代都被劫去了。

大张旗鼓宣传总路线那年，有次县区乡干部在渔山乡开大会。我偷偷溜出会场，约了渔山乡乡长俞志显去了平安岭。在当时区乡干部中，数俞乡长墨水喝得最多，且略知灵峰先生非同一般人士，又熟知他的坟葬地。

那次给我的印象，坟头是个大土丘，但坟前竖有高出丈余的大墓碑，较之一般坟墓，自然如鹤立鸡群。然而，我们找到它也不容易——四周长满柴草树木，荆棘刺丛扑面而来。

五

第二次去瞻仰夏灵峰墓，是在一九八五年我到文联工作

以后，夏日炎炎，我们搞了次散文作者沿富春江采风。事后我写过一篇游记，发表在《富春江》创刊号上，题目叫做《话说春江旧钓徒》，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渔山到了，于是舍舟登陆，步行三华里许，到了叫做平安岭的山坡上去考察夏灵峰墓地。墓完好无损。墓碑上‘夏灵峰先生之墓’几个篆字，漆黑油亮，映衬在青灰色的大理石上，烈日下显得特别醒目，估计是不久前才加工修葺过的。”

当时，对于这个人物，我们在返回途中展开过许多争论。在清朝政府软弱无能、丧权辱国、乞和订约的不抵抗政策之下，他竟不畏权贵，直言敢谏，与投降派王公大臣李鸿章、王文韶之流分庭抗礼；当八国联军侵入，慈禧、光绪避走西安，他老先生又奉召晋见，面呈中兴十六策，其中如开言路、求人才、明刑赏、选将帅、严军政、清吏治、收人心、崇节俭、兴农业、治漕运等，竟连慈禧也被感动而流泪。然而，他以亡清遗老自命，一直来束发古装，反对共和，直至聘任两浙师范学校监督时，与鲁迅、许寿裳等的反封建礼教、罢课公然唱对台戏，给后人留下了污点。但在军阀横行时，浙江都督和北洋政府几次聘他做官，都被他拒绝。从这一点上讲，他又可称一位寻找桃源乐土的钓徒了。所以，我在那篇文章中便引用了故乡先贤郁达夫给他的一个中肯评价：“五十年来，像他那样顽固自尊的亡清遗老，也的确是没有第二个人。比较起那官迷财迷的南满尚书和洋奴宦婢来，他的经术言行，姑且不必论它，就是以骨头来称称，我想也要比罗三郎、郑太郎辈，重到好几百倍。”

六

我在上文引用过郁达夫的《钓台的春昼》这篇名著中评价

灵峰先生的话，一直记在心间。所以这次在朱新观家里，见到他的先父朱天存记录他与郁达夫交往的手迹，就特别感兴趣。没有经得主人同意，便从中抄录了他一九三八年日记中的几节。

十一日报载：富阳积雪，敌据城顽抗，守富阳，所以屏蔽杭州也，达夫接家信，云其太夫人殉难，迄今尚未收殓，亦可哀矣！

初七日六时，至省府升旗，午刻值日交班，与寄刘总司令、罗茹云函二件。由达夫带走。因渠将回富阳葬亲，恐浙赣路一带驻军或有阻滞交通事情，特为介绍，请总部予以证明函件，俾得畅行无阻也。

初八日，上午与项参谋等送达夫于洪山桥下。

初九日，访郁达夫于杨桥路，渠邀于同往文艺戏院观戏，适演朱翁子休妻一齣。……达夫并述在武汉政治部约略情形及家庭变故，出示近作《泊洪山桥》一首云：（略），又一首《无趣》云：（略），其家室变故，有难言之情，为慨叹久之！

这两首诗作，现收入《郁达夫诗词抄》的《毁家诗纪》中。

初十日，下午八点后邀达夫与蒋秘书鉴平、黄参谋达平，至可然亭夜餐，饮酒至酣，席间杂谈社会变故，多有不可以常理测者。

十二日，上午八点后，与达夫至于山日者处推算八字，达夫甚信之，但渠论与我春间所言不符……”

我还抄录了一首朱天存先生《送达夫归富阳省亲》诗一首：

当代知名士，萍踪聚海隈。
田园余劫火，典籍付秦灰。
家国同仇急，云雷壮志催。
富春何日到，为我一迟徊。

我以为这是些极好的乡邦文史资料，也为我邑深入研究郁达夫，提供了极好的佐证。

我还想，当年朱天存为富阳春江第一楼题的对句，也不妨把它做到今日之春江第一楼上：

与二三子同来登第一楼而观千里送征帆红树秋江都画景，
距东西台不远离天子岗匪遥名山留片席英雄高士是乡亲。

七

虽然距第二次我到此瞻仰，仅仅相隔五年，可这回展现在我面前的夏灵峰之墓却是另一番光景：墓增大了，文物馆李馆长用钢皮尺量量，高有二米八十，坟围约三十多米；又由于整座坟改以“鸟装泥”浇成，平滑、光洁，恰似一个放大的地球仪！坟龙手糊上了一层水泥，四周新栽了柏树，还在坟前新竖起了一块大理石碑，上刻“富阳县文物保护单位”，中书“夏灵

峰先生之墓”，下端落款是“富阳县人民政府立”。这碑文该竖在坟龙手左侧，却误将它嵌到了紧靠坟头前，幸亏为同去的文物馆李馆长和史同志发现。渔山乡的蒋乡长当场表示要改过来。

我问这坟是哪年重修的，朱新观说了经过：那是一九八六年，灵峰先生的部分后裔返回故里，由我提议重修此墓，他们出资八百，我捐二百合成一千元。我惊奇，仅耗资千余，怎能修成如此规模？新观先生接着说：确实很费功夫，我每天清晨步行十余里到此，不到黄昏回不到家里。这又令我想到了，有口皆碑的夏先生，有至诚热心的朱先生，方能成就在眼前的这等规模。朱先生的一席话，不禁又使我感慨许多：夏先生的风骨精神，本身实是一种无声的动员，如果单由国家来出钱兴建这墓地，恐怕不花个三五千元是肯定不成的。

“为什么这坟朝向是西？”岫云先生提出了一般人疏忽的疑点。我接口冒昧直言，这叫“因地制宜”，坟处山坡上的一块大盆地，左右靠背全是山，前面一块开阔地，向西望去山峦重叠，“好风水也”！

坟的左前百米处，建有原先作为守墓住舍兼作书房的旧址上，如今种上了一片黄桃树，承包经营者无意，却象征着灵峰先生的精神更替，桃李满天下矣！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金壬父先生传略*

胸怀大志 人同盟会

金壬父,又名守淦,别号六弢居士,本县王洲乡唐华村人。一八七八年生于耕读之家。祖父名之炎,补博士弟子员,毕生致力于乡间启蒙教育。父日恒,从农。壬父弟兄有三,大哥鹤庄,卒业浙江法政学堂,其文华实并茂,是我县清末民初的著名人士。老二守权,随父从农。父子俩常年耕作四五亩沙地,令一家温饱无虞。

壬父初就读于祖父私塾,旋就读于东图书院。因家庭拮据,曾辍学,就业场口。

有远大抱负的壬父志在上进。从业时,节衣缩食,积蓄银钱,考进求是书院(今浙大前身),结识了后来成为我国著名人士的邵力子、邵裴之、钱家治、蒋百里、马寅初等。不久,他又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由邵力子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供职。因他既精通经史,又擅长英文,尽职之余,翻译英文书刊,又常为青年补习英文会话,批改作业,颇具声望。他是我邑最早精通英文的学者。

当时,上海已被列为五口通商的最大口岸,沦为典型的半

* 本文与徐庚发合作。

封建半殖民地城市。金壬父目睹列强的暴行，清廷的腐败，百姓的倒悬，遂萌发革命大志。经邵力子、蒋百里介绍，他参加了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聆听过孙先生的教诲。后应江苏教育家袁希涛的邀请，去他创办的宝山公学担任教学工作，其时又结识了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当时，同盟会会员在上海开展秘密活动，金壬父常往来于上海、宝山之间，与蔡元培、于右任、蒋百里等革命党人士一起，在上海创办《启明日报》，宣传、组织进步青年，投身辛亥革命。同时，他还担任长江一带的筹募军饷专员。武昌起义时，金壬父为南京派往武汉联络蔡元培的代表之一。民国成立后，他任浙江省都督府秘书。二次革命失败，他回富阳故乡，出任县立高等小学校长三年有半。民国五年七月，经当时任教育部次长的袁希涛引荐，于民国七年到国立京师图书馆工作。不久，擢升为代理馆长，直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才退休返回故里。金壬父在北京图书馆任职期间，交游甚广，与名人学者、著名民主人士和革命家，如毛润之（毛泽东）、李大钊、鲁迅、邓小平、聂荣臻、马叙伦等均有过交往。与在京司法界供职的郁曼陀、洪文澜等，更是过往密切。解放以后，金壬父为富阳县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同时，任浙江文史馆馆员。壬父于一九六一年春谢世，享年八十五岁。

淡泊名利 一身正气

壬父淡泊名利，一身正气。自清末、民国到共产党领导建立新政权，他结识各界社会名流，乃至名扬中外的领袖人物、著名学者，而且自己学识渊博，才能卓越，但从从不依附权势，借助升迁，始终以学者或普通老百姓自居。抗日战争爆发，乃至

北京沦陷，壬父独舒肝胆，仍留馆典守公物，主持馆务；不为敌方威胁利诱，屹然独立国城书池，使祖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得以保全。一九四七年，眼看全国胜利在望，他却深感自己年事已高，难能出以大任，趁其二嫂与堂弟守庚先生进言劝说，便主动告退返回桑梓。其时，富阳国民党上层人士李宝濂等，为他祝寿；并数度劝他竞选国大代表，想把他重新推上政治舞台。他看穿这是利用他的声望结党营私，推说：“我在外面做事乃是无名小卒”而毅然拒绝。但他对父老乡亲则十分尊重，平易近人。即使赤脚、穿草鞋的农民，他都热情交谈或接待；凡有求于他的，他都竭力帮忙。地方有不平事，他总是出面干预，甚至向上直言，书陈己见。

热心桑梓公益事业

壬父热心桑梓公益事业，为兴办家乡教育，兴修水利而呕心沥血。名闻乡里，有口皆碑。民国二年至五年，他出任富阳县校校长时，亲自执笔撰写县校创办概略、县校校址沿革录；亲自筹措校产与办学经费；为长远计，他争取地方当局立法，以土特产“酌量抽捐”；他还以自己的薪俸入股投资上海商务印书馆，以所得红利四百银元购买《四部备要》一部，一九四七年返回故里时，将这套一万多卷的典籍赠给富阳县中（时校长张堃先生）。回乡后，他在家中开设两个民校班，义务为本地无力入学的贫苦子弟授课。

壬父老家王洲乡，位于富春江江心，历来备尝洪涝之苦。为了防洪护岸，使土壤免遭流失，他以年迈之躯，亲自踏勘，上下奔波，在上沙营造护岸林，并约法三章，落实专人看管。他在出席人代会期间，积极向政府陈词，写提案，晓以防洪护岸之

重要，得到了政府支持，在王洲乡上沙嘴新砌了石叠磐头三个，使家乡人民免遭塌江之危。

壬父一生克勤克俭。他生育两男两女。他长期在外供职，却从不带着属。在京师图书馆时，以馆为家，馆内一切爱之如己物。平时生活简朴，衣食住行如同普通百姓；但每遇求济者，则慷慨解囊，从不吝惜。因此，积蓄甚微，无意也无力置办田产，唯爱书如命，购置无数典籍。一九四七年告老返里，行囊中别无贵重物件，而典籍、书画整整装满一船。可惜这些书籍在“文革”中被洗劫殆尽。壬父热爱故土，曾撰写《王洲乡志》、《应征文选》（现存浙江文史馆）。

一九九一年三月

〔附记〕

笔者出于对乡贤的仰慕之情，早想为壬父写传。时值修县志、编文史，机会难得，遂挤时间动笔，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笔者之一徐庚发是王洲人，与金壬父同乡，平日耳濡目染，深知壬父的为人；自己后期从事档案工作，又见到有关壬父的史料记载。笔者之一蒋增福，五十年代供职县文教科，时科长陈荣安（无党派民主人士）与金老交谊甚深。陈荣安住在文教科办公室兼卧室的套房，正好是笔者办公室的隔壁，有着较多的亲见亲闻和接触。每逢县里开人代会、常务会，这两位老先生总是不吃会议餐，不住招待所，一起吃住在那间临后河的卧室里。冬天一床两被，床前放只火盆，取暖和烫酒两用，边吃边聊。买老酒、食堂端饭菜这类琐事，总是陈先生亲自操办。当时，“爬格子”开夜车是寻常事，记得有天半夜了，陈先生拿着

一只搪瓷杯来到笔者办公室，求助笔者去买斤老酒。买来酒时，见金老在伏案写第二天县人大常委会上的发言稿。他须发皆白，长得不太高却相当魁梧，穿着黑色大棉袄，棉裤裆宽大，裤脚下端系条带子，看来倒很利索。当时，笔者不知其身份，但直观认定他是有学问的人。

“文革”后，笔者为采访《富阳风貌》稿件，曾在壬父堂弟守庚等陪同下，去过一次壬父家里，主人已经作古多年，人去楼空。壬父的儿子六征引我们到楼上，几经查抄洗劫的痕迹仍历历在目，笔者在残存的废纸堆里，见到两部比较有价值的书籍：清光绪《富阳县志》和蒋中正题写书名的《东南揽胜》。笔者征得守庚及他侄儿同意，将这两本书带回机关（后《县志》由县广播站出钱买下，《东南揽胜》则被要了回去）。临行前，笔者还在房门背后的废纸堆里，意外发现了三份用元书纸书写的壬父手迹《春江书院创办概略》、《校址沿革》，以及一张当年主人在京师图书馆工作时由郁曼陀介绍、壬父作保，为陈秉略进馆抄写书稿的保证书。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蒙金守庚先生提供许多资料，借此说明并深表谢意。

周大易先生传略*

周大易,原名宝仁,字知爱,步入仕途更名大易,曾以易庐、病夫等笔名著述和发表诗文。一九〇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富阳镇宜家弄周家,是我县清代著名先贤周凯第五代后裔。

周大易,有过风流,但更多艰辛。他古文造诣颇深,善旧体诗词,书法亦闻名乡里。他的医德医术,众口皆碑,至今在临安、新登一带仍传为美谈。他大半辈子以病残之躯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堪称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

周大易父周古山,才智过人,医术超群。大易从小受父熏陶,天资聪颖。六岁进私塾,十五岁因家境清寒辍学,到杭州拱宸桥玻璃厂当学徒。十六岁后随父学医,业成即去上海联义善施会诊所当中医内科医生;后去北京宣武门外针灸专科医院,一边深造一边实践。因他在当玻璃厂学徒时扛煤折伤左足,加上长期劳作,酿成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经常发作,疼痛难当,他将学得针灸之术自行治疗。后又辗转从北平到天津谋事。时年轻,怀有远大志向,经常针对时局为报刊撰写文章,才气横溢,评论精辟,为当时天津任警备司令的傅作义将军所青睐。不久傅将军委任他为秘书主任兼河北省矿政监督公署秘

* 本文与周玉安合作。

书长，并代行监督职务。他还在傅将军支持下，办起一个新闻通讯社，介绍国内外形势，倾向性地宣传孙中山的国民革命道理。他忙于公务，又撰写文章，作词赋诗，几乎天天夜以继日，致使双脚病情日益加重。傅将军十分关注，特地请来外国医生为他诊治。不料，一位德国医生用一根很长的针刺伤了他的坐骨神经。从此，他的下肢不能行走，直至半身瘫痪。

正当周大易欲大展宏图之际，竟突然遭此厄运。当然，他仍可领取一份优厚的薪俸，过清闲生活；但他不愿无功受禄，执意告别戎马生涯，忍痛割爱可望婚娶的女友，只身从北平返回富阳故里。

抗日战争爆发，他避难到新登南津乡苦竹里，抱病担任乡村小学教师，后又被抬着到龙羊山区和桐庐七里泑等地教书。最后，定居在新登镇，收养义女两名，又纳外地逃荒手工业者何忠英女士，四人长为伴，相依为命。其时，他谋得新登县政府公务员一职，薄有月薪；公暇为人看病，编修宗谱，书写讼书，合家节俭，可勉强度日。他虽然瘫痪在床，仍担任《新登县志》的编纂工作，文稿则由县政府办事人员往来递送。时县政府上至县长，下到一般公务人员，均慕其才，十分敬重。有志青年，纷至沓来，向他讨教国文知识或论诗作文；凡镇上演戏，都将他抬到戏院专座观看。一度名闻新登城乡。

解放后，他专业从医，率先参加新登县卫生工作者协会；并由“卫协”报经浙江省卫生厅发给开业许可证。一九五二年，在义女的再三恳求下，他迁往义女夫家——临安县三口乡，在洪德堂药店当坐堂中医。一九五八年，他在三口卫生所担任门诊中医兼统计工作，月薪仅三十元五角，生活十分清苦。当地有人知道他早年与傅作义将军有交谊，如今傅做了中央水利部长，便劝他给傅去信，请求资助或关照地方政府予以照

顾。然他总摇摇头说：“不该去麻烦他了，况且我是早年离开傅将军的，对北平的和平解放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周大易是十分崇敬傅作义的，说他是智勇双全，明大义、识大体的将领。当他从报纸上看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时，欣喜若狂，连声称赞这是傅将军的仁义之举，于国于民，功德无量。他虽然没有给傅将军去过信，但非常希望病体好转，能亲自再去北京拜望傅将军。遗憾的是他未能实现这一愿望。

他在临安三口从医的岁月里，把救死扶伤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看病态度和气，百问不厌；对一些家庭困难的病人，不但免收诊疗费，有时竟代付药钱。他待徒弟至诚，身传言教。常教诲徒弟：“多治好一个病人，就是做医生的最大幸福。”因此，他的学徒成名者颇多，如今三口医院的钱炳南医生就是其中之一。周大易刻苦钻研医术，擅长儿科、妇科；对高血压、心脏病以及部分癌症也颇有研究，治愈者不计其数。一九六三年初春，临安县上甘黄岭有个叫阿江的病人，头部烧伤留下后遗症，影响发育，十六岁的人像个七八岁的小孩子。他父母四处求医无效，后经周大易精心治疗，逐渐康复，并结婚生儿育女。

“文革”开始，周大易因早年与傅作义有过一段经历，自然难逃厄运。数次抄家，多次批斗，一再强迫“检查交待”。有一次，造反派竟将他瘫痪之躯抬到批斗台上一掷，致他肾脏受伤。旧病新伤，雪上加霜，不到半月就离开人世，终年六十七岁。周大易临死前，将一直珍藏的《周氏家谱》、周凯著的《内自讼斋诗钞》八卷，以及周凯手迹、周凯与同僚们的书信若干，交给了他的侄儿周炎生。这些珍贵的史料，一九九〇年秋，由周炎生兄弟三人捐献给了富阳县志办。

粉碎“四人帮”后，他的冤案获得平反昭雪。一九八九年，由他的第二个义女和侄儿周炎生等将埋在临安三口的周大易

骨骸，移到富阳城北小隐山归葬。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骆韞韬与他的《回忆实录》

骆韞韬先生，是国民党时期富阳籍军人当中受将军衔最多的一位，四次受少将。当时有些中将衔的将领还对他有所忌畏，因为他曾是国防部委员，又是蒋介石对红军发动围剿的高参之一。他曾向我嬉言：“我还是个抽壮丁的头子！”只是他秉性直亢，敢于谏言，故只能在少将圈里循环而原地踏步。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九日，战犯管理所里的最后一批人员（二百九十三名）全部特赦，他才得以获释返归故里。作为富阳特定时期的历史人物，有必要约略记之；有道是“以史为鉴”，他留下的《回忆实录》也似有作交待之必要。

他原名骆寿松，字韵涛，大源镇新关村人（出生地骆家庄自然村，该村于一九五六年山洪爆发时冲毁）。少时家境清贫，但聪慧好学，跳级读完高小进简师；十九岁缀学去灵桥当小学教师两年，薪俸微薄但略有积蓄，便赴杭州读英专；一年后又奔广州投考外语军官学校，因成绩优秀，毕业后即以上尉军衔去当营长。他以科班和行伍双重身份，不断获得晋升，并被选拔进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即与林彪同期。

他于一九七五年初夏返回梓乡富阳时，我正供职于“文革”后的县革委政工组宣办，并受李作运同志委托，与陈仁文同志一道兼管过统战方面的工作，因而有了与骆先生的接触与交往，直到一九八六年八十七岁终老作古我为他送葬为止。

他在富阳的十多年间，于我于他，工作单位各有过变动，但一直保持着往来，尤其是他所写的《回忆实录》（也称《我的回忆》），因为是经过我的允诺并与他所在单位打了招呼后得以如愿，故他每写成一章都复写一份送我。所以，我对他的人生经历，回富后的工作与生活，都比较知情。

一九七五年六七月间的某一天，我在县委大院内的红楼上班，他来宣办报到时，站在我的办公室门口，说了声：“报告！”仍是站着不进门。因前一天由陈仁文同志去杭州屏风山接来，就他回富后的工作安排也曾参予多次研究，所以事先我就知道了的。于是我请他进室喝茶。他着一套特赦时发给的清灰色中山装（帽子拿在手里），中等偏高个子。年已古稀，鬓发灰白，但乡音未改。从谈吐中给我的印象：精神矍铄，思维清晰。

也许因为我们同是大源山里的老乡，第一次见面就谈得较多。他谈的大意是，已与儿子媳妇接上关系，略知家乡变化新貌；其中最令他感慨不已的是，当地不少伪乡保长、地主豪绅、下级军官在解放初就被镇压了；可自己罪恶深重却蒙政府教育改造，特赦后仍安排工作领工薪，对共产党毛主席感恩不尽。他还讲了曾去北京蒙中央领导接见，自京城至杭州，一路参观，昨到富阳稍为看看，足见家乡变化之大，遍地升平景象。

我根据县委的研究决定，向他宣布去卫生局工作，并言明，这是考虑到他在战犯管理所长期从事中草药的种植培育，对祖国的传统医药有所研究。他则说不敢不敢，但坚决服从政府命令，毫无其他任何想法。我又对他说，只需先去报到，不必急于上班，自明天起先回老家走走看看，会会亲朋好友。当他再次称颂共产党伟大，富阳变化巨大时，我则向他提及：共产党确实伟大，富阳变化也确实大，但不是一切尽善尽美，你将

接触社会和家人，看到听到一些不良现象可以向我们来说，但希望不要影响和动摇已取得的改造成果。虽然我讲的是些套话，但他对我所言的“不是一切尽善尽美”，会遇上“不良现象”的话震动较大，且已烙痕于心上。在以后的若干年间，他多次跟人谈及，也当面向我述说过此点。

骆韞韬到卫生局工作不长，也许是一年左右吧，因太空闲、不忍白拿工薪好几次找我们，要求调个有具体事情可做的位置。在向县领导汇报后，便将他调到了县图书馆工作。在以后的很长时期内，他认为这才是遂了他的心愿。工作也干得很认真。只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毛病的增多，慢慢地感到力不从心。记不清具体的年月日了，有一天他又来找我，说想把自己的经历，特别是国民党后期之腐败的亲见所闻，以及改造所得系统地写出回忆录。这是我们所倡导的“三亲”史料，也与我原本就有的想法一致，不但表示同意还鼓励他一番。记得那次他是很高兴离去的。好在我以后调广播局工作，又后来县里文化一摊从文教局分出并入广播局（改为文化广播电视局），图书馆属我直接管辖范围，就跟彭志远馆长招呼：今后骆韞韬上任他自由，只领工资，让他写回忆录就是。

尽管自那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他没有要上班的思想负担，专心致志写回忆录，日子过得轻松、顺利，但自然法则不可抗拒，慢慢地因年岁增大失去往常活力，行动开始迟钝，脑子也不好使了，特别是经过几次生病住院，我发现他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离开拐杖竟不能外出。再是，虽说他刚来时发月薪五十元，享受公费医疗，待遇已较一般国家工作人员还要略高一些（记得当时宣办的同志还说过笑话，干了二三十年革命还不如在战犯管理所管教二三十年。因为当时宣办的陈仁文，还有其他好几位同志，月薪不过四十七元）。但后来物价上扬，他的

工资仍是每月五十元，已是相当拮据了。加之他的儿女们也不宽裕，不可能接济照顾他，疾病和衰老的侵扰，更显孤寂。有一次，出院后不能自理，只好雇请一老保姆照料。这期间，他住在鹤山脚下一个小套间的公房里，闻说还曾发生过些不愉快的轶事。总之，他最后的岁月，不能说是尽如人意。记得遗体告别那天，去者不多，殡仪馆里显得有些稀稀拉拉，而我则成了送葬队伍中的“最高行政长官”。

骆韞韬去世十年了。他在富阳度过的最后十多年间，还是做过些有益事情的。例如为图书馆的书籍资料的整理和写卡片，为不少有志的青少年学英语作辅导，以及向在台人员宣传富阳新貌，呼吁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等。而他写的十几万字回忆录，也是颇具史料价值的。因为这里涉及到国民党上层的政治、经济、军事，也写了共产党对战犯改造政策的了不起。

惜乎，他送给我的一份份回忆录复写稿，有的遵嘱转到省文史馆，有的转交了我的继任者，也不知道富阳有关单位包括档案馆等，或者是他的至亲好友是否还有保存？在我行将退休整理旧籍时，发现了他尚存的些许手稿，现择要补述：

一九七七年底，他送我一份《我的回顾与展望》，括号里则注明：“一九七八新年感想”。落款日子是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这是一篇广播稿。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

一九七七年伟大的一年已经过去了，一九七八年更伟大的一年又即来到了。一九七七年是一个大揭大批“四人帮”之年，又是一个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之年，战果辉煌，景物全新，喜看祖国“雨过天晴云散尽，驱除四害启朝晖”。余以衰迈之年，躬逢盛世，确是人生难得之遇。

回顾自己一九七五年三月蒙恩特赦，屈指已历三个年头，在这短暂的岁月中，遇到三件出我意外的事情……

这篇两千多字的文稿，从它的结束语看，落脚点是放在向对台人员作统战宣传的：

海外的同胞们，台湾的同仁们，莫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归来的期望，应当不要徘徊，毅然投向祖国怀抱。政府的“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始终不变，当机立断，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而贡献力量。

数天后的一九七八年一月三日，记不清是他自己还是让他的儿子承湘，又送来一份题名为《喜看富阳新面貌》的复写稿。全文一千五百多字，我一看内容，便觉得这是一份“告台湾同事书”，因为文章一开头即是“留在台湾的乡亲们！驻在台湾的同学同事们！”也是讲他在富阳三年中的亲身所见巨大变化，里面也讲到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他结尾中所写的内容，则与前文所引基本相同。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五日，他的回忆录脱稿之时，便致信于我，还附有全部共六章的目录。

一九九五年五月

敬悼岫云师

我虽未直接受过岫云师的课堂教学，但自认识他后，一直叫他朱老师。这不仅仅因为他是长者，当过中学教师。在我看来，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他的的确确是一位应当受到尊敬的老师。

建国后，岫云师在场中、富中执教时，我虽知其名也见过其人，却不曾有过深谈，更谈不上深交，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老是成为“运动”中的人。说起来我参加工作后的最初十年，是在文教科(局)工作。

十年前，我在政协任秘书长时，因兼管文史资料方面的工作，便把他请到与我同一个办公室，相对办公，朝夕相处。这一年有余的同事关系中，他何止是我在乡邦文史方面的老师。坎坷且丰富的政治生涯，熟谙渊博的历史知识，尤其是他对古典诗词的深厚造诣，令我敬而佩之。后来我调往文联工作，他依然是我的老师。记得富阳颁发文艺奖，“园丁奖”中的大名，就是经我提议后为大家公认的。我也曾偶尔胡弄几句古典诗，但都是在他的修辞润色、校正平仄后才敢拿出去“见公婆”的。

虽然他的死是预料中的事，因为他终究已是九十高龄的人了。但我总觉得离去太快。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接到政协办小赵电话转报噩耗，我为之愕然！真有点不敢相信。因为在两个月前我去灵桥探访，病中的他仍具强烈的求生欲望，乃至

实现我们间“践约”充满信心。何况，他经常与我谈及的，撰写回忆，诗稿结集，都还不曾如愿。

我自感岫云师与我有些相似的地方，包括走路也较常人快半拍，今年初夏，他还到我住的六层楼上跑上跑下过两次；他快言快语，健谈好问，对世事国事家事，常常剖腹陈述己见，且还不时说些幽默风趣的话；他的五脏六腑似乎都是好好的，近年有些重听且思维清晰，精神矍铄，连饮酒、吃饭仍是快节奏。耄耋老者，有时却像小孩子。惜乎，上报之浙江省“健康老人”还不曾批下，他却匆匆去了。

朱老师生前跟我谈得最多的，是有关他个人“历史事实中的蒙冤之处，仍未获澄清”。我不但同情，还曾为他的事向有关领导屡屡提及，并转呈过他的报告和要求。但我更多的是劝慰他：“首先相信自己，健康长寿最最要紧。”至今我仍觉得我的话没有错。在富阳编印出版的党史和组织史上，不是明载着么：他是富阳县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书记，又是富阳县最早一任县委书记；有好些老同志为之作证，他还是富阳解放前夕解放部队的地下联络员，又帮助军管委打开过工作局面。也因此他成为富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和常务委员，临安专署委任当人民法庭陪审员。尽管两次被捕，也曾有过失，但正如他自己评说的“功大于过”。

为有尘瑕须拂拭，
敞开心肺给人看。

岫云师赠送过我的仿谢觉老的这两句话，我知道这是他自己的心志和人生写照。

尊敬的岫云师，你在病中和谢世之后，市里的政协主席、

组织部长以及好多部门的领导，不论是住院或你回到灵桥老家，都去看望过你。

你可以安息了！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郁风回乡记

金秋时节，在迟桂花还飘着余香的日子里，富阳市迎来了两位不寻常的客人——郁风和黄苗子伉俪。郁风一向喜欢桂花，每次回故乡多半要选在桂花盛开的秋天。她对迟桂花特别钟情，也许与她的三叔郁达夫以杭州翁家山为背景写的《迟桂花》名篇有关。十月十五日，夫妇俩到浙江办书画展悄然独行，由北京直飞杭州，住进中国美院留学生楼的外宾招待所。院子里和门前两旁盛开的桂花香气扑鼻，她非常庆幸能赶上好季节，又能住进西湖畔的好所在。然而，当富阳市新老两位文联主席去看她时，仍相邀同去满觉陇喝杯龙井桂花茶过够瘾。

郁风对富春山水的情，对故乡人民的爱，几乎热烈到有些痴情。即使前几年侨居澳洲时所作的画，也有好多是故乡的白墙黑瓦的民居，以及小草、小花、向日葵、芦苇等。这次书画展上展出的《梦江南》与《白屋人家》是为一例。在开幕式上说到“重回”一词时，竟情不自禁地哽咽了好一阵子。她说，身居海外的游子，更能体会对故乡的怀念之情。

—

这次是他们侨居海外六年后的第一次回国。十月二十日，赶在书画展开幕前的空当，夫妇俩来到富阳，陪同前来的还有

她的二妹、《中国日报》高级记者郁隽民，她的弟弟兴治及弟媳高中怜。

车抵富阳，郁风即提出，不要急于到宾馆下榻，还是先去郁达夫故居。这是她父亲郁华、二叔养吾，三叔达夫出生的血地，也是她从孩提时起就进出和吃住过的地方。她曾为这故居作过写生画——后来成为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达夫系列作品封面；这里陈列了她所熟悉的许多珍贵纪念物，其中也包括她的画作。而对多年前日本著名汉学家和书画家的题画诗，这次才让多才多艺的富阳人女婿解了疑难。庭院内，达夫幼时掉进去过的大金鱼缸，作为历史的见证，依旧在贴老围墙半埋着，郁风再次去缸沿上坐一坐，留个影。想必会唤起她许多往事的回忆吧！

当然，在这里就餐家乡饭，早令她垂涎三尺。因为她深知陆费澄的烹调绝活。这位达夫的长媳天民嫂，也早就为他们准备了，家乡鲜嫩的蔬菜之外，还有郁风最爱吃的臭豆腐干，荷叶粉蒸肉，以及用豆腐皮制作的郁家传统菜肴。郁风有滋有味的吃着，又不时地向她的先生苗子炫耀：其他地方吃得着吗？苗子只能说，几乎吃遍全世界，数这里最好，连我们有名的“吃在广东”也比不上。“老顽童”间或说些幽默故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二

十月二十一日，郁风到富阳的第二天，便提出先要到富阳乡下去转转，看看农村新貌，顺便走访老乡亲。

环山，这里是她从前常去的地方。幼时下嫁当童养媳的姑奶的女儿家，郁风曾在这里与她朝夕相伴过。尤其是在最困难

的年月里，来这普通农家待过，同吃同住也作画。如今这位双目已经失明的老表姐，硬是紧紧地拉住她和苗子的手，即使不能留住吃中饭，多待一会儿也是好的，她有多少心里话要向郁风这位分别已久的老表妹倾吐呵！此情此景，不但郁风动情，在场的隽民、兴治他们也热泪盈眶。

在龙门，郁风和苗子对这批明清古建筑群发生了浓厚兴趣，细细的看，不时地问。随向导指引绕弄穿户时，苗子边走边说，又要“地道战”了。郁风则特意选定一个大院的农家门口，在悬挂着农具和农作物的背景下拍照留影。

在龙门山下一户单家独院的农家——孙中林、孙杭晖家里，午餐让他们能吃到蕃茄粉调豆腐羹和龙门特产油面筋等家乡菜，感到特别开心。饭后，院子里的道地上照着暖暖的秋阳，她们小坐戏笑，逗狗玩猫，还一齐唱起了年轻时就熟悉的歌曲：向着太阳，向着光明……

三

家乡文教事业的发展变化，为她们所特别的关心。早在八年前富阳建立文联时，她们就热情祝贺；家乡创办《富春江》文学刊物，苗子为之题写刊名，郁风则为封面设计并作过许多画，还应邀担任顾问，撰写文章，举办讲座。这次回故乡，她们又特意提出，要到富阳二中和郁达夫中学去看看。

前不久，富阳二中要建科技馆，虽然他们侨居海外，在郁风从旁促成下，苗子应允为之题写《劝学篇》。当这回看到装裱的作品，他们很是满意，苗子还建议：送到即将开展的书画展去一并展出。看了学校的环境、设施，他们更是称道。当陈锡闾校长介绍到，在这里任教的老师可以得到一套六七十平方的

住房时，苗子又戏言：可惜我年纪大了，你们不会要我来这里当教师了。兴致一上来，他便不顾下乡一天的疲劳，又为学校题写了《桃李春风》四个大字相赠。此行正逢学校召开运动会，应校领导相邀，郁风还向全校师生发表了富有激情的简短演说。

去郁达夫中学，瞻仰她的三叔——郁达夫全身铜像，既是第一位的任务，更在于寄托她们的怀念哀思之情！当陈祝根校长向他们介绍，学校正在筹建郁达夫烈士事迹陈列室时，他们连声称好。苗子答应为之好好题字。郁风则表示，将她保存的有关达夫著述及研究资料，奉献于学校的陈列室。

四

十月二十二日，根据市里的安排，也是他们所最感兴趣的——参观富春江经济开发区。在市人大以及开发区、市文联领导的陪同下，他们去银湖管理处参观了三处花园别墅群，去富春湾管理处看了正在建设的国际高尔夫球场等。

“真想不到这几年家乡变化这么快！”郁风有感而发。苗子还为开发区写了大幅《前程万里》，下端又详加小款赞评。

顺访黄公望作《富春山居图》的隐居地——庙山坞，对他们尤为吸引。这也许与郁风曾经去过、并一再向苗子夸耀家乡美有关。果然，黄苗子十分看中这块地方。一向“逃避镜头”的他，却抱住一棵大号毛竹，特意要他的小舅子兴治为他单独留影。他还嬉言：我是黄子久后裔，可否让我自费在这里为我的先贤、也为我自己立一块石碑！

他们还去了蒋放年的古籍印刷厂，为这里的自造宣纸、印刷上乘、装帧古朴精美的古籍赞不绝口。厂长送些书籍、拓片，

也毫不客气的收受了。此举实为破例，他们此次回故乡，从不接受除此之外的任何馈赠礼品。当然，苗子为厂里留下了大幅题字。并非白拿。

十月二十三日，他们去了桐庐和建德。晚餐原本由市文联请客改作文联主席史庭荣家宴，能让他们再次吃到家乡饭——其实是他们指定的吃稀粥，外加油沸臭豆腐炸馒头，以及清煮毛豆荚、霉干菜蒸肉。为的是永存记忆。

十月二十四日，富阳市委、市人大、市府和市政协领导，为他们回故乡小住举行座谈和饯行。

郁风、苗子还接受了富阳电视台的采访。

郁风一再表示了作为海外游子，欣喜家乡巨大变化，真乃感慨万千！

五

十月二十六日下午，郁风、黄苗子书画展在中国美院陈列馆举行。

作为著名文艺理论家和书画家的苗子和郁风，尽管如今侨居海外应聘担任澳洲格里菲斯大学的客座教授，但他们在国内仍是北京中央文史馆的馆员。所以，相信他们肯定还会经常回国走走，并将继续为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作出贡献。

虽然苗子已是八十二岁高龄的人了，郁风也已七十有九。我作为有过多年交往，这次是全程陪同者，从这次回故乡的日子里看出，仍视他们为“年轻人”。郁风健步迅捷，思维敏锐；苗子谈笑风生，童心未泯。他一再自称“老顽童”，戏言今年年方才“二八”，当祝他“长命百岁”时，他则说，一百岁？不够哩！

我们遥祝他们健康长寿。

我们祝愿他们艺术之树常青。
我们相信他们,还会再来故乡富阳。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赵和松的故事

这几年，赵和松的故事在省内外连连得奖。全省首届新故事赛讲，可谓强手如林，第三届江浙沪故事大会，更是群英聚会，赵和松的《兔毛扎成的花圈》竟蝉联压魁，两次均获第一名；后来参加全国部分城市第三届故事讲，又获一等奖。不久前，杭州市人民政府为他颁发了“杭州文艺奖”。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故事的前身是他创作的小说《清明未断雪》。

有人说，赵和松是个“两栖作家”，既写小说，又写故事。这话不无道理，他已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小说、故事作品近百篇，约六十万字。他在富春江畔土生土长，当过十年农民，至今仍然每年几次回家帮家属种田，他与农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他的大部分创作都离不开农民这个衣食父母。《清明未断雪》是他领着一批业余作者到一个小山村去采写报告文学时，被一位养兔妇女一波三折的经历触动灵感而写的。小说塑造了农村新媳妇陆素云的形象，在上级号召养长毛兔时，她这位初到这个小山村里的新媳妇，竟然挨家挨户地发动了十二户人家养兔子。正当第一批兔毛可以出售，形势骤变，价格大跌，供销社不予收购，而原先那位发动养兔的领导早已紧跟形势，去发动水田养鱼了。陆素云为了不让自己发动起来的农户吃亏，变卖家产，把十二户人家的兔毛同兔子一起收购。之后，为了把这些白抛的钱挣回来，她拼着命去挑石子、糊纸袋，终于晕倒

在山道上，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可就在她一息尚存的时候，兔毛价格又走出了低谷，涨得惊人，兔子差不多成了金子。这时的陆素云，只要把原先那些兔毛和兔子一出手，就可以弄个万元户当当。面对这从天而降的喜吉，她去拿出了原先收来各家兔毛和兔子的账单，因自己已卧床不起，硬要丈夫一一上门去如数归还人家，让他们去卖好价钱。而她，就在丈夫出门时，默默地离开了人间。人们被感动了，含着热泪，一起用这些兔毛为她扎了个花圈……

《清明未断雪》的小说问世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少读者赞扬作品生动地反映了农民的苦与乐，塑造了一位动人心弦的农村妇女形象，同时针砭了少数干部身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强烈呼唤着他们已失去的“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老作家毛英还专门写了题为《清溢山乡，爱河长流》的评论文章，说是“给吸引住了，竟是一口气读完，又把它讲给老伴听”。恰在这时候，全省首届新故事赛讲即将举行。赵和松就将小说改编成故事《兔毛扎成的花圈》，终于获得成功，据说不少人听后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在故事界，引人发笑的作品很多，催人泪下的就少了。而《兔毛扎成的花圈》正是在这方面走出了极其可贵的一步。

我以为赵和松故事创作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他的小说创作。一般地说，从事小说创作的人，都比较注意立意的开掘，细节的选择，形象的刻画，语言的运用。而把这些技巧运用到故事创作中去，故事阵地就会出现另一个层次的作品。赵和松的故事作品被公认为“能读可讲，雅俗共赏”。不仅情节曲折，故事性强，而且内涵丰富，形象生动，富有哲理，具有较强的文学性。除《兔毛扎成的花圈》外，还有在省内外受到广泛好评的《似梦非梦》、《难唱的恋歌》、《真假歌星》等，都具有这种特色。

《真假歌星》写的是歌星方燕敏的故事。一次，她外出旅游，碰上了有人竟然冒着她的大名在欺骗观众。她想方设法进入了剧院，准备兴师问罪。可当她了解到剧团所以冒名的苦衷后，为了既对观众负责，又能制止这种以假乱真的作法，就自己登台演出。谁知她一曲未完，竟被观众轰下台来，说她是“假歌星”，一定要“真歌星”上台。没办法，剧团只得让那位假歌星上场，结果唱了一曲又一曲，全场喝彩，欢声雷动……故事问世后即被人评为“立题从一个歌星的故事中跳了出来，升华到一个带有普遍意义，具有典型的深刻的社会内涵，大到我们这个时代小到一个具体单位，都可以给人以深思和丰富的联想。”这个故事不仅在省、市比赛中多次获奖，还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举办的全国新故事作品评比中，获得优秀作品二等奖。而我省仅此一件，足见并非易事。

反过来，赵和松的故事创作对他的小说创作也是有影响的，可谓相得益彰。由于长期写故事对他的影响，他的小说是面向读者的。一般都有扎实的内容和浓厚的生活气息，都有一个摸得着的“故事”，所以为群众喜闻乐见。以前的获奖小说《说一说酸甜苦辣》是这样，近期发表的《月晕》、《圣鱼》等也是如此。

然而，也不能否认，这种相互影响有可能带来某些副作用，我以为意识到这些很重要，也很适时；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既写故事又写小说的赵和松，一定会把他的小说写得更是“小说”，把故事写得更像“故事”。

一九八九年四月

话说《当代老板》

这几年，富阳新鲜事特别多。

作家和企业家“联姻”而成的《当代老板》一书，可称其中一件。

一批有名气的作家，从杭城来到富有灵气的富春江畔，找的对象全是私营企业的老板；县工商局长和文联主席充当“红娘”，亦称新鲜。

一九八八年深秋的一天，县府大院内的中型会议室，成了临时“婚姻介绍所”，热闹非凡。“男方”牵线人县文联主席介绍的对象，有省作协副主席谢鲁渤，市作协主席薛家柱，副主席毛英、李杭育，还有专业作家曹布拉、沈治平，诗人崔汝先，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其中，这几年屡见力作的高舫、潘虹、莫小米也来了。“女方”的“月下老人”县工商局局长何侠安，早已挑选好一批麾下的佼佼者，他向作家们口头介绍后还怕人家信不过、不中意，又提供了事先准备好的书面“简介”。双方介绍，各自“相亲”，不料一拍即合，一锤定“姻”。由于“男少女多”，把在富阳的省、市作协会员赵和松，杨承尧、蒋增福也顶上去作为“被搭配的新郎”。

经过多半年时间，到一九八九年七月六日，同是在这中型会议室里，同是这批作家和企业家又聚会，共庆他们合作产生的成果——举行《当代老板》发行赠书仪式；又同样是热闹非

凡，县委正副书记和县长们还有宣传部长，也到会向他们祝贺。在一个县里，专为私营企业家立传、经省级出版社公开出版的专著，在全国尚属首例，怎能不好好庆贺？

《当代老板》写的是富阳县的一群私家厂老板，他们原来大多是些普普通通的“乡巴佬”，近几年居然成为我县城乡的风云人物，且他们中有些人的影响，已越出县界，直至漂洋过海。但有谁知道，他们经历多少艰难曲折，甜酸苦辣，喜怒哀乐。《当代老板》这本报告文学集，以朴素的纪实风格和饱含激情的笔触，真实地记述了他们由农民向企业家转变的历程，讴歌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同时，透过他们又折射了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它确是一本很有意义的书。

《当代老板》所写的十九位私营厂老板得以在农村立足、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们顺应了改革开放的潮流，以及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巨大内驱力。这是“黄土地”外的拼搏和实践，是时代给他们提供了舞台。他们代表了农村新崛起的生产力，因而更富“当代”色彩。

这几年大家都悟出一个道理——办企业需要能人，而这些个体企业的老板，可说个个都是农村中的能人。他们习惯于同泥块打交道，一旦进入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机制，难免会遇到无穷的困惑与困境，但他们以自己的朴实、坚韧、智慧，以至于近似“狡猾”的“头子灵”得以打开了生路。当他们成为殷实的老板后，又面临着来自周围农民或本厂刚放下锄头的职工的妒忌、刁难，有的还遇上天灾人祸，有的竟受到令全家乃至亲戚们也毛骨悚然的恫吓。但他们还是闯过来了。这首先取决于自身的能力和毅力，也离不开老板们的“后台老板”——包括工商局在内的县里几届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

为《当代老板》作序的作家李杭育，把县工商局长何侠安

称作为“老板们的后台老板”。我深知何的为人处事，深感这比喻是非常恰当的。他还曾跟我说起过，富阳县个体工商户缴纳的税收，几乎占到全县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我就想到，像我这样吃国家饭的，每月如拿百元工资，有二十五元是他们提供的。作为作家行列中的一员，理当为这些个体老板们唱赞歌。何况国家对他们的投入并不多。他们则把工商局当成“娘家”。

《当代老板》抓住了每位老板的特点，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准确而本质地揭示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性格，开展经营的才干，能屈能伸的气度；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他们智慧中的眼泪，勇敢中的辛酸，胜利中的痛苦。

这本由杭州市作家写作中心和富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合编，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老板》，由于撰写者是一批很有功力的作家们，他们不辞辛劳的深入采访，并运用自己丰富的写作经验提炼主题，精心构想，使作品熔新闻性和文艺性于一炉，达到了令人满意的地步。我以为其中每篇文章都有很好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除我这样的“搭配者”凑数外，每篇都有自己的价值和特色，都值得一读。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老板们的“后台老板”*

——记富阳县工商局局长何侠安

在浙江省富阳县,私营老板们时常会提到“何局长”三个字,有的私营老板说:要说我们是老板,何局长就是我们的“后台老板”。

何侠安是富阳县工商局局长,他对“后台老板”称呼也有自己的解释:“所谓后台老板,就是要在老板遇到麻烦的时候,站到前台去!”那么,何侠安为什么乐于为私营老板们撑腰呢?这不能不说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

何侠安一九四六年三月出生于富阳县里山乡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父亲早先是做小买卖的“个体户”,后来一次次被“割尾巴”;他母亲是土裁缝,靠给人家做点衣服挣来的“工钱”供他上学。一九六四年,他当兵去了,那时的农村,当兵几乎被看作唯一的出路,他跟着部队跑了半个中国,也有机会从更大的范围内认识了贫穷和落后。后来,他转业到富阳县知青办公室,知青们的遭遇和困境,又使他认识到了城镇就业问题的严重性。一九七八年,他调到县公安局,因失业而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又使他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面。一九八五年八月,他从公安局副局长的岗位上调任工商局局长,这给一直被如何

* 本文与蒋金乐合作。

缓解当地的失业和贫穷这一社会问题困扰着的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用武之地。

他清醒地认识到，在我们这样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农业国家，发展私营经济无疑是一条希望之路，既合乎中国的国情，又合乎初级阶段的理论，也合乎国家的政策和法律。

但是，在一九八六年以前，对私营经济还处在“看一看”和“不要公开宣传”的阶段，从政府官员到老百姓，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三种“病”，恐资病，斜视病，红眼病，“个体户”本身也存在着“等外公民”的心理。在这种环境和状态中，何侠安却冒着风险，为私营经济的发展鼓与呼，在县里制定有关政策时，他站出来为“个体户”说话，呼吁大家“最起码的是不应歧视他们”。他东跑西忙，为个体户解决从审批场地、资金、供电到内部纠纷、自身形象、家庭矛盾等等各种问题。

富阳的私营经济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怎么样不使其成为“散兵游勇”？何侠安觉得有责任做好组织工作，于是，全省第一个“私营企业俱乐部”在富阳诞生了，何侠安通过这个俱乐部，既为私营老板创造了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监督的条件，又为他们提供了“说话”的机会。

为了替私营老板树“牌子”，何侠安又说动政府领导人，破天荒地把他们纳入了评定“重合同，守信用”的企业行列。

为了给私营老板应有的社会地位，何侠安又通过政府，在他们当中开展评选“明星企业家”的活动。

经过几年努力，在美丽的富春江畔，一大批私营企业诞生了，一大批明星老板开始在更广阔的天空闪烁。一九九三年的全国政协会议，有二十名私营企业家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唯一的一名就是富阳的方雪木。

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连续两年，何侠安被评为浙江省工商系统的先进工作者。

即使是一心一意做好事，有时也会遇上意想不到的厄运，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检察部门以“调查”为名，将何侠安弄到一所疗养院后，突然向他宣布“监视居住”，并采取了一连串的非违法行为：搜查、抄家、关押家属……最终只搜出一张夫妻多年积蓄下来的三千元存折，未过门的妹夫所送的三条香烟，以及何侠安收藏多年的三十多瓶酒。“执法者”一无所获，便四处动员“私营老板”们检举、揭发。哪晓得私营老板们纷纷为他鸣冤叫屈，有的还跑到市里、省里去求“青天”。

何侠安直到被非法拘禁了三十二天后，才晓得“逮捕”他的“证据”竟是蓄意捏造的一份匿名诬告信！一个工商局长如此热衷于与“私营老板”打交道，难道会不从中受贿、索贿？你不是老板们的“后台老板”吗？你不从中渔利有谁相信？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在蒙冤被关一百六十八天后，何侠安终于于一九九〇年五月十四日“无罪释放”。不久又官复原职。

有不少私营老板向他倾诉：“你吃了那么大的苦头，干吗还要来做这个很容易使人误解的后台老板呢？”

何侠安向他们笑笑：“我这个后台老板是有大后台的，党和政府叫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我们最大最稳的后台老板！”

一九九四年二月

我所认识的骆四福

骆四福终究出名了。新闻媒介让他上了“抗洪英雄谱”。

在我看来，老骆早该是富阳的新闻人物了，且称得上当今“富阳一奇人”。我曾跟他多次说定，要听他谈个三日三夜，以“富春奇人”为题写一部长长的纪实文章。幸亏这次经历“水底抢险八小时”和“生死攸关五小时”后，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不至于我俩的“协定”落空，遗为憾事！

前些天，新闻单位去病榻上采访他，当问及过去时，他说有关他的情况我比较了解。我们夫妇去看望时，他却从医院“溜”回家里，正在小本本上翻找我的电话号码。问到为什么从医院“逃”回来时，他是一本正经，回答得理直气壮：吃伤药的同时还得顾牢肾脏，老伴是找不到药放在何处的；今晚杭州有好多老朋友来看我，接待不如在家里方便。因他的病房里竟有八张病床。

我在建国初期就认识了老骆。富阳建国后的第一根木头电线杆是他埋的，第一部电话机是他装的。新政权刚建立，上下沟通频繁，匪情朝报不断，他干的这门行当，是很让人尊敬的。他不但与区乡干部混得很熟，还成了县领导身边的“要员”，加上当时倡导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县里的头头们很少有不认识他老骆的。后来，他的编制归属省里，专管一条跨越富阳全境且是由北京通往福建前线的长话线的维护工作。但

他仍然长住富阳。东起杭州市郊西至新登尽头的沿线老百姓，也都知道他老骆的。而他，不但对老百姓的冷暖疾苦、喜怒哀乐都熟知，这沿线的田地山水和村庄，也都装进他的脑子里，什么地方吃旱了，什么地方淹水了，哪里的桥断了，哪块稻田该治虫了，他都知道，且会主动去找村干部，去寻乡政府，直至跑到县里义务通报。每每做这些事时，乡音很重的那句“官话”是经常挂在嘴角的：“事情应该是这个样子做的。”

老骆是地道的工农出身，他仅靠自学识得几个字，但他特别会动脑子，他的小聪明是出了名的。在我们家进出的日子里，遇上有些难解的事情，向他请教或要他帮忙，没有不被他攻克的。不要说电线电器、电话机这类“拿手好戏”，就是有些原本不与他搭界的事，诸如养生之道、中草药方，他也能说得头头是道。记忆中，发生在老骆身上有两件事是难以忘怀的：三年困难时期，许多人都患浮肿病，可他老骆却是红光满面，一身仍有使不完的力气。后来才知道，那段时间里，他千方百计去寻找一些家畜家禽的骨头，不论陈年旧的或刚吃剩新鲜的，一概弄来，烘干、磨粉，当炒米粉充饥。另一件是他的驯鸡之道：秋收季节，收工回家，他在家门口把自行车铃一按，饲养在家里的十多只鸡就会蜂拥而出，自动地各就各位，除却空出捏手柄、踏脚板和车胎，包括加缚上去的一根横木，自行车的各个部位都停得满满的。于是，他踏着它们到割过稻的田块里，一按铃，鸡就自动跳下觅食去了。他则悠闲地坐在田坎边“指挥若定”。偶尔有的鸡过“界”去未收割的稻田，他一吹口哨就会回头的！夜幕降临，再按一下铃，鸡们又各就各位了……

老骆爱管“闲事”也是出了名的，谁家婆媳不和，谁家小辈不敬老，他会自动上门去劝解和说公道话的。他照例会说，“事情应该是这个样子做的。”即使两个小伙子在大街上发生争

吵，围观群众一大堆，他也照样“挺身而出。”他虽然早就调离富阳邮电局，但造邮电大楼的施工质量仍会主动去管；他虽然早就退休，可城建绿化、江里挖沙、堤坝遭侵以及大桥的桥墩撞伤这类事，他都会去主动管一管。遇上火灾，不论单位还是私家，他比自家的还心急火燎，但见他拿个盛水工具，跑东跑西地呼号，喊叫一阵子后，自己就扑进去了。这年月有些事人家不听他的管，他却有个“三勿相信”，跑单位，走信访，或去直接找市里领导。他始终信奉“事情应该是这个样子做的。”

如果有人求他帮忙，他是二话没得说的。这次报道中说得并不完全，其实，他这“潜水员”是在退休后才业余搞搞的，潜水服等设施是他自花万把元积蓄置办的。打捞物件，打捞汽车和沉船，乃至打捞死尸，他多半是尽义务的。“当然，完全不收费也不行，要添置设备，要给助手与徒弟有收入。”老骆实话实说。此前，他还干过起重、吊车这行当，专吊公路边翻掉的汽车，以及拆建房屋中的梁柱之类的大家伙。后来他发现干这事已有了专门部门，有更先进的设备了，六十岁后才改干潜水这行当的。这次报道中还说到，他是“指挥部通过掌握的线索，当晚十二时找到骆四福”云云。其实，按老骆的脾气和一贯作派，即便不通知他，他也是会自动“请缨”的。除非他不知道。而且，赴汤蹈火、救死扶伤是他最乐意去的。

熟知老骆的我和我的家人常常跟他开玩笑，说他的命特别大，是个跌勿死、压勿死、淹勿死的人。他从十多米高的电线杆上跌落过多次，有时跌得像只田鸡，几天神志不清；他被上千斤重的钢板、水泥大梁压过，有时竟断了气，但都一次次地活转过来了。今年上半年，某地水库启闸淹死了人，也是他去打捞出来的。我跟他讲，年纪大了，又是伤病遍体，干这事是很危险的。他却说，“事情应该是这个样子做的。”这话并不见得

文不对题。“死尸打捞上来后，电视台在岸上等着拍电视，我心里蛮高兴的。”说明老骆对光荣还是很看重的。像这一次，人家关注他的“死里逃生”，他却说：“东洲保牢就好，说明我还是有功劳的。”领导们和紫铜村的村干部去慰问他，他也直话直说，这种很光荣的事我以后还是要去做的。

老骆儿孙满堂，不愁吃穿，我多次劝他的“该休息了”的话，他总是听不进去的。

一九九七年十月

方物紀略

富阳土纸*

引言

在浙江省富阳县,每逢初夏农闲时节,农家不分男女老少,纷纷忙起制作土纸的活儿来,富春江两岸村庄里,男人们在作坊里吆喝,妇女和小孩,把一张张湿纸摊晒得漫山遍野……

造纸需要充足的纤维和净纯的水,富阳地区就地取材,材料、工具样样俱全,普通农户都有能力开槽造纸;目前存在的仍有业余小作坊、专业化分工作坊、以及大规模纸厂三种形态……

富阳土纸种类繁多,依纸的质料可分为竹纸、草纸和皮纸;按用途各异又有文化纸、卫生纸、杂用纸和宗教用纸之别;从前富阳以元书纸著称,其中极品纸被选为朝廷奏章和科举试卷纸,“京都状元富阳纸,十件元书考进士”这句话,说的就是当年的荣耀。

* 本文与李杭育合作。

传统根基

初冬时节，庄稼收齐了，越冬的小麦、油菜也都播下，田里一时没啥活计，富阳地区的农家便腾出手来，纷纷忙碌起做纸的营生。不仅是常年开工的纸厂照旧运作，更多小而零散的业余纸坊，本是三日打鱼两日晒网的那类，到了这个时候，也改变节奏，频繁作业了。

他们首先把毛竹、树皮、稻草、破布、破棉絮这类东西，经过水浸、石灰沤，火蒸煮，放入碓臼捣烂后，加入树胶调兑成浆，用帘子抄成一张又一张的湿纸，湿纸用榨机去水，又用焙弄焙燥或露天晒干，直到用扁担、独轮车装运到集市上去出售。这一道道的手续真是繁复。许多事情是从夏天就已经开始做，经过了许多时日的“办料”，现在都齐备了，生活更是铺展开来，用上了更多的人手，更繁忙吃紧，让男男女女都拥着一份工作，里里外外去应付。看上去是东一摊子西一摊子的纷杂、凌乱，却都是同样的买卖。东家和伙计，师傅和徒弟，丈夫和妻子，老人和小孩，都分派了角色，都有自己的岗位，很少有人是同造纸无关的。这就是这些日子的“本地风光”。

去富春江两岸的村庄走走，到处都能看到这种情形：纸槽灌满了浆料，煊弄升起烟火，水牛在料塘里绕圈儿践踏，溪岸上的水碓一记一记的舂着臼坑里的粗料，男人们在作坊里吆吆喝喝，妇女和小孩把一张张湿纸摊晒得漫山遍野……

在浙江省的富阳县，像这样的乡村生活图景，差不多是从晋代就开始了，一千五百年长长久远的延续下来，基本上保持原样。手法依然如故，工具还是那么一些。竹木器械，石板砌的纸槽与史书上记载的大体不差。石灰几乎是唯一的化学媒介，

能源也就是阳光、溪水、柴草，再加上依靠食物能不断补充的人力和畜力。花很多时日沤制原料，很费劲地取其纤维，一张张的抄纸，然后是火焙日晒，这一切都离古人的做法不远。

不同的只是造纸的规模益发广大了，买卖还做到了海外。富阳后来居上，比其他那些古时候纸名很大的地方更有后劲，如今土纸产量占全国（除台湾省外）总产量的一成以上（一九七八年的统计数是百分之十一点四）。全县超过五分之四的乡镇开了纸槽，十多万人主要以此为生。可以说富阳的农民除了种田，就以做纸为基本营生，与生计顶相关。

再说他们也没有多少田地可种，正如所谓“八山半水分半田”，自然状况如此。要不是造纸业的补助，地处浙江西北丘陵边缘的富阳县，仅凭它的那么一点田地，要养活这许多人肯定很困难。浙江各地都有五行八作的大批工匠常年离家在外，足迹遍布全中国，然而富阳人却是格外的恋家，很难接受这个办法。历史上富阳也不曾有过人口大量外流的情况，虽然人口压力从来都不轻，历史出了难题给富阳人，又启示他们解决的办法——毕竟是中国人的最早学会了造纸。据老人们说，早先富阳的乡下人家多于堂前供蔡伦像，蔡伦的传统在这里深深的扎下根来，因为它成全了富阳人执著于本乡本土谋求生计的心愿。

自然条件

本乡本土的自然条件很有利于造纸。富阳紧邻省会杭州，水陆交通便捷，贸易机会很多。风光旖旎的富春江逶迤而行，横贯富阳县境五十二公里，将它截作南北两半，且造成“一江十溪”的交错，四面八方，颇得航运之便宜。富春江的两岸，既

有盛产稻、麦的广大沿江平原，又多是夹水而峙、竹木丰茂的丘陵峰峦。五十万亩良田所出稻草、麦秸，三十四万五千亩成片成林的毛竹，以及数不清的溪涧、河流……凡此种种加到一起，除运输联络的广达之外，还保证了造纸业两个根本性资源条件的满足：纤维材料和水。

水不止量上充足，质也纯净，还有流泻的落差可被作为动力能源的利用，这是丘陵地区的一个便宜。试想，从前没有电力时，若非湍激的溪流带动手碓舂纸料，全凭人力来完成这项分量巨大的工作，造纸成本会是怎样的昂贵？而且几乎全部工具、设备都是由就地取材的竹木石料制成，使得造纸工场的投资代价相当微薄，普通农户也有能力开槽做纸，最终也就可能使得这项产业在富阳广泛普及。

总之，自然条件很好，各方面都有利于富阳人大兴其事。

人的条件

这里的人似乎天生适合做纸农。经过了近代洋纸输入的强劲冲击，为什么富阳土纸业能够一直坚持下来甚而发扬光大，而别的地方却不能？其中缘由并不是光讲传统根基与自然条件就能讲得通的。浙西的“开化”，福建的“连泗”、“毛边”，当初可是远比富阳的“元书”名气响亮。富阳竹纸直到清代才开始有些地位，民初达到鼎盛，出了“昌山”、“京放”这档极品，民国四年在巴拿马的国际博览会上获奖。恰逢洋纸局面看好、土纸普遍走下坡路的艰难时代，富阳土纸的后来居上，就不能称道事在人为了。

富阳人说不上特别聪明，甚至也说不上很勤劳，他们自己就有“三个富阳人做不过一个萧山人”的说法。这多少表现出

他们性格上、意识上、生活态度上的某种倾向：不很在乎贫富，不过分巴结生活，不愿为赚钱糊口这档子事费太多脑筋。这样的态度、秉性，使得富阳人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发家致富的步子远不及邻县的萧山人迈得快，但对于维持在一个赚钱不多、油水不大的古老产业来说，这种秉性恰恰又是很可贵、很值得称许的。

要说明这种保守型的心态，就在我们为写这篇文章在富阳作探访的过程中，不止一处的有主人提醒我们注意保密，不要在文章里把造纸工序写得太详细，以免将他们的工艺技术和盘托出，让人家学去。说这话的有纸坊业主，也有当地官员，都是郑重其事的态度，叫我们很不忍心泼他冷水。其实真该让他们晓得，明人宋应星四百年前什么都泄露了，把富阳人今天还在做着并且当作机密来保守的这一切，都详详细细配着插图写在一本名叫《天工开物》的书上，而且也早已让西方学者原原本本的传播给全世界了！

富阳的土纸业之所以没有受到来自台湾、日本及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严峻挑战，而是得益他们真正具有一国传统的保守精神：自给自足、安于乡土、不赶潮流、不见异思迁，心甘情愿地守着祖业，做这劳动巨大而收利微薄的土纸，做得耐心、认真，甚而乐在其中。说到底，这才是富阳纸农拥有的最大优势。

业余的小作坊

据《浙江之纸业》一书提供的统计，民国十九年，富阳全县（不包括现属富阳的新登）有槽户一万零六十九户，共有纸槽一万零八百六十四个。“槽户”即土纸生产单位，可以是一户一

槽也可以是一户多槽,或几户合开一槽。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其中绝大多数是只有一个纸槽的家庭副业性质的小作坊,它们的形成是自发的、分散的,设备简陋,作为农家生计之补充,而不具有工业社会“资本——利润”意义的考虑,这便是当年富阳土纸业的基本面目。

在富阳,造纸是千家万户的事。如今并没有很大改变,也还是小作坊遍地开花,至于通常是不可避免的集约化和专业化过程,在这里反而不多见。笔者有限的实地调查所见,规模最大的土纸工场,也只有六个纸槽,用了几十名工人。

小作坊经营有许多缺陷:不经济,产品的质量、品级不容易提高。生产规模太小,工具和设备相应的简陋,压缩投资之下,通常就省去了焙纸的煊弄,而自然地利用阳光,漫山遍地摊晒湿纸。因此小作坊通常只是制作廉价的草纸或黄烧纸,赚取微薄的利润补贴家用,没有更多的钱可以拿出来再投资,小作坊便永远停滞在它的初始阶段上不再发展了,几十年都还是当初的那么一间破房、一个石槽和一些坚固耐用的粗笨工具。这样的家庭小作坊,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美好前景。

不过,年复一年的,照样是应付下来了,因为它根本上与农业社会极相容,能够最合理、最便宜地利用劳动力,农民总是有许多零碎的空间,若能见缝插针地加以利用,则无论效益是高是低,总是对生计有补益的。农民收完田里的活就偷空做纸,让自家老小当他的帮手。帮手不够就少做一点,既然把做纸看作副业,也就不会感到有大的竞争压力。小作坊的好处是:它能够很灵活地对待诸如资金、劳力、市场、原料等问题:它既可以是常年作业,也可以是趁农闲干一阵子,甚至也可以在歇业了一两年之后又重新开动。

专业化分工的作坊

如果是在田地更少、农业收入更微不足道的地方，这类小作坊也就成为家庭的主要产业了。新关乡的朱家门村便是如此，这里的农民是真正应该称作纸农的。

朱家门村深陷于山坳，几百座农舍顺着一条狭长的沟谷绵绵分布。这里每户均只有一分多地，连口粮都远远不能自足，造纸业便几乎成了解决生计的唯一重要手段。全村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劳动力从事造纸，仅是造竹浆宣纸的纸槽就有八十多个之多。纸槽都一一分散在各家，各自独立运作，而由一个“富阳宣纸厂”的名号就统一对外揽接生意，推销产品。“厂长”傅尚公，实际就是一个推销商，全村各家的产品一概由他解决销路，由他找着买主，签下供货合同，回头再视生产定额分解到各槽户。各户赚加工利润，他赚推销的佣金。

在这个大联合体之下，又有许多小联合体生成。槽户们自由结合，对于单个槽户无力添置，但是若独家占有也是浪费的那些大件设施，譬如煨弄、料塘、皮镬等，就三五家一组共同投资。通常一座煨弄可焙三四槽纸，安排得紧凑，使用率还可以更高。共同投资，有偿使用，最后是按股份分红。因此，一座煨弄就不仅是土纸作坊的配套设施，它自身也是个独立核算的企业单位。

高度的专业化分工还表现在造纸原料的加工环节上。有些人家并没有纸槽，而是专门“办料”的。而有些槽户若造纸产量提高，自家山上的竹子不够用，正好向专门办料的人家买原料。

这里有多种方式的原料买卖。买人家山上的青竹，砍回来

自家从头到尾一手操办；忙不过来，也可以买淹过或煮过的粗料，自己再完成后面的几道加工；若实在人手太缺，就只好买现成的白料直接下槽了。在这里，传统小农经济的灵活性，可以说适应了已经相当资本主义化的劳动分工和市场关系。

当笔者问起造纸业对朱家门村的自然环境有何等程度的污染时，傅尚公厂长告诉我们，各作坊排出的碱性污水，正好用来灌溉他们的酸性土壤田地——这倒是巧了。

纸厂与做纸师傅

除了业余的、只当家庭副业的小作坊，和虽然也是家庭格局但却高度专业化的一类作坊之外，与之并行共存的，还有规模较大，设有很多个纸槽的工场（或者叫纸厂），也是土纸业传统模式的一种。它们的数目不太多，所占比例也不太大，但地位、性质颇为重要。对于土纸业的长期兴旺而言，这类工场有着不可或缺的维系作用，即不以小作坊式的家庭劳动为满足、而大量雇用劳动力，并且从中提炼和造就出富阳农村中一个地位特殊的劳动阶层，俗称“做纸师傅”。

做纸师傅既泛指每道工序的技工，也专指在纸槽前持竹帘抄纸者，被认为是技术性最强因而最拿大的，好比戏班子中的红角。如今，一个抄纸技工的计件日薪可以高达人民币十五元左右，而同一纸厂的辅助工日薪仅是三至四元。

收入的巨大差别刺激了专业化。一个做纸师傅可能一点也不会农活，从十三四岁起就学做纸，做到五十岁便体力不支，不能再抄纸而转做辅助工打杂，收入也因此锐减。掐头去尾，他顶多也只有二十年的好状态，全都投在纸槽边了，很不同于那些趁农闲插一手捞点外快的“业余”槽户。做纸师傅才

始终是土纸业中的坚定力量，像一支“常备军”，死心塌地的、别无选择的、完全投入的，因而也是最有事业心和创造精神。有了这批职业化的做纸师傅，土纸业的发展才可能是持续、稳定的。

反过来，土纸业的发达、兴旺，也抬高了他们的身价，给了他们很大的自由天地。一个好的做纸师傅是远近闻名的，是许多槽户争夺的对象，因而他与雇主的关系是很坦然、很有保留的。他当然也知道适可而止，通情达理，不过分要求东家，而信守契约，珍惜自己的名誉，有始有终地干完当年。到年末，东家满意，摆一桌酒席犒劳他，同时也是约请他来年再干的意思。这时候，他有机会摆摆架子，在待遇方面挑剔挑剔，嫌东家给的工钱少了，或者嫌东家的饭菜不够好。东家若答应改进，他也满意，留下就是。他一般也不愿意轻易跳槽，这会于他名声不利，再说老厂老槽地做惯了，摸熟了，就上方下手都相处得好，想想也是犯不着为一点小小的不如意而另换环境从头起，尽管别家给的待遇或许会稍稍好些。

东家这头也是尽量留他，会拿种种人情去笼络他，直到招他做了女婿，一劳永逸地解决长远。因为人才难得，尤其是这位好手如果还有发明创造，譬如在填料上有独到的配方，为东家造出名纸、极品，东家就更要留他不放了，哪怕他老了做不动了，也一定供养着他，以免他把配方传给别家。

有这种种的优越，当个做纸师傅便成了一般农家子弟很巴望的一份出息。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看样子有几分聪慧的，爷娘便好歹请个师傅收他为徒，算是为他谋前程了。

于是，富阳的土纸业便能够源源不断地从农家子弟中得到佼佼者，来补充它的人才队伍了。

富阳土纸品种

富阳土纸的种类、名目繁多，分类办法主要是从制造和使用这两个角度来考虑。即依纸的质料不同分为竹纸、草纸和皮纸三大类，同时也依用途各异分为文化纸、卫生纸、杂用纸和迷信纸四个大类。不过，这样的分类并不绝对。有些品种的纸是用不同原料造的，譬如竹料和草料相掺的黄烧纸即是。

文化纸包括书写、绘画以及印刷书报的用纸。传统上富阳是以出产元书纸著称的，其中的极品，曾被选为朝廷锦夹奏章和科举试卷用纸。“京都状元富阳纸，十件元书考进士”，这个说法富阳人津津乐道，说的就是当年的这份荣耀。无奈技术失传，“赤亭纸”、“谢公笺”这些名纸都绝迹了。现在富阳仍出产元书纸，品质一般，但好在价廉，学画练字顶实惠，难怪富阳民间学练书法风气颇盛，小学生书法比赛屡有省里得奖者。

元书纸吸水性好，作用相当于活性炭，因此还被一些生活讲究的富阳人用来包装上好的绿茶，存放于干燥、密封的容器中。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文化纸这个门类中又新添了竹浆宣纸。它的成分以毛竹纤维为主，为求柔韧，加添些许棉花和其他配料。由于是长纤维的竹纸，渗墨不如徽宣来得酣畅，虽然也有书画家欣赏，以为最宜画兰、竹。但富阳宣纸的最大优势也还是在于价廉，四尺宣零售价每张才人民币三角二分，而同样尺幅的五星牌徽宣则是人民币一元五角以上。价格便宜，用来托画很理想，这就已经在徽宣的一统天下中挖出了一块不小的地盘。近年来，富阳宣纸还大量地用来印制仿古线装书籍。

迷信纸这个名称，在民国初年时就 very 常用，至今仍用它指

各种宗教活动用纸 主要就是在丧葬、祭祀、求神拜佛、驱魔避邪等仪式场合当烧纸用的。这类纸一般都染成酱黄色，质地较厚实。在富阳的各类土纸中，如今就以迷信纸销量最大，销路最广，连西藏也有卖。

从前则是草纸更大宗，以至于人们想到富阳纸时首先想着的就是富阳草纸，尤其是其中当手纸用的坑边，早期江、浙一带几乎无人不晓，因为也几乎无人不用。它们厚实、耐擦，粗而不糙，吸水性极好。可惜目前像这样质量的坑边纸很少有纸农肯做了，只因纸价总是太贱。现在富阳仍大量出产的所谓“坑边”，偷工减料太甚，简直不是那回事了。但人们好像对物价更敏感，质量差些还接受得了，因此现在的劣质坑边照样有市场。

另一些品种的草纸产量都不大，主要用于包装。有一种叫“厚斗”的粗草纸，乡下人常拿它包裹点心食品和土、特产，诸如香糕、麻饼、酥糖、笋干之类，很具乡土风味。

竹纸制作过程

造竹纸始于竹。尤其是好纸，老竹做不了，竹太嫩又嫌出浆太少，因此一般总在立夏至小满间砍竹最宜。

竹山的生长育有大年、小年之分，过小年须封山育林，因此大年砍竹，不光满足当年，还须备好来年的用料。

砍竹后，直到抄成纸张之前，是被富阳纸农称作“削竹办料”的过程，削皮、斩段、捆紧，接着就是淹、煮、洗，总之是用尽了条件许可的一切手段，费很大劲，投入很多劳作，占地、用水、烧柴也都不少。那么大的兴师动众场面，一切只为一个目的，就是要从竹子里面取出合乎造纸要求的纤维。

在富阳纸乡，“削竹办料”已经是当地土话中一个很有份量的词藻了。说某人削竹办料了，就相当于渔民出海了，田家春耕了，由此也是说紧张繁忙的生活又开始了。“爹死娘亡石灰封”，这一民间俚语，说的是为了削竹办料而顾不得一切了。

办料完毕，接下来是抄纸。纸帘是由削磨得细洁的竹子丝编就，抄纸时平覆于帘床上，由抄纸师傅端平了，缓缓地由槽中兜起纸浆，又缓缓地向前倾斜帘床，将多余浆水由帘床前沿晃出，然后搁好帘床，打开扶手，摘起纸帘。将抄起纸的那一面帘子往纸架上轻轻覆下，再轻轻揭起，纸就粘在那板上或是先前的纸上了。纸叠纸，约摸一千张了，算作一件，移至榨机处榨压去水。这真是有点令外行人大大讶异，看上去是豆腐似的一叠湿纸，居然经得起重力压榨！而且更有趣的是，还非得来这一个，才可能把一张张叠着的湿纸分离开来，这恰恰是整个造纸过程中最难以做到的事！而我们的祖先它早就会了这项技术，并且代代相传至今，才有了今天富阳土纸的面貌。

一九九二年

富春江鲥鱼

鲥鱼是富阳著名特产。长江、珠江、钱塘江水系都有鲥鱼，独以富春江鲥鱼鱼体丰肥，肉质细嫩，脂厚味美，最有名气。郭沫若、郁达夫均有忆及鲥鱼的诗作。

鲥鱼是一种回游鱼群，它的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海洋。每年春夏之间，农历端午前后，就开始它一年一度的生殖回游活动——它从海洋进入钱塘江、富春江是很注意时机的。起初，鲥鱼聚集在钱塘江入海处，如果江水流量不大，水温不适合，便在江口徘徊不进；等不及的就北上进入长江。当水温上升到二十至三十度，遇上雨后水流湍急时，鲥鱼就成群结队地由钱塘江上溯到富春江，游到七里泷一带产卵。幼鱼在江流淡水中逗留数月，到秋末冬初又回到故乡大海中去。因它有每年定时入江产卵的习性而得名。

鲥鱼产卵是很有趣的。大雨后江水上涨，流速加快时，要是能潜入水底，就可以看到三四条雄鱼追逐着一条雌鱼。当雌鱼产下一批成熟的卵以后，雄鱼马上射出白色的精液，使之粘在鱼卵上。一般五六斤重的鲥鱼能产卵一百四十万到二百五十万粒。受精以后的鱼卵，被水一路冲流，一路孵化。在富春江产的卵，冲到钱塘江就变成小鱼了。

鲥鱼之不去新安江，渔民中流传着有趣的故事：鲥鱼从富春江一直往新安江方向游去，游到七里泷，碰到了鳊鱼。鲥鱼

问鳊鱼：“新安江好玩吗？”鳊鱼说：“新安江山光水色很好，就是江面太窄，我去了一趟，把身子都轧扁了。”鲥鱼看看它的扁身子，吓得不敢再上游了。另一个故事则说：“严光在严子陵钓台垂钓时，钓到一条鲥鱼，发现它与别的鱼不同，就把它放生了。鲥鱼感恩不尽，从此它的子子孙孙每年都要到钓台谢拜。凡是拜谒过的，严老先生就给做上一个记号——嘴唇上点有朱色。其实，这主要是产过卵的缘故。

据有关资料记载，富春江最高年产鲥鱼八万多斤。六十年代以后，由于上游筑了拦江大堤，水温下降；下游钱塘江口围涂造田，江面变窄，鲥鱼就不大愿意进来了。五年前，笔者为张罗拍摄《最后一个渔佬儿》电视剧，得到一条作道具，已属不易，而一九九二年我们出访新加坡，一餐馆老板竟向我们炫耀：我们这里有正宗的富春江鲥鱼。

一九九四年十月

富阳桑

富阳自古重桑。“虽濒江，民不以鱼盐为业，男力耕，女勤蚕织。每有新涨沙地，皆种桑树。”尤以“东南、正南两乡最盛”。

富阳重桑曾名闻遐迩。清光绪《富阳县志》引自《府志》云：“桑出富阳者佳，余县接种者亦名富阳桑”；“南乡所出之蚕茧，上嘉湖也”。

清末至民国中期，富阳蚕桑业是很具规模的。光绪年间（1875—1908），富阳、新登两地，年产蚕茧七千余担。民国二十二年（1933）富阳有桑园一万八千亩，蚕户六千四百户，产茧九千担；新登有桑园一万三千多亩，蚕户五千八百户，产茧六千六百担。为鼎盛时期。嗣后渐衰。至一九四九年，两县残存桑园近万亩，产茧一千六百多担，不足一九三三年产量的九分之一。

建国后，有过“桑树上山”和“桑树下滩”的发展期，也有过“民食艰难，毁桑种粮”的生产上指挥失误。曲曲弯弯走到一九八五年，才算跨入“年产万吨茧”的省重点产茧县行列。以后，也曾出现过“总产亩产超历史”和“年产蚕茧超千公斤”大户的记录。

正因为“富阳桑”有过风光，富阳蚕茧曾“上嘉湖”，所以它至今仍为富阳人所重视，也为富阳人带来殊荣和实惠。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间，龙羊万市开荒山十六座，栽桑五千余

亩，一举名扬全国。其中首创“桑树上山”的沈凤英领导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农业部授予“农业增产模范社”称号，她本人当上全国劳模，还出访苏联等四个东欧国家。

目前，富阳国有支柱企业之一，前身为富阳丝厂的富阳丝绸总公司，仍为全市创汇大户。更值得引以自豪的是，该厂缫出的出口白厂丝中，曾达到过国家级最高标准——6A级。

说到蚕桑，富阳历史上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清代富阳名宦周凯在湖北为官时，不但倡导百姓栽桑养蚕，并留下不少著述。他在《劝襄民种桑说》等文章中讲到：“农桑者，天下之大命也”，“余浙人，浙重蚕桑，能种桑法……遂托之吟咏，分十二题，名系四十言，幸襄之能文者，广为传述之。”影响之深远，直到他谢世后，当地百姓还为他修庙塑像，供奉为“蚕神”。

一九九四年十月

富阳茶

富阳山地多，盛产茶叶。据民国二十五年的资料，富阳有茶园二万多亩，产茶八百多吨。建国后尽管几经起落，却依然呈“稳中有增”的势头；一九八二年，跨入“年产五万担基地县”行列，至一九九〇年，全县有茶园五万多亩，产茶二千三百多吨。

富阳生产的绿茶，以其色泽翠绿、汁液浓郁、香醇持久而闻名遐迩。明万历《富阳县志》载：“昔日富阳鲋鱼与茶并贡”；民国十五年出版的《浙江之特产》一书，对富阳茶评价更高：“明时富阳之茶为进贡之品，声誉最隆……今富阳茶的色、香、味，实不亚于龙井茶。”

富阳茶，向以绿茶为主，间有红茶——旧时咸康（今春建）生产的条红（又名“康红”）亦享誉一时，抗战爆发后，便湮没无闻了。富阳的绿茶，从前以“炒青”为主，品种比较单一，建国后因一度国家统一包销长期延续，一九八三年起茶叶市场全面放开后，随着质量和精品意识的提高，茶类品种逐年增多。至一九九〇年已有两大类九个品种。其中大宗的“浙江龙井”，系扁形名茶的新品种，色泽绿润，香气扑鼻，滋味爽洁，汤色、叶底黄绿明亮，颇具吴越之地的清逸高雅特色。毛峰茶，状如名茶“岩顶茗毫”，冲泡之后形似兰花，色泽绿润，也极受消费者青睐。乌龙茶，“绿叶红镶边，香多味又浓”，亦为茶中上品。

“岩顶茗毫”，堪称富阳茶首。它的原名为安顶云雾茶，一九八六年五月获浙江省一类优质茶奖后遂更名。这种高级旗枪茶，叶片阔厚秀长，叶汁清香，片有白毛，比一般茶叶含有更多的茶素、单宁、芳香油和维生素，连泡三次而不觉味淡。“岩顶茗毫”贵在于“顶”，产地里山安顶村，属仙霞岭余脉，顶峰高七百九十米，常年云雾缭绕，气温偏低，不受大气、农药污染；又加土壤湿润，酸碱适度，造就了名茶的特殊品质。它的出名，还有一个故事。

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为推翻元朝统治，曾来富阳、桐庐一带广揽人才，伺机起义。事败，元兵跟踪追捕，他只身逃上安顶山。山的西端有座大西庵，内住三位道人。见朱元璋相貌奇伟，又怜他是落难之人，将他隐藏。元兵去后，道人沏上一杯自制山茶。朱元璋见茶烟凝聚不散，小啜一口满嘴奇香……他称帝后，就下旨将安顶云雾茶列为贡品。如今庵的残址尚存，御制石碑上有记载。

一九九四年十月

龙羊白果

白果即银杏，是地球上经历冰川时代后，在我国及其他少数国家尚有生长的孑遗植物。较大的生产群落在广西、湖北、四川及山东、江苏等地方，尤以江苏泰兴的白果品质最为优良。

富阳各地均有白果，但多半零星散落在村前屋后。笔者老家就有“白果树下”的小地名，沿用至今已逾百年。“龙羊白果”作为富阳名优土特产推出和介绍，是因它比较集中地产于龙羊山区，有被誉为“银杏村”的。一九八五年，全县二千五百株成年结果银杏中，龙羊区就占二千株左右。建国后，富阳始由供销社后为外贸公司统一收购的出口白果，也主要在龙羊。又因它在富阳有基础，在外有声誉，并能使农民创收、国家创汇，多年来，富阳林业局高工顾炳炎便潜心研究，竭力推广。如今，这一原本要十几年几十年才能结果的银杏，已缩短三五年便可收获。使这一很有价值的珍品能沿袭下来，并可望以“龙羊白果”的命名的特产发扬光大。

中国医药对白果的药理膳功早有评说，《本草纲目》载，有敛肺、定喘、涩精、治遗尿等功效，尤以治妇女白带见长；用盐炒煮即可食，如配煮梨、枣、莲子、红豆作甜品，或配煮鸡、鸭、肉作咸品，一向视它为珍品佳肴。近年来，从白果树中提取抗心衰特效药，使白果树叶也身价百倍。白果木具有质地细腻、

不变形、有灭菌效果，早为航空机械模具及烹饪厨师所公认。白果颜色洁白，形状上尖、下圆如水滴，品质上乘，亦被公称为佛子果（佛子是“佛指”的谐音），故而东南亚一带的华人，认为食白果是既补身体又可因此成佛的吉利之事。

从前，白果这一多年生植物且往往产果不多而很少成片栽种，世人还视白果树有灵性。如春天授粉过多，夏天虽满树挂果，但养分供应不上，秋天一阵风雨，就落得满地青果，尽是一些浆水不足的小白果；如果伤了树的元气，也许三五年都不结果了；而且水淹、污染也会枝枯叶落，要待十年八年才能恢复生机。所以长期以来，零星白果树任其长不望收，或视作村上的风景树加以观赏。人们对白果的无知与敬畏，也许与一个民间流传的传说故事有关：西天的一对金童玉女，因触犯情律而被打入人间，下凡到下界化作颗颗白果入土而成长为白果树。

其实，白果自身也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抗劣免疫性能。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爆炸后，第一个冲出焦土的植物便是白果。

一九九四年十月

富阳栗子

富阳盛产栗子，全市仅以“栗园”、“栗坞”命名的自然村就达七个之多。民国十四年(1925)，富阳、新登两县就有栗园一万余亩。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八年，全县新建板栗基地五千多亩，至一九八九年，共有板栗一万一千多亩，计三十二万多株。分布于撤区并乡前的四十一个乡(镇)和三个国有林场。其中大宗产地在龙羊山区，占百分之七十六，面积在千亩以上的有贤德、洞桥、万市、南安四个乡(镇)。

旧时富阳所产的栗子中，以三山板栗、龙羊魁栗和胥口的口香栗最有名气，均被列为浙江名栗。

除却最近十余年来成片开发栽种的栗树园外，从前富阳的栗树，大多植于岩边坡地的微酸和偏酸性土壤，故栗肉中的淀粉含量颇高，即含有百分之十点七的蛋白质，百分之七点四的脂肪和钙、糖、磷、铁成分，还含有多种维生素。

栗子既是改善生活的美味佳肴和作为招待亲朋好友的上等干果，又可作为木本粮食来渡过饥荒。它不必花多少精力和工本，便可成为一项可观的副业收入，且一旦成树结果，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均有收获。所以，许多农家都喜在屋前房后、零星杂地上栽种几株栗树。传统习惯中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也泛指于种植栗树。

栗子可以有多种吃法：生吃，既甜又脆；熟吃，糯中带甜。

香味可口；风干了吃，别有风味。糖炒栗子，乃糯、脆、甜、酥、香，五味俱全。以前则多半见之产地的小县城和乡村集镇，如今因交通发达，流通搞活，不但国内的许多大中城市也设摊上市，现炒现卖，深受市民们青睐。据说，糖炒栗子已风靡东南亚国家的市场，乃至世界各地的华人街。所以，栗子的身价也随之提高。近年所见的用熟栗子加工成罐头，则更便于保存和流通。

用栗子加工菜肴，如栗子炖鸡，栗子炒仔鸡，栗肉银耳羹等，操作简便，美味可口。何况栗子还有药用价值。我国古代著名医药家孙思邈著云：“栗，肾之果也，肾病宜食之；生食治腰、脚不遂。”所以，有着传统经营的半山区富阳，发展栗子这一传统土特产品，可视为一宗较好的农业经济开发项目。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富阳竹笋

富阳地处浙江西北部的丘陵山区。山多竹多，竹乡天成，盛产竹笋，四季皆有。即便平原区的农户，也喜在居屋前后种些竹子，既是副业收入，也作风景点缀，且又具挡风、遮荫之功能，故向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说法。

富阳竹笋主要分冬春两大类。春笋是指毛竹笋以外的早笋、哺鸡笋、水竹笋、油苦笋、石竹笋、金竹笋、紫竹笋、象牙笋等。另外，四季皆有的鞭笋，秋天特有的梅笋，也是富阳竹笋族中的上品；而漫山遍野的野笋丛中，则以节笋、水笋（一名笔杆笋）和山石笋为最鲜美；近年来，用先进的科学方法培植，又有了提前于早笋上市的雷竹笋。总之，富阳称得上“竹笋王国”。

富阳竹笋在历史上曾被列为贡品，享有盛誉。光绪《富阳县志》载：“笋有冬笋、毛笋、石笋、哺鸡笋、鞭笋等，各笋中唯冬笋之用最大，贡入京师，珍同拱璧。”宋时苏东坡《新城道中》诗中，有“煮芹烧笋饷春耕”句。富阳竹笋被称作“名蔬”。一九七二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北京蔬菜公司派人专程来富阳采购冬笋一千公斤，用以宴请国宾。

冬笋确系竹笋之王。它生在竹鞭上，潜伏地层，秋季发芽，冬季成笋。《本草经》载：“在冬月掘大（毛）竹根下未出土者，为‘冬笋’，可鲜食，为珍品。”而富阳之冬笋，历来以量多质优著称，具有“笋体粗壮，形似牛角，壳薄金黄，肉色如玉，切片不

碎，松脆味鲜”的特点。据科研部门测定：冬笋含有人体所需的糖类、脂肪、蛋白质以及磷铁钙镁等微量元素和各种维生素；其中蛋白质中含有十六至十八种不同类型的氨基酸。八十年代前，富阳一般年销冬笋二三百吨，行销苏、沪、杭、京等地。冬笋出上为毛笋，有小年、大年和不分大小年的“桃花番”之分，年产毛笋五百至二千五百吨，除鲜笋食用、退笋制笋干和部分远销外，余者加工成清煮罐头，一九八四年起，年均出口四百三十多吨。

说到冬笋之成为贡品，富阳有则传说：古代有位孝子，因母生病很想吃笋，可在隆冬腊月何处寻笋？孝子急得上山抱竹痛哭三天三夜，感动上天，派仙人往竹根一指，立现地缝冒出笋尖，孝子掘起供奉老母，病痾顿消。从此每逢冬月，富春江两岸的毛竹就盛产冬笋了。这个传说后来还有一个续编：清乾隆帝游江南，途经富春江，闻说此故事，降帆泊舟，品尝冬笋，果然味胜仙食，赞不绝口。并命竹农挖掘，带回京都，宴请文武百官。大臣们一簇进嘴，无不连声称佳。于是，富阳冬笋就年年进贡，名扬四海。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东坞山豆腐皮

豆腐皮不光富阳有，远的如全国不说，以浙江为例，金、衢、严一带也向有出产。但他们之豆腐皮从色泽、厚薄到食用均不及富阳。富阳所产之豆腐皮不但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已逾千年；且一向以选料讲究，工艺独到而闻名于世。其中尤以东坞山所产者，量多质优，最为著称。故“东坞山豆腐皮”作为富阳之名优特产，早已名声在外。

相传唐僧从西天取经归来，唐皇设素斋招待，派使臣南下采办东坞山生产的豆腐皮。史籍上的记载为：“明时，东坞山豆腐皮被列为贡品，盛名于世。”而且油润白净，落水不粘，味道鲜美。所以东坞山有“豆腐皮之乡”的美誉。相传明末时，杭州有两个紧邻的饭铺，一大一小，都经营豆腐皮烹炒的菜肴。一天，大饭铺的老板得知小饭铺的豆腐皮备货不足，故意找了一群地痞大量点食豆腐皮菜，并声称如供应不上就要砸铺子。小饭铺老板手足无措，急得团团转。这时正有一位壮士骑马路过此地，问明原委后便飞鞭驰去。不过一个时辰，一垛白嫩如鱼肚的东坞山豆腐皮便呈现在老板面前，小老板感激壮士“拔刀相助”，特意把一张张豆腐皮摊开，把调好的鸡蛋与肉泥薄薄地刮上卷起成圆筒状，然后切成一寸半见方的块，放在滚开的油中炸，颜色淡黄捞起，即成内酥外脆的美味佳肴。小老板给其取名“炸响铃”，并把其定为本铺传统菜肴，寓意壮士马跑铃

铛响，小饭铺才得以起死回生。东坞山豆腐皮，亦称“金衣”。其特点是外形美观，薄如蝉翼，油润白净，份量极轻，每五百克足有一百二十张。用它配制菜肴落水不糊，口味鲜美，一九八五年获省级优质产品。

东坞山村位于受降镇，与杭州市的西湖区紧紧相连。深陷于山坳里的村落，上百座农舍顺着一条狭长的沟谷绵延分布。这里每户只有几分田地，旧时连口粮都远远不能满足，故千百年来，做豆腐皮便几乎成了解决生计的重要手段。从前，每逢初冬时节，庄稼收齐了，越冬的小麦、油菜、豆类也都播下，田里一时没啥活计，农家便腾出手来，纷纷忙碌起做豆腐皮的营生。不仅常年开工的作坊照常运作，更多小而零散的家庭业余作坊，本是三日打鱼两日晒网的那类，到了这个时候，也改变节奏，频繁作业了。

建国后，经历过一段大集体大锅饭和割私有“尾巴”的工厂式统一运作后，前些年随着农村联产承包的推行，包括东坞山邻近的施家园、祝家村一带，复又分散干开了。所见七八十来只锅子连在一起的灶台，用以晾干、排列有序的竹棚棚，几乎遍及家家户户。

东坞山豆腐皮之所以享有盛名，主要是由于水质优良，做工独特。流经东坞山村的山溪，发源于高耸入云的大龙山，终年清冽，含有多种有益于人体的矿物质，内聚力特强。其次，东坞山人掌握着特有的制作工艺，一般只在父子、兄弟间传授，又有“内传媳妇不传女”的习俗。

东坞山豆腐皮有多种吃法，杭州有些名菜馆能用它制作出整整一桌的各式美味菜肴。一九七二年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来杭，品尝了用东坞山豆腐皮制作的“干炸黄雀”、“游龙戏水”、“风飞南山”等佳肴菜饌后，赞不绝口。临行，还买了这

种富阳特产带回美国。

目前,东坞山豆腐皮除一如既往地定点供应杭州的天香楼、楼外楼、素春斋等名菜馆及一些涉外饭店外,还畅销上海、苏州、无锡等地。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亭山白术

富阳中草药颇多，以野生采集为主，人工栽培历史也逾百年以上。历史上比较有名，又被载入“县志”的却不多。平原沙地区的“月台半夏”和“栝楼”（吊瓜）产富阳者为上品。而名气最大的当推“亭山白术”。光绪《富阳县志》记载：“白术，一名天生术，亭山为佳，可愈百病，得一枚宝贵如吉林参，然不易得也。”

亭山，在富春江南面，绵延伸至原春江、大源、环山等乡的几十个村落。“亭山戴帽，落雨勿用问灶（灶爷）”，说的是亭山之高——海拔八百多米，为富阳第二高峰；亭山“白泉歌”，美妙动听，颇具神秘色彩；包括白术在内的“亭山三宝”的传说故事，更令人神往……

亭山白术与一般药物、植物书上记载的白术，确有许多特异的地方：串珠术，如颗颗算盘珠由一细根串着；竹鞭术，似在地下的鞭笋，叶子也像竹叶；凤尾术，每株一般长五颗，像是一窝鸟蛋，叶子则呈五边形。它隐藏于深山石崖，或细竹柴草丛中，故不易寻得。

我的老家在亭山之南，向称亭山白术为起死回生之药。老一辈们传下许多故事：一次，某阿太挖到一颗串珠术，到祠堂门口的热闹处应验，一妇人拿来一看后，即吞下，结果她一生无病痛，活到九十八岁。又有一阿太挖到了竹鞭术，则为另一背

年如法炮制了，她见状迅即将对方喉颈卡住，直到吐出为止，据说这位阿太自食后，也得以长命百岁。少时听听而已，似信非信，前不久我去老家，遇上了四次挖到过亭山白术的阿姚叔，他亲口告诉我，食用后气管炎不再发了；让他人食用煮泡过的渣头，亦治好了好几样病痛。只是有一次，为一病弱者服用后，不到一小时，肚皮胀得像铜鼓——“弱不进补”也！阿姚叔还举一例：为一将要死去的老者，用匙将汁水慢慢润之，竟起死回生又活了十几年。

亭山白术的神奇功效，还有一个传说故事：

很久以前，一个十三四岁的放牛娃去亭山百步崖，正当肚饥难熬之际，忽闻一股清香，他眼睛一亮，发现脚边有一拳头大小的雪白草根，尝尝还好吃，便吃进肚里。不一会，顿觉浑身筋骨发胀，睡于草地；醒来时吓了一跳，竟变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回家连母亲也认不得自己的儿子了。放牛娃述说奇遇，乡亲们笃信他吃的是亭山白术，于是许多人常到亭山百步崖去，果然找到不少。

亭山白术之所以不易得，还因为大多为野猪吃去，据说野猪每吃一颗，肚（胃）上就会长出一个红色肉丁。所以长期以来，野猪肚（胃）也一直以肉丁多少论其价。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峡岭湖笔

在我国南方，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湖州产毛笔，尤以湖州的善琚湖笔最有名气。殊不知，在我们富阳的坑西山区也产毛笔——峡岭湖笔。前些年还在富阳街上开起了“峡岭笔庄”。它虽不及善琚湖笔历史悠久，然也早已名声在外。这些年凡有贵客来富阳，尤其是文人墨客，有关方面也常常以峡岭湖笔相赠，价廉质优且高雅，既具纪念意义——视需要可在笔杆上刻上字，又有实用价值。笔者出访港、新、泰时，以峡岭湖笔作礼品，也很受外宾外商称道。

峡岭湖笔，笔毫挺拔而坚韧，笔杆洁净而光滑，书写作画，柔中有刚，行笔圆润，枯湿相参。当代我国许多书画家用过峡岭湖笔，也都称赞不已。笔者数访峡岭村，目睹周生根（可谓峡岭湖笔的创始人，也一度任该村支部书记和峡岭湖笔厂厂长）先生的家里，收藏着不少书画名家以峡岭湖笔挥毫的书法和画作，更有许多对峡岭湖笔的赞美之词。其中著名书画家周昌谷先生则称峡岭湖笔“选材精良，制作精心，艺事一乐也”。

峡岭湖笔的笔杆，采用当地的坑西苦竹制成，一是色泽好。愈经水漂摩搓，愈是滑润耐手；存放年代愈久，愈见光亮如油。二是质地坚韧。用力绞削不破不裂，竹渣薄如扇页，明透鉴人。这样的苦竹，观之瘦劲典雅，掂之圆浑凝重，是制作笔杆的上品。它砍伐于立冬以后，故笔杆不易虫蛀。这种苦竹笔杆，它

地不可多得，而在坑西的峡岭村一带，漫山遍野皆有。

峡岭湖笔的笔毛挑选也有讲究。羊毛采用头颈、四眼和胯间的毛锋毛；山兔毛采用背部的白毫、紫毫，宁精而少，不粗不滥。传统湖笔的笔毫具有笔锋尖锐、修剪整齐、丰满圆润、劲健有力的独特风格。除却狼毫毛要向外地采集，峡岭湖笔的产地，还有着养兔子、山羊的自然优势。

早在一九七八年，以“火炬牌”命名的峡岭湖笔，就被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作为外销的定点产品。目前峡岭湖笔厂的熟练工人已经掌握了近八十种规格的羊毫笔、兼毫笔的制作技术。产品远销日本、新加坡、香港等许多国家和地区。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竹制工艺品

富阳盛产各种竹子，向有以竹制作工艺品的历史。用竹篾编制的各式花篮、小匾、小筐、小箩、小帘等，尽管有的是很好的工艺品，但在不兴商品流通的年代，多半仅用作器皿盛物。并不视为有观赏价值。如一些盒式的竹制品——清明上坟专用、置放祭品的“蚕匣格”，分格套装并加盖的“状箩”，用来为小孩子满月、周岁或老者做寿的礼担，外观好看，内放馒头、米饼或糕点果品，不怕日晒雨淋，不必担心虫蚀鸡啄狗偷。还有以竹丝或竹根、竹鞭制成的鱼、虫、鸟、兽，可供小孩子当玩具嬉耍，以及给小孩子坐的“座车”等，都很经久耐用，为民间所欢迎。这些“作品”，有出于专业篾匠业余所作，上乘者，更为一般人所不及。即便产竹地区，也并非家家户户都有。其中有的精品往往要沿用好几代。

富阳的竹制工艺品，真正作为资源开发、以商品推向市场是在建国以后，且逐渐形成竹编、竹屏两大类。

竹编是实用性和工艺装饰性相结合的竹织品。经劈篾、抽丝、染色、清漆、绘画、上光等多道工序，用手工编织而成。摔而不破，挤而不裂，轻便耐用，色彩鲜妍润目。主要产地在原新民乡赤松村。那里坞深竹茂，山碧水秀，所产的花鼓缸、洗衣箩以及面包篮、吊篮、灯罩、花钵套等，出口创汇，早已名声在外。

竹屏采用质地柔韧、纤维细致的大小竹子为原料，劈篾后

抽成细小匀称的竹丝，用古老的织布方法编织成帘子，再画上山水、花鸟、仕女等图画，然后镶嵌在斑竹制作的框内，具有材料独特、做工精细、技巧华丽、古朴风雅的特色，又因规格多样，大型会议室或小型卧室均可设置，既增美感又起挡风和临时的隔墙作用。

制作这类屏风的富阳工艺美术品总厂前身，原在富春江南岸一座名灵岩寺的千年古刹里。笔者数度访此，四周古枫参天，修竹婆娑，清泉叮咚，环境十分幽静；我每次都去都犹如参观工艺品展览馆，四周墙上，挂满画屏，手工工艺和中国传统绘画艺术融为一体；纤细而柔韧的竹丝刮得光滑匀称，用它编成的画帘，紧密又平整，使人难以相信，这居然是手工产品。画帘上的中国画栩栩如生，盛开的鲜花竞秀争艳，美丽的古代仕女呼之欲出……这些画帘配上古色古香的斑竹框，可谓富阳竹族中的一绝，怪不得国内外客商都喜欢它。

七十年代末，富阳的竹制工艺品着实风光过一阵子。一九七九年，便被省二轻系统誉为“艺苑新蕾”。特别是由该厂精心制作的一幅大型竹贴屏风，被选送到北京，悬挂于人民大会堂浙江厅的入口处，把江南的春色搬到北国，为这座雄伟的建筑增添光彩。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三山紫竹

如果你看过梅兰芳的演出(今人只能从电视电影中品尝到他的国粹了),那么,你定为这位艺术大师精湛的表演和甜美圆润的唱腔而倾倒,也定为琴师优美动听的京胡而陶醉。你知道吗?从前,那京胡的琴杆,就是用我们富阳的三山紫竹做成的。

三山紫竹,主要分布在今三山镇的陆家村、谢家溪、蒋家村等地。栽种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年间,与佛教盛行有关。那时,这一带建有许多寺院和庵堂,著名的偃松寺就在谢家溪。根据佛教的传说,法力无边的观世音菩萨,是在紫竹林中修成正果的。加上紫竹姿态优雅,这里的冲积土壤又适宜紫竹的生长。因此,和尚、尼姑都喜欢用它来点缀环境。

本世纪初叶,苏州商人发现原来用作竹器、雨伞柄的三山紫竹,具有色泽匀净,质地细密,厚薄适中,光滑挺直,竹节平整等优点,便用它取代广州产紫竹制作笙、箫、管、笛以及京胡杆。一九二六年,在北京举办的国货展览会上,用富阳三山紫竹制作成的京胡进入了梅剧团,为梅兰芳先生的圆润的唱腔锦上添花。三年后,在杭州举办的西湖博览会上,三山紫竹也得到高度评价。于是,京津沪杭商人纷至沓来,竞相采购三山紫竹,竹价最高时,每千支卖到四十二块银元。三山地方的农民种竹热情也随着高涨,几乎是家家都在房前屋后,坡头地

角，种上一片紫竹，多的户每年能间伐几千支。当地、乃至整个富阳，姑娘出嫁，也总要挖一对紫竹随嫁到夫家去繁殖，图个吉利。可真奇怪，上好的紫竹品种，只要离开三山的水土，就失去黑褐油亮的本色，变成不值钱的黄鳝竹。

三山的竹农，有培育紫竹的丰富经验。有些乐器选料，要求很严格。如梅兰芳剧团用的京胡杆，除了厚薄、粗细、老嫩合宜。整株无水路、无白斑、无伤痕之外，还要求五个竹节之间的总长度刚好一尺一寸五分。其中第一节长二寸三分，第二节长二寸七分，第三节长三寸，第四节长三寸五分。否则，就不符规格，算不上优品。为了使紫竹按人的意志生长，每年立夏前后新笋成竹之时，竹农几乎天天站在竹林里，用剥笋壳、斩竹梢等压制生长的办法，使紫竹按规格要求成材。采伐紫竹也需要有特殊技术。老竹农看竹能辨识地下竹鞭的走向，用特制的铲刀插入泥中，轻轻一撬，干净利索地把竹挖起来，不损竹，又不伤竹鞭。

据记载，一九三六年三山紫竹产量达到二千三百多担。之后，日寇入侵富阳，逃难的人们砍竹当柴，挖笋充饥，产量只有二百担左右。建国后，由于好些年头片面搞“以粮为纲”，不少紫竹林被毁去种粮了，幸存的为数不多；近年来这一带新建工厂较多，所剩更是无几。

一九九五年四月

后 记

广袤的中华大地，山水相连却风情各异。有道是一方水土育一方人。位在浙江西北部杭州近郊、有着两千多年建治历史的富春大地，既以奇山异水驰名海内，又以人文遗产享誉世间。称雄“三国”的孙权，晚唐讽刺诗人罗隐，清时的同朝廉吏两董父子，以及现代文化史和革命史上享有盛名的郁氏昆仲……古老的富春，可谓文化沉淀丰富，历代名人辈出。淳朴的民俗风土，则如杭大吕洪年教授所称道的：富春风土是情景交融的，富春风情是古今承传的，富春风物是雅俗共赏的。

忘却了乡土谈爱国，是缺乏根基和源流的，也难免失去历史的方位与走向。我出生于富阳，且长于斯工作于斯。著名作家徐迟给我题词说：“有幸家在富春江，令我羡慕您也。”我何尝不是深情地迷恋于这块故土！因为工作的关系，加上有那么一点文学爱好，便陆续以富阳为题材写下些东西。自一九九〇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以后，便有好心者劝我：该把你写的东西出个集子了。我自然心中有数，“该”者，老矣！人当有自知之明，我深知过去写的那些乡邦文史、乡土题材为主的随笔类东西，毕竟意境浅薄，很少文采。于是，只把自调文联后写的与郁达夫有关的文章缀连起来，于一九九三年出版了《郁达夫及其家族女性》。一九九六年，我又出了本《鹤山魂》。如此，我已有了丑媳妇不怕见公婆的尝试。何况已是退了休的人。今

后与文艺的缘份和兴趣难免会淡薄起来,或者说力不从心。所以也就鼓鼓勇气,把这“大杂烩”端了出来。

还想顺便说几句的是,充当作家,出版专著,原是我做梦也不曾想过的。新中国刚一诞生,虚龄十七的我,便投身于革命,而此前则是断断续续只读了四年半书跳级才得以高小毕业的一个“半文盲”。四十五年间,我干过不少行当,还在“文革”中熬过三年有半的铁窗生涯。我从事过文教、宣传、理论、统战等工作,但更多的是下乡“搞运动”,主客观条件都不允许我专心致志地埋头写作。那时虽也经常舞文弄墨,但多半是抄书抄报,奉命起草文稿。原本就不多的“形象思维”,早随岁月逝去。我把自己喻为“万金油”干部。当然,我仍感激组织上给过如此众多的岗位和职业。如若不然,最后也就不会调到文联,也就不会有……

收进该书的有四篇文章是与李杭育等几位同志合作而成(已注解说明)。而在“富春揽胜”中有几篇写富春山水选自《富阳风貌》的文章,则有过与孙希荣、鲁顺光同志的合作。

该书付诸出版,除获浙江人民出版社支持外,更得到富阳市人民政府、富阳市风景旅游局,以及蒋敏德、李升根等诸同志的鼎力相助。特别是承蒙郁风、黄苗子夫妇于百忙中为之作序和题写书名。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作者

一九九七年秋于富阳

封面题词:黄苗子

责任编辑:蒋 恒

封面设计:李庆西

责任校对:韦 伟

蒋增福 著

富春闻见录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激光照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杭州武林路 125 号)

印 刷 杭州大众美术印刷厂

(杭州电厂路)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4.4 万

插 页 2

印 数 1—2100

版 次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411-0/G·434

定 价 1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ISBN 7-213-01411-0



9 787213 014116 >

ISBN 7-213-01411-0/G · 434

定价：12.00 元